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一個浮現中的另類準同盟？～美國-以色列-
沙烏地阿拉伯三邊戰略關係之研究（2009-2020）

**An Emerging Alternative Quasi-Alliance?
—The Tripartite Strategic Relations Among the United
States, Israel and Saudi Arabia 2009-2020**

陳俊霖

Chun-lin Chen

指導教授：徐斯勤博士

Advisor: S. Philip Hsu, Ph.D.

中華民國112年6月

June, 2023





摘要



2012 年，歐巴馬總統提出「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將戰略重心從中東移出，並將美軍自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撤出，另宣布於 2016 年底從阿富汗撤軍。2010 年 12 月「阿拉伯之春」爆發，並自北非蔓延入中東，歐巴馬未積極介入，放任盟國埃及被推翻，在以巴問題逼迫以色列上談判桌，2015 年 7 月與伊朗簽署「核協議」，引發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等盟邦的不安，以沙打破窠臼尋求合作共同對抗伊朗。2017 年川普延續提出「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但推翻歐氏中東政策，在以巴問題上一面倒向以色列、退出伊朗「核協議」，改施以高壓經濟制裁，意圖迫使伊朗接受新協議，並在「哈紹吉事件」中偏袒沙國，主導以阿簽訂「亞伯拉罕協定」，成功推動以色列與一系列阿拉伯國家建交。在此背景下，本論文將探討歐川時期美國的中東政策變遷、伊朗因素的變遷、以沙對美國中東政策變遷反應、以沙關係未來走向、美以沙是否會形成三邊戰略關係，學者車維德(Victor Cha)筆下美日韓三角關係理論能否套用解釋正在形成中的美以沙三邊戰略關係？研究發現，美國的中東政策本於國家利益，以「維持區域穩定」為主，但這利益卻是矛盾而相互依存；伊朗自 1979 年宗教革命後，對外輸出革命，擴大什葉派勢力範圍，結合美國扶植的核武技術，成為現今中東主要威脅；以沙對歐巴馬簽署伊朗「核協議」與川普事後退出態度一致，但兩國是否走向同盟/準同盟，抑或是建交？須視以沙兩國國內因素和美國是否強力主導而定；此外，本論文研究發現，美以沙已朝「三邊戰略關係」趨勢發展，但仍在演變且存在不確定性，兩組聯盟關係的起點相同，但角色不同，日韓的共同敵人隨時間演進改變，但以沙的共同敵人始終是伊朗，以沙對美順從度不同於日韓，當美國對以沙及日韓兩組盟國的安全承諾有變化時，以沙的反應和日韓不同，故車維德理論並無法完全套用到美以沙三邊戰略關係。

關鍵詞：以阿（沙）關係、阿拉伯之春、伊朗「核協議」、三邊戰略關係

Abstract



In 2012,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nnounced the “Pivot to Asia” to shift out Middle East. He withdrew the U.S. combat troops from Iraq, Syria and Libya then declared to retreat from Afghanistan. He compelled Israel to negotiate with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PLO) to enforce “two-state solution”, inactive and let his allies alone when “Arab Spring” broke out, signed the 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 (JCPOA) with Iran made unprecedented possible alliance between Israel and Saudi Arabia. In 2017, President Donald Trump declared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as the continuation of “Pivot to Asia”. But he overthrew Obama’s policy by leaning on Israel on “Israel-Palestine Issue”, withdrew from JCPOA replaced with enforcing further economic sanctions toward Iran, protected Saudi Arabia regime from condemning on the assassination of Jamal Khashoggi, advocated the “Abraham Accords” for Israel to set diplomatic ties with Arabian Countries. Under this background, this thesis will explore the tendency between Israel and Saudi Arabia, will they go toward quasi-alliance/ alliance or establish diplomatic relations? Will the U.S., Israel and Saudi Arabia form tripartite strategic relations ? What a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elations with the U.S., Japan and Korea trilateral quasi-alliance relations under Victor Cha’s (1999) theory ? The dissertation finds out that Iran has been the common threat between Israel and Saudi Arabia, but their compliances to U.S. are different from Japan and Korea, the explanation power of Cha’s theory to the U.S., Japan and Korea trilateral quasi-alliance relations may be less.

Keywords: Arab Spring, JCPOA, Israel, Saudi Arabia, Iran, Palestine, U.S.-Japan and Korea Trilateral Quasi-Alliance relations, U.S.-Israel-Saudi Arabia Trilateral

Quasi-Alliance

目 錄



中文摘要..... I

英文摘要..... II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前言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4

 第三節 文獻回顧 15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資料來源 25

 第五節 研究變項與研究架構 26

 第六節 研究限制 28

第二章 美國的中東政策與伊朗因素的變化

 第一節 美國中東政策的變遷 31

 第二節 歐巴馬時期的中東政策 36

 第三節 川普時期的中東政策 40

 第四節 伊朗的政策變化 45

 第五節 小結 54

第三章 以色列的政策反應

 第一節 以色列與美國的關係及對歐川時期美國外交政策的反



應.....	57
第二節 以色列與沙烏地阿拉伯的關係.....	63
第三節 小結.....	67
第四章 沙烏地阿拉伯的政策回應	
第一節 沙烏地阿拉伯與美國的關係及對歐川時期美國外交政 策的回應.....	71
第二節 沙烏地阿拉伯的內部變革與挑戰.....	75
第三節 沙烏地阿拉伯和以色列的關係.....	79
第四節 巴勒斯坦因素的背景與影響.....	84
第五節 小結.....	88
第五章 車維德理論應用在美以沙關係及美日韓關係的比較	
第一節 歐川時期美以沙戰略關係的演變.....	91
第二節 車維德的美日韓三邊戰略關係是否可以運用到浮現中 的美以沙三邊戰略關係？	95
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主要發現	103
第二節 美以沙三邊戰略關係的後續觀察	109
參考文獻	113

表圖目次



圖1-1 車維德的美、日、南韓三角關係圖示	24
圖1-2 美以沙三邊戰略關係的形成	27
圖1-3 美以沙三邊戰略關係	28
圖1-4 以沙關係未來走向	28
圖2-1 美國在1973年以前中東政策鐘擺立場	32
圖2-2 川普時期經濟制裁伊朗困境	44
圖2-3 伊朗勢力西進圖	49
圖3-1 以巴和談天平	61
圖5-1 美以沙仍在形成的三角關係與美日韓三角關係比較	97
表1-1 冷戰時期美國在中東的國家利益	6
表1-2 後冷戰時期美國在中東的國家利益	6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前言



二次大戰後全球各地分別進入美蘇兩強對抗體系，在歐洲，由美國主導的「馬歇爾計畫」與西歐盟國成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圍堵東歐共產勢力西進，至 90 年代初蘇聯解體、東歐國家民主化，歐洲進入後冷戰體系。

在亞洲，1953 年 7 月韓戰停戰協議簽訂，確立美蘇兩強對抗態勢，亞太地區除了東南亞國家基於反共信條成立「東南亞公約組織」（現為「東南亞國協」）外，並沒有類似北約性質的軍事組織與中、俄抗衡。僅有美國與個別亞太國家建立同盟圍堵，其中日本、南韓因為地緣政治的毗鄰性被美國視為防堵共產勢力向海洋擴張的第一道防線。90 年代初，蘇聯解體，中國取代蘇聯在亞洲的地位，並隨著國力增強，自 2010 年後逐漸成為亞太主要國家（日本、南韓、臺灣、馬來西亞...）第一大貿易國，有取代美國在亞太地區經濟地位之趨勢。2012 年 11 月，習近平掌權後，中國一改過去「韜光養晦」政策，不斷對外輸出軟、硬實力，希望在國際上發揮大國影響力。對此，時任美國總統歐巴馬提出「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主張，將國家戰略主軸從中東轉移到亞洲，加強與日本、南韓、越南等中國周邊國家交往。2017 年川普繼任總統，更提出「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並揭橥其三大支柱為：經濟上促進共榮、治理上捍衛良善治理與公民社會、安全上確保和平安全的區域秩序（吳安琪，2021），不變的是，亞太地區迄今仍維持著的兩強對抗形勢。

二次大戰後的中東及北非地區，英法舊殖民國勢力仍然存在，美國為了石油利益，和主要產油國伊朗、沙烏地阿拉伯交好，並支持以色列建國，但尚未在當地形成單一主導力量。1952 年 7 月，納塞（Gamal Abdel Nasser）發動軍事叛變就任埃及



及總統，將蘇聯勢力引入，1956 年宣布蘇伊士運河國有化，英法聯合以色列發動第二次中東戰爭，雖奪回蘇伊士運河控制權，卻遭國際譴責，埃及在蘇聯支持，美國則透過外交途徑譴責英法的侵略行為後，迫使英法勢力撤出中東，使中東進入美蘇冷戰對峙態勢。

期間，中東地區因為以色列問題共爆發五次重大戰爭，阿拉伯國家每戰皆北，卻也多維持著皇室統治。1979 年 1 月「伊朗宗教革命」使美國失去伊朗，以色列和沙烏地阿拉伯成為美國維繫中東區域和平的兩大支柱。2010 年 12 月「阿拉伯之春」自突尼斯燃起，向東席捲造成突尼西亞、利比亞、埃及、葉門四國政府被推翻，中東始進入另類後冷戰階段。2011 年 1 月，「阿拉伯之春」擴散至敘利亞，造成敘利亞內戰迄今未解，再向東南蔓延進入波灣地區的巴林，2 月 14 日民眾示威，最初只要求政府給予較大政治自由，但後期境內什葉派回教徒提出推翻遜尼派皇室統治的要求，導致 2 月 17 日巴林出動軍隊鎮壓，3 月 14 日，沙烏地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 1,500 名軍警進駐巴林協助該國平息內亂，哈馬德國王（Hamad Bin Issa Al Khalifa）宣布全國進入三個月緊急狀態，風波始平息，「阿拉伯之春」戛然而止，未再向其他國家蔓延（Ulrichsen, 2016）。

適逢沙國皇室更迭，2015 年 1 月 23 日，阿布杜拉國王（Abdullah bin Abdulaziz Al Saud）去世，薩爾曼親王（Salman bin Abdul-Aziz）繼任，任命其七子穆罕默德·賓·薩爾曼王子（Mohammad bin Salman, MBS, 以下簡稱「薩爾曼王子」）擔任國防部長、經濟及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2022 年 9 月 27 日復任命其為總理，刻意培養其擔任接班人，薩爾曼王子對歐美國家在「阿拉伯之春」期間未對垮台的阿拉伯國家政府提供援助而疑慮加深（Miller, 2017），且隨著歐巴馬希望在任期內為其中東



政策留下「政績」(Legacy),¹另主導與「伊朗核問題六國機制」(P5+1)伊朗簽訂「核協議」(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 JCPOA)，惟恐西方國家解除對伊朗經濟制裁使其有更多資源對外輸出革命，煽動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在內的宗教派系顛覆皇室，迫使沙烏地阿拉伯尋求包括與以色列在內的國家結盟 (Ridel, 2016)，共同對抗伊朗。雖然 2017 年川普上任以沙烏地阿拉伯為第一個訪問國家，並簽署 10 年軍售協議做為對沙安全保證，更在 2018 年 5 月 8 日宣布退出伊朗「核協議」，但在美國將戰略主軸從中東移往到亞洲的方向未變下，沙國仍缺乏安全感而決定另尋安全盟邦。2020 年 8 月 13 日，川普主導以色列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發表聯合聲明〔又稱「亞伯拉罕協定」(Abraham Accords)〕，在以色列同意「暫時中止」在約旦河西岸屯墾行為條件下，²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建立正常外交關係，隨後巴林、摩洛哥、蘇丹紛紛與以色列建交，這和 75 年前形同水火的以阿關係對照完全反轉，沙烏地阿拉伯與以色列關係向前邁進，但兩國是否走向準同盟/同盟關係，抑或是建交？是本文討論的一個重點。

以色列自 1948 年 5 月宣佈獨立建國後，即被周邊阿拉伯國家視為異族及異教徒而發生多次戰爭，但其堅定的生存意志和美國的強力後援使其一次又一次的度過危機，並在每次戰後攫取更多資源，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的仇恨原根植於其對巴勒斯坦土地的掠奪及屯墾上，但隨著 1979 年以埃和平協定、1993 年以巴奧斯陸協定、1994 年以約和平協約，讓以阿對立關係緩和。面對歐巴馬對以色列推遲以巴和平協議的不滿及川普政府對以色列一面倒的反差，深感需要尋求與更多中東國家的「和解」與「承認」，視伊朗為共同敵人的沙烏地阿拉伯便成為其發展進一步

-
1. 2015年5月14日，「海灣國家合作理事會 (GCC)」六個成員國代表在伊朗「核協議」簽署前夕赴美國大衛營拜會歐巴馬總統，對即將簽署的伊朗「核協議」表示憂慮，並希望美國強化對阿拉伯國家的安全承諾，惟未獲歐巴馬的具體回應 (Toosi, 2015)。
 2. 「暫時中止」：以色列在與這波阿拉伯國家建交公報中，以 suspend、freezing、on hold 等文字表示，以色列納唐雅胡總理則以”temporary hold”表達，但其意義均相同。



關係之標的。

本論文作者因為工作關係曾於 2016 年至 2018 年派駐以色列，負責與以國政務、學術、農業、科技交流等業務，對以國政情有第一手觀察及第一手資料。在赴以色列工作前，曾刻版地以為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應存在著零和般的寇讎關係，和巴勒斯坦更有無法共存的仇恨，但到以國工作後發現事實並非如此。尤其，以色列與作為阿拉伯世界中主要國家的沙烏地阿拉伯，彼此之間關係的演變，更有許多令人意想不到之處。究竟為何既有認知與現實之間存在鴻溝，乃成為撰寫本論文的動機，基於冷戰及後冷戰時期美國一直在中東扮演主要衡平者角色下，本論文將以美國的中東政策為主軸，側重最近兩任歐巴馬及川普（2009.1-2021.1）總統任期時對以色列和沙烏地阿拉伯的政策變遷作為檢視的基礎，闡述美國的中東政策脈絡，另外基於伊朗同為此時以沙的共同威脅，將分別討論以沙對於美國政策變遷及對伊朗威脅的反應，以沙兩國互動和關係演變。有鑑於以往國內論述中東政治文章多從阿拉伯國家角度撰寫，本論文將納入以色列文獻，從以色列的角度論述，提供國內學界探討中東問題的新觀點。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1956年10月，第二次中東戰爭結束，英法勢力撤離中東，美國取而代之，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成為美國在中東利益的守護者。兩國為對抗埃及納塞政府，曾共同在1958年7月黎巴嫩危機、1962年葉門政變中合作，以遏止蘇聯勢力進入中東，1967年6月第三次中東戰爭，巴勒維（Mohammed Reza Pahlavi）國王站在阿拉伯國家這一邊，譴責以色列在此次戰爭中所取得的土地，但仍承認以色列(Kaye et al., 2011)。1978年1月，伊朗爆發宗教革命，隔（1979）年1月，巴勒維國王被推翻，何梅尼（Ruhollah Khomeini）就任伊朗政治及宗教最高領袖，對內建立政教合一政權，以



「反美」與「反以」為主要意識型態內容，1980年4月伊美斷交，1982年在黎巴嫩扶植以消滅以色列為宗旨的「真主黨」(Hezbollah)並提供金援與武器，1993年9月，以巴簽定「奧斯陸協定」(Oslo Accord)，³ 以法塔派 (Fatah) 為主體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 遭伊朗痛斥為「賣國」，改支持激進的哈瑪斯 (Hamas) 派系，2006年操控真主黨在黎巴嫩和以國衝突，隨後利用美國在伊拉克戰爭慘勝，歐巴馬於2011年底自伊拉克撤軍，而和伊拉克境內什葉派勢力結合，在該國建立代言勢力，再於「阿拉伯之春」蔓延進入敘利亞時，力守阿薩德 (Bashar al-Assad) 政權，使其無法進入伊朗，讓伊朗成為下一個「骨牌」，並在政權穩固後反將原屬遜尼派的伊拉克和敘利亞轉向成為什葉派國家，合併原在黎巴嫩建立的真主黨代言勢力連成一線，擴張了什葉派勢力的版圖，挑戰了一向自詡為回教盟主的沙烏地阿拉伯地位，沙伊關係分裂。2016年1月2日，因為沙國處決境內什葉派信徒最重要的領導者尼姆 (Nimr al-Nimr) 及另外46名死囚，由於尼姆是什葉派在沙國的領導人物，因此他遭到處決，無疑會引起什葉派宗主國伊朗不滿；1月3日，伊朗暴民入侵並破壞沙國駐伊朗大使館，沙烏地宣布與伊朗斷交 (Spectum News, 2016/01/04)，以色列也對此波伊朗勢力擴充及發展核武備感威脅，造就了兩國潛在的合作環境，本論文結合上述因素，以歐巴馬和川普時期（以下簡稱「歐川時期」）美國政府對以沙的政策與伊朗因素的演進作為研究的自變項，而將以沙兩國對美國及伊朗政策的反應及彼此間的互動為依變項，據此推演出本論文研究的五項目的。

第一個研究目的，在分析美國的中東政策變遷，側重歐川時期中東政策的變化及伊朗的政策變遷

二次大戰後至2014年美國油頁岩量產前， 美國在中東的國家利益有二，一是

3. 奧斯陸協定 (Oslo Accords) 重要內容包括：(1)以色列承認巴解組織為巴勒斯坦官方代表及其在約旦河西岸、迦薩走廊的自治權；(2)巴解組織放棄使用武力並承認以色列的生存權；(3)以巴雙方同意在2000年以前於迦薩和約旦河西岸耶律哥(Jericho)等地實行自治；(4)以色列同意以五年為過渡期撤出約旦河西岸，但仍由以方負責當地公共安全。



保持石油供應管道的暢通；二是維護以色列生存安全。為維護這二個利益，美國採取三個核心策略：一是維持與現有友美盟邦關係、二是和平解決區域爭端，特別是以阿衝突；三是避免蘇聯勢力介入，特別是避免蘇聯成為主導中東政治的影武者（Atherton Jr., 1984：1194-1195）。為此，美國以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為主要盟邦，防止蘇聯勢力滲入中東。

表1-1 冷戰時期美國在中東的國家利益（作者自行整理）

美國核心利益		
確保石油供應管道暢通		保護以色列生存
美國核心策略		
維持中東盟邦關係	和平解決區域衝突	力阻蘇聯勢力介入

到了象徵中東地區進入後冷戰時期的「阿拉伯之春」後，美國因為2010年油頁岩技術開發成熟並在2014年大幅擴增產量，至2019年全美原油產量超越沙烏地阿拉伯（Amadeo, 2021）成為全球首要產油國，使「確保中東油源」退出美國中東地區的核心利益；伊朗的核發展因1979年宗教革命美以停止協助而停滯，一直到1995年俄羅斯提供伊朗核能（武）技術（Wehling, 1999）而重拾發展，且隨著恐怖組織興起及中東反美情緒高漲，使美國核心利益演變成四項：（一）保護以色列；（二）防止核擴散；（三）抑制當地反美情緒（Byman, 2015）；（四）反恐（Pollack, 2016）。

表1-2 後冷戰時期美國在中東的國家利益（作者自行整理）

美國核心利益			
保護以色列	防止核擴散	抑制當地反美情緒	反恐
美國核心策略			
將以色列融入中東		打擊恐怖主義	遏止伊朗勢力擴張



2009年歐巴馬就任總統，繼承的是小布希總統遺留下來處境艱難的中東，伊拉克戰爭泥沼未出、以巴和平進程推遲、恐怖組織猖獗、伊朗發展核武。所以歐巴馬就任後，中東政策以「縮減對外駐軍」並「提供中東國家政治協助」為主軸，輔以緊縮外交政策、要求當地盟國擔負更多責任、堅拒於任內出兵處理中東問題，並主導簽訂伊朗「核協議」(Lynch, 2015: 18-19)。

在以巴議題上，歐巴馬在2009年1月23日上任第三天，即派遣特使前往以國要求停止在約旦河西岸的屯墾興建(CNN, 2009/01/22)，並力促以巴雙方重上談判桌，但終其八年任期均無法成功敦促以色列停止屯墾行為，激怒歐氏在任期結束前一個月(2016.12)於聯合國安理會投下棄權票首次通過譴責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區的屯墾行為，不再為以國護航，使美以關係降至冰點(Lipner, 2017)。

2010年12月「阿拉伯之春」在北非爆發，隔年1月蔓延到中東及波斯灣地區，歐巴馬沒有具體的應對方式，在面對原有親美的政權遭推翻，歐巴馬沒有選擇積極介入，以致無法將「阿拉伯之春」引導至他想要的方向，引起那些未被推翻的親美中東政權質疑美國的安全承諾(Ernst, 2018)。

2015年7月14日，美國率領「伊朗核問題六國機制」與伊朗在維也納簽訂「核協議」，限制伊朗現有核設備的使用，由「國際原子能組織」對伊朗進行10年的監控。此舉引起以色列強烈反應，納唐雅胡總理(Benjamin Netanyahu)認為，伊朗「核協議」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歷史性錯誤」，全世界會因為這個協議而變得危險(Mitnick, 2015)。伊朗會因為西方國家撤除經濟制裁而取得更多資金，用於支持恐怖組織及消滅以色列，以色列將一如既往地保衛自己的安全，必要時不排除採取「先發制人」手段，單獨採取軍事行動。沙烏地阿拉伯政府官方表示希望伊朗將國家資源用於改善民生和促進經濟發展方面，而不是用來破壞地區和平與穩定，



沙國願意在互不干涉內政和友好相處原則上發展與伊朗在各領域的友好關係，但實際上沙國已尋求與包括以色列在內反對伊朗「核協議」的國家合作（Riedel, 2016b）。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中東研究所所長馬克·林奇（Marc Lynch）在「外交事務雙月刊」發表文章指陳，綜觀歐巴馬中東政策貶多於褒，他僅對其任內完成伊朗「核協議」表示認同，卻對他任內其他中東政策作為不以為然（Lynch, 2015: 27）

2017 年元月川普上任，延續歐巴馬時期將軍力撤出中東，重返亞洲大戰略，未再大幅增加中東駐軍，提供其認定的中東盟國政治協助，但和歐巴馬不同的是，他在以巴問題上對以色列採取「一面倒」政策，他承認耶路撒冷為其首都、將駐以大使館遷往耶路撒冷、承認以色列在戈蘭高地主權及約旦河西岸屯墾行為合法、關閉巴勒斯坦駐華府辦事處、停止資助巴勒斯坦難民機構「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及工程處」（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Works Agency for Palestine Refugees in the Near East, UNRWA），2018 年 5 月退出伊朗「核協議」，改施以高壓式經濟制裁，這鼓舞了以色列在對巴及對伊政策上採取更強硬的態度，卻也讓沙國相對疏遠與以色列的關係；在對沙關係上，川普在 2017 年 1 月就任總統後首次國是出訪即對沙出售一千一百億美元武器，後因 2021 年 1 月拜登上台以重新審視對沙軍售為由暫停而未落實，⁴包庇 2018 年 10 月華盛頓郵報記者美籍沙裔異議人士哈紹吉（Jamal Khashoggi）在沙國駐土耳其領事館遭沙國皇室派員刺殺案，藉此維護美國定位沙國在中東扮演和平支柱角色及石油利益，至 2021 年 1 月川普卸任前，美國在中東的作為顯示出其對以沙兩國的強烈支持，使得美以沙在中東地區是否會形成三邊戰略關係之

4. 拜登政府於2021年1月27日宣佈暫停包括對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出售50架 F35 戰機及對沙軍售，其中停止對沙軍售理由係因為拜登政府認為沙國將自美取得之武器用於葉門戰爭，不符合原設定軍售用途(Jewish News Syndicate, 2021/01/27)。



趨勢，成為本文討論的一個重點。

伊朗是沙國和以色列的共同敵人，也是美國在 1979 年後重新選擇中東盟國的標準之一，它從第二次中東戰爭成為美國的「親密盟友」到 1979 年宗教革命及長達 444 天（1979.11.4-1981.1.20）的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人質危機事件，造成兩國關係 180 度反轉，至 21 世紀，伊朗發展核武並向外擴張什葉派勢力範圍，成為驅動以沙關係走近的動力之一。是故，歐川時期美國的中東變遷與伊朗因素的變遷如何影響以沙關係，成為本論文研究的另一個重點。

第二個研究目的，在論述歐川時期，以沙關係進展及影響因素

以沙關係在 1973 年第四次中東戰爭前一直維持著零和形式，沙國因為巴勒斯坦問題和宗教因素始終否定以色列的存在。但隨著 1979 年以埃簽署和平協定、沙國第一代領導人的凋零，新一代領導人拋棄過去對以零和思維，逐漸承認以色列的存在，1982 年，沙國國王法德（King Fahd）承認以色列的生存權，在民間仍普遍反以氛圍中，沙以官方在 1991 年象徵以巴關係走向和解前奏的「馬德里會議」（Madrid Peace Conference）後，於水資源、環境、經濟合作、難民議題、武器管制等五項領域進行合作（Dekel & Guzansky, 2013）。

1993 年 9 月以巴簽署「奧斯陸協定」，同年，以色列外長裴瑞斯（Shimon Peres）發表了「新中東」構想，⁵ 希望能使以色列與阿拉伯世界享有完全正常的關係，對以而言，與沙國關係是包裹在以阿關係下進行，在裴瑞斯提出「新中東」構想後，先是與「海灣國家合作理事會」（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CC）中的安曼和卡達

5. 「新中東」：裴瑞斯主張以阿在「奧斯陸協定」基礎下進行文化、科技、政治、經濟關係的廣泛交流（Kuttab, 1994）。



互設貿易辦事處，亦與沙國暗中進行貿易與安全合作，期間以沙商業關係非常活躍，包括軍火交易，以色列公司另協助包括沙國在內的波灣國家進行海水淡化、基礎建設保護、資安和情報蒐集等（Feziger & Waldman, 2017）。

2002年，時任沙國王子後來擔任國王的阿布杜拉（Abdullah bin Abdulaziz Al Saud）在貝魯特的「阿拉伯峰會」上提出「阿拉伯和平方案」（Arab Peace Initiative），首度在政治上承認以色列，但條件是以色列需撤出「六日戰爭」所取得的土地、並與巴勒斯坦達成協議，依據聯合國大會194號決議案解決巴勒斯坦難民營問題，⁶以國如能完成上述承諾，沙國將率穆斯林國家和以色列建交，但不巧的是這方案提出的時機恰巧是以巴衝突最劇烈的時候，⁷因而未獲得美國和以色列領導人的青睞（Guzansky & Neubauer, 2014）。

2011年初「阿拉伯之春」蔓延到波斯灣，歐巴馬放棄埃及，引起沙烏地對美疑慮，這疑慮隨著歐巴馬沒有積極的處理中東各國內戰，僅攻擊「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the Levant, ISIL）、避免美國本土受到恐攻、避免讓已發生內戰的國家（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葉門）外溢到其他國家、在伊朗核武擴散議題不表態而加深（Pollack, 2016），歐巴馬在2015年5月與包括沙烏地皇室代表在內的海灣國家領袖舉行「大衛營會議」前夕，⁸拒絕提供波灣國家北約式的保證～即一國遭攻擊，即視為對全體會員國的攻擊，無法消除阿拉伯國家對伊朗藉由「核協議」的簽訂擴大對中東威脅的擔憂（Toosi, 2015），種種因素，使得身為遜

-
6. 聯合國大會194號決議：1948年12月11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確定因戰爭而離開家園的巴勒斯坦人可以返回家園，成立巴勒斯坦和解委員會，成立調解專員，及耶路撒冷地位暫由聯合國託管。
 7. 2000年9月28日，以色列總理夏隆（Ariel Sharon）進入回教聖地聖殿山，引發巴勒斯坦人發動第二次起義(2nd Intifada)。持續5年，造成1千餘名以色列人和3千餘名巴勒斯坦人喪生。
 8. 2015年5月14日，「海灣國家合作理事會」六國代表訪問美國，對歐巴馬可能與伊朗簽署「核協議」事表示憂心，並擔心伊朗勢力擴張而要求美國提出安全承諾。



尼派宗主國的沙烏地阿拉伯與美關係走下坡，而尋求與包括以色列、中國、俄羅斯、印度在內的國家結盟，以維持皇室政權。

在此期間，沙國和以色列的合作日趨緊密，儘管巴勒斯坦因素橫梗在前，以沙兩國原僅限於非政治領域的合作因伊朗問題而外溢，2015 年沙國皇室更迭，薩爾曼王子進入權力核心，兩國交往抬頭化，非政治議題的合作已無法掩飾，包括前述水資源與經濟合作，以沙兩國在反恐和資安等方面亦有著墨（Ulrichsen, 2016）。

2015 年 7 月，歐巴馬主導「伊朗核問題六國機制」與伊朗簽署核協議，2016 年 1 月，沙烏地與伊朗斷交，提供了以沙兩國進展關係的基礎，雙方不再避諱官方往來（請見第三章第二節）。2017 年元月川普總統上任，以沙兩國關係繼續向前推進，儘管沙國表面仍支持巴勒斯坦，但對以關係因為伊朗問題、能源穩定及反恐議題上有共同利益而日趨緊密，特別是在伊朗問題上。

2020 年 8 月 13 日，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發表「亞伯拉罕協定」，沙烏地阿拉伯是否會跟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安曼、蘇丹、巴林等國與以色列建交之說法甚囂塵上，這傳言在同年 11 月 22 日，川普牽線、龐佩奧（Michael R. Pompeo）國務卿出面，安排沙烏地王儲薩爾曼與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於沙國西部紅海城市「新未來城（Neom）」密會而達高峰（Al Jazeera, 2018/05/21）。以沙兩國針對歐川時期美國政策變遷的反應，沙國國內因素、巴勒斯坦問題以及以沙兩國對彼此行為的具體反應，將是本論文探討的第三個重點。

第三個研究目的，在討論以色列對美國中東政策變化的反應

以色列前總理巴拉克（Ehud Barak）在 1996 年擔任外長時曾形容，以色列是「中



東叢林裏的一棟渡假別墅」(Danin, 2016: 28)，27年後的今天，儘管中東地區動亂頻仍，但大部分的以色列人認為以色列是中東地區生活水準相對高、經濟動力強勁、高企業創新精神，受舉世稱羨的國家。

美國前駐埃及大使艾塞頓 (Alfred L. Atherton Jr.) 說二戰後的美國中東政策像「鐘擺」(Pendulum) 一樣，一端是從宏觀的全球角度以「應然面」看中東，而給予中東各國各種期盼的角色；另一端是「國內政治因素外溢影響」，由國內各組勢力對決決定中東政策。在五次中東戰爭中，美國並未全然支持以色列，以色列只能順勢做出符合美國要求配合美國國家利益的政策，或是結合美國國內猶太族群力量，讓美國做出有利以色列政策，具體表現在第二、三次中東戰爭上。第四次中東戰爭後，更是在美國軟硬兼施，以土地換取和平，在時任美國總統卡特見證下，1978年9月，比金 (Menachem Begin) 總理與埃及總統沙達特 (Mohamed Anwar al-Sadat) 簽署「大衛營協定」(Camp David Accords)，兩國建交。

1979年伊朗發生宗教革命，何梅尼擔任政教領袖，其「反美」與「反以」態度讓美以找到合作基礎對抗伊朗，唯獨在巴勒斯坦問題上，以色列並未次次臣服於美國的壓力，基於以色列國內政治及與巴勒斯坦內部仍存在著「零和思維」，以巴雙方均仍存在無法妥協的政治問題，使得以巴問題迄今難解，自雷根以來的美國總統一直試圖嘗試調解以巴衝突，可惜均未成功。

歐巴馬時期，以國對其強迫與巴勒斯坦坐上談判桌不願順從，對歐巴馬和伊朗簽署核協議更是堅決反對，再加上伊朗利用歐氏自中東抽身取得伊拉克、敘利亞，結合既有的黎巴嫩真主黨勢力並援助迦薩的哈瑪斯組織，使以國備感生存威脅。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情勢不明朗，以國惟恐下任政府將沿續歐巴馬的不友善立場，降低對以安全承諾，而在9月14日與歐巴馬政府簽訂為期10年軍事援助協議，美國



據此自2018年10月起，每年提供以國38億美元軍事援助，讓中東反以國家瞭解以美關係仍然穩固（Dorell, 2016）。

川普時期，美國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並將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遷往耶路撒冷，2019年3月25日，川普在與以色列總理納唐雅胡舉行聯合新聞記者會上簽署協議，承認戈蘭高地是以色列的一部分，改變了以巴和談的前提。以色列利用此「一面倒政策」，擴大對約旦河西岸屯墾、壓縮巴勒斯坦生存空間，對阿拉伯關係更在川普引導下，於2020年8月13日與阿拉伯國家發表「亞伯拉罕協定」聲明，陸續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安曼、蘇丹、巴林等國建交。頓時，以阿進一步發展關係可能性大增。相對於此，以巴問題因發生根本改變而成為更難解的問題。

第四個研究目的，在探討沙烏地阿拉伯對美國中東政策變化的反應

在美國撤出中東的戰略態勢不變下，延續皇室的生存成為沙國政府核心利益。2009年1月，歐巴馬上任，沙國對歐氏的伊朗政策感到不安，2010年12月「阿拉伯之春」爆發，當時美國並未對跨台的阿拉伯國家政府積極提供援助，合理的推論是這會加深包括沙國在內的其他阿拉伯國家政府感到焦慮，2015年5月「海灣國家合作理事會」領袖與於大衛營與歐巴馬會談，對歐氏即將與伊朗簽署「核協議」表示憂心。2017年1月，川普就任，強化對沙國軍售，2018年5月撤出歐巴馬所簽訂的伊朗「核協議」、對沙國記者哈紹吉遭殺事件極力袒護，儘管在以巴問題上一面倒向以色列，但並不影響薩爾曼王子主政下對以國態度，2020年8月13日「亞伯拉罕協定」聲明發表，沙國受限於其遜尼派宗主國地位、巴勒斯坦因素、薩爾曼國王仍堅持以色列須遵守「阿拉伯和平方案」的條件下，並未跟隨巴林、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國與以色列建交。



簡言之，沙國對美關係以「延續皇室生存」為核心考量(Farouk & Lebre, 2022)，自二戰後至2014年止，沙國均配合美國政策「以石油換取軍售」維繫皇室生存，但人權問題、恐怖主義、美國對沙烏地日漸下降的安全承諾是沙美關係發展的障礙。

第五個研究目的，討論歐川時期美以沙三邊戰略關係和冷戰迄今美日韓三角關係比較

冷戰時期，為防堵中蘇勢力在亞洲擴充，美國在東北亞分別與日本、南韓簽定軍事同盟條約，並在兩國設有軍事基地及駐軍，以防堵中、蘇共勢力向海洋擴張，其關係延續到後冷戰的今日，但日韓因為歷史、價值、理念等因素沒有形成真正同盟，使美日韓沒有形成真正的三邊戰略關係，韓裔美籍學者車維德在 1999 年所著”Alignment Despite Antagonism~ The United States-Korea-Japan Security Triangle”一書，提出此組「二實一虛」的聯盟關係，並將日韓關係定位為「準同盟關係(Quasi-Alliance)」。

同樣地，以色列和沙烏地阿拉伯是美國 1979 年伊朗宗教革命後在中東的兩個重要支柱，冷戰時期以沙是對立的關係，雙方因為歷史、理念及宗教因素未能結盟，但隨著 1982 年沙國承認以色列生存權，1990 年沙巴關係因波灣戰爭支持對象不同而改變，使沙以關係躍進，2002 年沙國有條件提出政治承認以色列，以沙關係走向合作，其後歐巴馬宣布美軍逐步撤出中東，讓兩國在伊朗核問題、恐怖組織發展、科技等議題上有進一步合作機會，兩國未來是走向準同盟/同關關係，抑或是建交？仍是正在發展的議題。車維德所提美日韓三角關係理論是否可以解釋正在形成的美以沙三邊戰略關係？特別是車維德筆下的日韓「準同盟關係」可否引申用於解釋歐川時期的以沙關係？成為本論文討論的第四個重點。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歸納本論文的研究問題有下列四項：

- 第一，作為影響以沙兩國關係演變的關鍵性因素，歐川時期美國中東政策的變遷為何？伊朗因素的變遷為何？
- 第二，以色列和沙烏地阿拉伯針對美國中東政策變遷，針對彼此及其他因素有哪些具體政策反應？前所稱的「其他因素」包括巴勒斯坦及沙國國內因素。
- 第三，以色列和沙烏地阿拉伯會朝準同盟/同盟關係，抑或朝建交之路前進？
- 第四，美以沙三國是否會形成如美國在東亞和日韓形成的三邊戰略同盟關係？兩組關係有何異同？相關的理論觀點能否運用到美以沙三角關係？

第三節 文獻回顧

本論文是以美以沙三邊戰略關係為主題之研究，題材較為新穎，在現有任何語言的文獻中，都不存在以本文所使用準同盟/同盟分析架構來討論美以沙關係的著作。至於相關的一些子題，少有在學術界可見成冊的文獻，而是散見於文章中。故本論文之文獻回顧，將環顧在此主題下相關子題的不同主張，分段陳述各類觀點，據以探討本論文可針對既有文獻補充之處。

壹、以沙是朝準同盟/同盟，抑或是建交方向進行？

瓦茲（Stephen Walt）說，國與國間結盟的最大原因是「為了制衡對抗共同威脅」（Walt, 1987），「伊朗」是促使以沙可能結盟的最大誘因。而國與國間結盟與否與「彼此是否具有正式外交關係」互為因果關係，現實情況是以沙並無外交關係，故文獻上探討以沙是否聯盟的議題，常以「兩國是否建交？」、「以色列與『海灣國家合作理事會』關係如何發展？」等用語摻雜替用，認為以沙如果正式建交，自然



存在著在某些領域的結盟關係。本文雖然將以沙未來關係朝準同盟/同盟，或是建交方向論述，但學者對以沙未來朝向建交與否，有完全不同的論點：

一、以沙關係正常化論

(一) 南丹麥大學當代中東研究中心主任貝克 (Martin Beck) 於2019年11月以國國會大選時發表論文提到：以國境內最積極主張應該與包括沙國在內的「海灣國家合作理事會」六成員國發展互不侵犯條約以及和沙國建立更密切的關係乃是以國「藍白黨」(Blue and White Party) 主席甘茨 (Benjamin Gantz)，他的這個觀點主要原因之一是當今以國主要威脅來自伊朗和其地中海盟友—黎巴嫩真主黨與敘利亞，這和沙烏地阿拉伯以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所面臨的主要敵人極為相似。(Beck, 2019)。

(二) 以國智庫「以色列國家安全中心」(The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SS) 沙烏地阿拉伯問題專家谷戰斯基 (Yoel Guzansky) 在2020年10月發表文章提出：對沙國而言，與以建交的關鍵因素有二：一是沙國內部維穩且在回教世界的地位不能改變；二是巴勒斯坦問題，除非以色列遵循其2002年所提「阿拉伯和平方案」條件，以沙始有建交可能。同時以沙建交可以強化美國在伊朗議題上對沙國的支持、改善沙國與美國國會的關係，把沙國塑造成為「溫和的回教國家」形象、取得以色列的科技、強化以沙兩國回教聖城的地位。

基於上述原因以及以色列又與越來越多的「泛阿拉伯國家」開始建交，因此沙國無論是在阿拉伯世界的經濟、宗教、政治地位，均是以國下一個建交對象 (Guzansky, 2020)。

(三) 谷戰斯基繼而在2022年8月發表另一篇文章，認為基於以下三因素，沙國只能在「幕後」(backstage) 協助其他阿拉伯國家依循「亞伯拉罕協定」精神與以色列建交：1. 美國因素：拜登政府尚未延續川普總統「亞伯拉罕協定」為以沙創造新的建交模式；2. 巴勒斯坦因素：由於薩爾曼國王父子對巴勒



斯坦的態度不同，沙國恐需等到薩爾曼國王去世且薩爾曼王子能平順繼任後，沙以關係才能進一步發展；3. 伊朗的共同威脅感：伊朗對以色列的威脅來自核武，對沙烏地的威脅來自於其欲篡奪沙烏地的回教宗主國地位，只有在兩國對伊朗的共同威脅感拉近時，才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

另外對沙國而言尚須符合「沙國內部維穩」且「沙國在回教世界的地位不能改變」，所以現階段以沙尚無法踏入同盟/準同盟，或是建交之路。谷戰斯基在同篇文章指出，如果現階段以沙無法建交，可以先從「某些事務達成協議」做起（Guzansky, 2022）。

另一個以沙現階段建交的可能就是以色列遵循沙國2002年所提「阿拉伯和平方案」。2022年7月，美國總統拜登訪問沙烏地阿拉伯時，沙國外長朱拜爾（Adel Al-Jubeir）在接受美國公共電視網「新聞時刻」記者薛福林（Nick Schifrin）訪問時重申，只有以巴和平共處，具體實現「兩國方案」時，沙以關係才有進一步發展可能（Schifrin, 2022）。

二、以沙尚無建交成立聯盟可能

華府「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中東問題研究中心學者法魯克（Yasmine Farouk）在2020年10月發表文章認同以沙建交可使兩國各自取得戰略和軍事目的，但她認為基於以下因素，目前仍看不到以沙建交的可能：

(一) 以巴問題是影響中東和平與穩定的關鍵因素之一，但是2020年8月至10月以國與部分阿拉伯國家的建交潮均未觸及此一問題，受「阿拉伯之春」影響的國家，人民的抗議活動從抗議政府的貪腐無能開始，最後演變成全國性的暴動、內戰，這種型態也發生在以巴問題上，所以當上述的建交公報沒有觸及以巴問題時，也就沒解決巴勒斯坦地區貧富不均及社會地位差距問題。對沙



國而言，如果對於以巴問題的忽視也反應在未來以沙兩國提升關係的過程當中，那麼以沙即使未來建交也不必然促成中東的和平與穩定。

(二) 以沙建交並不必然會促進美國在中東的利益：以沙在中東的利益不盡然和美國的中東利益相同。三方對「反恐」、「伊朗」議題認知不同，以色列對「反恐」的認定是把「恐怖分子」範圍擴充到沙國內部反以的異議人士，與沙國不同；在「反伊」議題上，以沙均希望美國採取主動角色，但美國對防範伊朗威脅的自我定位側重在「圍堵」，而非主動攻擊。

(三) 以沙建交並不會促進沙國內部的民主和現代化：沙國內部有許多期盼沙國未來走向更高民主與現代化人士，然而這些人士認為以沙建交對於這種期待並沒有直接幫助，頂多只能有利於薩爾曼王子來進行「沙國現代化」的承諾，這些人認為擴大國內婦權、反貪腐、協助巴勒斯坦建國可能更有利於達到此項目標，另外一個相關的問題是，現階段如果過於急躁推動與以國建交，將反而提供國內極端份子羅織薩爾曼王子違背回教教義罪名。

(四) 以沙建交不代表兩國就能成為盟友：主張與以色列建交的沙國人民，多屬於那些年輕、受西式教育且具一定教育程度的「新沙烏地人」(New Saudis)，與國內多數自幼接受回教基本教義洗腦，反對與猶太建國的以色列交往的保守力量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梁文傑，2018：7)，後者堅持只有在巴勒斯坦因素獲得解決下，兩國始有建交可能。

(五) 以沙建交不代表沙美關係障礙解除：沙國認為與以關係正常化可以修復沙美關係，減低美國保守人士對沙偏見，但事實卻是美國對與沙烏地關係發展的重視程度遠不及於對國內內政問題的關注。

(六) 以沙建交無助於沙國皇室減緩內部問題：以薩爾曼王子為實際主導的沙國領導階層希望藉由巴勒斯坦建國及與以建交換得美國的支持，藉此消除阻礙他繼承王位的障礙，這對想操控一切並以國家利益為優先的美國而言是不切實際的(Farouk, 2020)。



綜合以上四篇文章雖持完全相反觀點，但他們都認為「兩國國內因素」是決定以沙是否走向準同盟/同盟，或是建交的關鍵，卻未深入討論國際層面的因素（例如：美國與以沙二國之間的結構性關係，以及以沙兩國對共同外在威脅的認知程度，和以沙建交在各自國內政策的排序）。針對既有文獻在這部分的不足之處，本論文將會有所分析補充。

貳、巴勒斯坦問題

巴勒斯坦問題一直是以沙關係能否大幅前進的關鍵因素。國際間有關巴勒斯坦問題專書汗牛充棟，範圍涵蓋以巴問題、巴解分裂、迦薩問題等，本論文探討重點在於巴勒斯坦因素占沙國的比重，及其對沙以發展成準同盟/同盟，亦或是建交的阻礙程度，搜尋坊間中外文獻並無以此為論點之專書探討，阿拉伯國家專書文獻中對此著重於探討歷史回顧或宗教釋義，故本論文在此僅就近期媒體或智庫文章中，搜尋與前述重點相符者，整理如下：

沙國曾是支持巴勒斯坦建國最強烈的國家，在歷次中東戰爭中均無條件地提供巴勒斯坦財政、經濟等方面援助，尤其在費瑟國王時代 (King Faisal bin Abdulaziz Al Saud, 1964-1975) 達到高峰，1967年，費瑟國王對以色列提出「三不政策」，⁹ 1968年宣布將耶路撒冷做為回教第三聖城 (Ramos, 2023)，1972年，費瑟國王稱，所有國家應該對以色列發動戰爭，1973年10月第4次中東戰爭失敗，費瑟國王對支持以國的西方國家實施石油禁運，造成全球第一次能源危機，並協助推動巴勒斯坦進入聯合國，即使他稍後於1975年遇刺身亡，沙國仍持續提供巴國援助，期間一度因為

9. 「三不政策」：不承認以色列、不與以色列談判、不與以色列和平共處 (no recognition of the state of Israel, no negotiation with Israel, no peace with Israel)。



1990年8月波灣戰爭，沙巴關係因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支持伊拉克而降到谷底，但很快回復，一直到2001年「九一一事件」美國嚴查境內沙國資金流動而減緩對巴國援助前，沙國是由長期擔任內政部長的納耶夫（Nayef bin Abdulaziz Al Saud）與其兄，也就是2005年繼任國王的阿布杜拉王子領銜，以慈善組織名義持續援助巴勒斯坦（Ulrichsen, 2018: 1-11）。

西班牙政治學者托梅（Rosairo Soler Tomé）2020年12月發表評論稱，沙國位處中東地區強權、遜尼教派宗主國，對以巴問題一直扮演調停者角色，希望以巴衝突能和平解決，雖然民間支持巴勒斯坦的聲音未曾減低，但1990年8月波灣戰爭，阿拉法特與伊拉克站同一陣線，使沙巴關係驟降，伊拉克意圖透過飛彈攻擊逼迫以國還擊，藉此團結阿拉伯國家共同抗以之企圖失敗，反讓以沙關係躍進，並隨著日後伊朗威脅日增，以沙兩國因共同利益擴大而小心翼翼地進行靜默外交，不再否定以色列的存在，雙方代表也避免在公開場合見面。2002年沙國王子提出「阿拉伯和平方案」，為阿拉伯國家承認以色列敞開大門，2006年7月第二次黎巴嫩戰爭，以色列對抗由伊朗扶植的黎巴嫩真主黨，再度讓沙國感受到兩國視伊朗為威脅的共同認知。2020年8月13日，以國總理納唐雅胡、巴林外長札亞尼（Abdulatif al-Zayani）、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外長札耶德（Sheikh Abdullah bin Zayed Al Nahyan）在川普總統見證下，於華府簽署建交公報（即「亞伯拉罕協議」），以色列和巴林、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正式建交。當時輿論均稱，沙國將是下一個和以國建交的國家，因為「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the enemy of my enemy is my friend），但事後發展卻未如預測，原因在於巴勒斯坦問題，現任薩爾曼國王堅持以巴問題應循「阿拉伯和平方案」解決。托梅在本文則認為，因為薩爾曼王子未曾經歷與以衝突經驗，倘能日後順利繼任國王，則沙以建交可能性大增（Tomé, 2020）。

曾任倫敦國王學院訪問學者的沙國教授拉西德（Madawi al-Rasheed）在2020年發表文章，稱巴勒斯坦並非沙以建交的障礙，薩爾曼王子早已對巴勒斯坦不接受任



何與以和平協議表示不滿。但讓薩爾曼王子對以建交躊躇不前的原因來自他身邊對他持有異議的皇室成員。拉西德教授認為薩爾曼王子並非1981年的沙達特，他沒有能力在和以色列簽訂建交公報的同時又能撫平國內反對聲音，尤其是來自皇室可能的反對聲音，更何況沙達特最後遭軍方內部反以建交的軍官暗殺身亡（Al-Rasheed, 2020）。

回顧歷史，影響沙國安全和對改變沙國政策的來源往往來自沙國內部皇室，而非一般百姓或國際因素。自19世紀起，因反對沙國政策而暗殺沙國國王、王子的兇手，均來自內部皇室成員。最近的一次是1975年，費瑟國王遭外甥穆塞德（Faisal bin Musaid）刺殺，以報復其兄遭沙國電視台保安人員射殺之仇，而非被伊朗政府或巴勒斯坦派員暗殺。而2017年薩爾曼國王破壞沙國皇室傳統的「兄終弟及」繼承原則，硬改成「父死子繼」，扶植自己第七個兒子薩爾曼王子為繼任者，已為日後可能的宮廷之亂埋藏不安因素。為此，薩爾曼王子於2017年11月下令逮捕包括11位親王、4位現任部長及數十位前任部長，羅織以貪污、發表攻擊政府言論等罪名，以「清君側」（Kirkpatrick, 2017），薩爾曼王子同時進行諸多內政改革，提出「願景2030」計畫、開放女性獨自駕車等，目的均在消弭沙國皇室內部對其日後繼任國王可能的反彈（Al-Rasheed, 2020）。

綜合上述兩篇，從沙國內政角度切入，巴勒斯坦因素對沙以建交與的影響力輕微，甚至略而不提。一言以蔽之，自薩爾曼王子進入權力核心之後，巴勒斯坦因素只是以沙能否成為準同盟/同盟，甚至建交的棋子。但西方文獻上多從阿拉伯國家角度闡釋巴勒斯坦因素在中東區域政治的影響，卻少見自以色列的角度探討。本文將自以色列角度切入，輔以本論文作者在外派期間與以巴雙方官員親身接觸交涉經驗，探討以巴問題影響以沙關係正常化的程度，並以中文呈現，以彌補現有國內缺乏相關中東議題文獻之不足。



參、「願景2030」計畫

「願景2030」由薩爾曼王子在2016年4月提出，以「活力社會、繁榮經濟、雄心國家」為三大主題，目的在希望沙國至2030年時能成為回教與阿拉伯國家的核心，亞歐非三洲樞紐，讓沙國朝多元經濟方向發展，避免依賴石油成為國家唯一收入的現況（梅新育，2016）。

學者及文獻普遍質疑「願景2030」的效益，常在「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國際關係電子版」(E-International) 等著名外交專業期刊發表文章的科威特海灣大學副教授努魯茲曼 (Mohammed Nuruzzman) 對「願景2030」計畫評論時稱，「願景2030」是一項大膽的改革，但也是一個雙面刃，如果改革成功，將可強化鞏固薩爾曼王子地位，並對外拓展沙國勢力，強化沙國在遜尼派國家地位，但也將引發中東地區常態發生什葉派與遜尼派地盤重整；如果失敗，則會引起沙國內亂、皇室垮台，並外溢至其他「海灣國家合作理事會」國家 (Nuruzzman, 2018)。努魯茲曼在檢視「願景2030」執行的頭3年成果發現，除了開放婦女單獨駕車、允許婦女參加體育活動外等表面上的社會改革獲得好評外，沙國在「願景2030」推出後經濟表現並不如預期，沙國擁有大量天然資源及充沛的年輕勞動力，卻沒有和「願景2030」計畫連結，國外投資未增加，雖然油價穩定，財政歲入未減，但外匯存底驟降，沙國有一千萬外國勞工以最低工資工作，沒有基本勞動權力保障(Nuruzzman, 2018)。

真正阻礙「願景2030」計畫實施的是國內宗教及強大的部落政治，他們捍衛宗教價值、反對女性平權，沙國的教育無法提供「願景2030」所需的 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人才，在宗教科目佔據大多數課程的情況下，學生無法習得關鍵技術。根據2015年報告，沙國中小學生科學與數學成績全球最低，缺乏足夠的本



土人才執行「願景2030」的經濟改革，需仰賴具成熟技術的外來勞力，這使人力成本上升，反噬本土人才，如何扭轉人力結構使沙國國內人盡其才，會是「願景2030」計畫執行成敗的關鍵因素（Nuruzzman, 2018）。

美國布蘭戴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中東研究中心教授哈比比（Nader Habibi）對「願景2030」的看法，也與努魯茲曼副教授觀點相似，認為「願景2030」目標在使國家財源收入多樣化，不再只依靠石油收入，如果能成功，可以讓沙國成功轉型（Habibi, 2019）。

哈比比指出「願景2030」落實最成功的地方，在於沙國皇室成功地削減宗教警察權力，從原來可以不持理由拘捕、審問違反教義分子的權力縮減成只能勸說異議者、維持秩序的角色（Habibi, 2019）。

但反對「願景2030」計畫聲音不斷，特別是來自國內人權團體，他們抗議薩爾曼王子持續介入葉門戰事，並涉嫌主導2018年10月哈紹吉暗殺事件，哈比比教授認為，這兩事件使外資對「願景2030」的投資計畫卻步，日本軟體銀行原計畫於2017年投入450億美元資金用於發展沙國高科技及新創產業、建立沙國矽谷科技城計畫，卻因為「哈紹吉事件」使得該銀行收手（Habibi, 2019）。

哈比比認為，沙國「願景2030」就像中國或其他極權國家的經濟改革一樣，只提出經濟主張未伴隨政治改革，薩爾曼王子只是利用「願景2030」鞏固個人的權力地位而已，雖然在改善行政效率、文化、社會改革上略見成效，但在大型企業〔如「沙美石油公司（Saudi Aramco）〕私有化、外資投入國內房地產、科技、工業投資均未見成效，這些都可能危及薩爾曼王子在沙國的聲望和地位。哈比比預測，「願景2030」計畫的成功與否端視現年85歲的薩爾曼國王過世後，薩爾曼王子能否平順



繼任而定 (Habibi, 2019)。

綜上文獻，均對「願景2030」計畫因變數太多而均持悲觀看法。這些文獻只提「願景2030」本身執行，未與國際因素連結。

參、車維德的美日韓戰略三角理論

車維德所提美日韓在東亞存在著「二實一虛」的三角同盟。其中，美日和美韓分別於1951年和1953年簽訂「美日保障協定」與「美韓共同防禦條約」，各自形成穩固的雙邊聯盟。但日韓卻因為歷史、價值、理念等因素無法形成實質的同盟關係，韓國對日本曾在朝鮮半島殖民歷史（1910.8-1945.8）一直心懷芥蒂，日本則對南韓於韓戰後長期的威權統治、拒絕民主化、需索無度的歷史賠償屢表不滿，使得兩國雖然面對冷戰時期的共同威脅—蘇聯，與後冷戰時期取而代之的中國威脅時，產生既合作又衝突的情形，無法成為完全同盟，而是一組「二實一虛」的三角同盟，車維德稱其為「準同盟關係」並提出假說；美日韓三角關係的強弱會隨美國對日韓安全承諾強度而有變化，當美國對日韓的安全承諾強度提升時，日本與韓國會降低彼此合作，甚至出現摩擦；反之，當美國對日韓的安全承諾出現鬆動時，日韓基於「害怕遭到美國拋棄」所產生的恐懼，會不計前嫌的共同合作對抗威脅。如圖1-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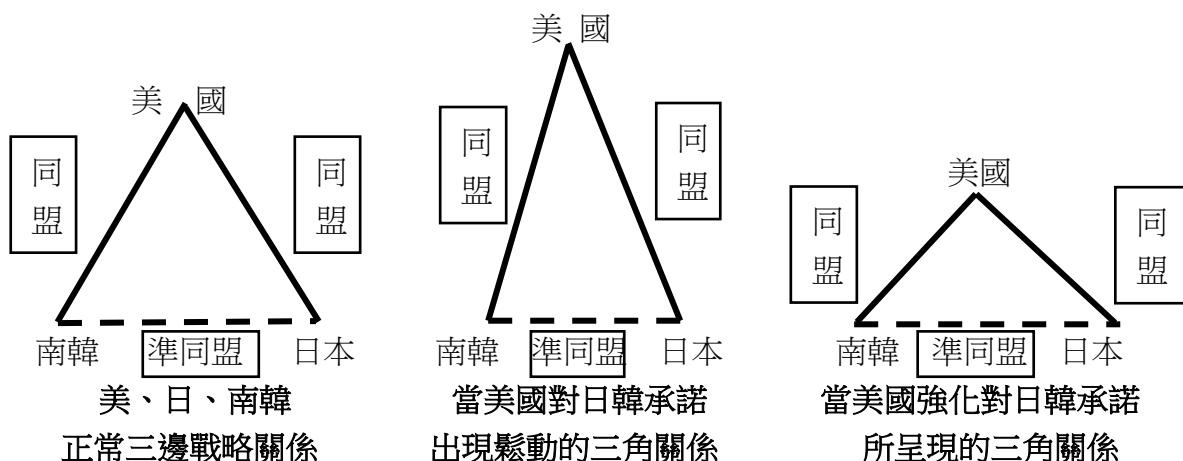


圖 1-1 車維德的美、日、南韓三角關係圖示（作者自行繪製）

車維德舉例，1973年2月，尼克森總統宣布自越南撤軍，讓日韓深恐美軍撤出東亞讓共產勢力滲入，各自向美國要求提出重申雙方軍事承諾，並拋棄成見，發展更緊密關係，對抗共同敵人；1977年卡特主張將美軍抽離東亞讓日韓再次產生「害怕被拋棄的恐懼」，拋棄成見合作對抗共同敵人；但當美國強化或加重對日韓安全承諾時，日韓關係會變得鬆散，因為他們都自認為有美國的保護，反而拉遠雙方關係。80年代雷根總統承諾強化對日韓武器軍售，以保護在亞洲盟國安全，反而使日韓關係不如美國宣布抽離美方勢力時的穩固；在美國重申安全承諾下，1982年日本修改教科書意圖淡化日軍在二戰期間對東亞國家的侵略行為（Cha, 1999: 186）引起日韓紛爭，印證了日韓同盟關係的不穩定。

1991年12月蘇聯解體，東亞進入後冷戰時期，美日韓這組三角同盟關係的共同威脅由崛起中的中國取代，但因為日韓對中國威脅的認知不同，使得這組三角關係是否產生質變？車維德在冷戰時期的假說能否套用到後冷戰時期的美日韓三角關係？尚待驗證。

車維德的上述準同盟關係論點之所以與本文有關之原因在於，美國在中東也有一個類似的三邊關係，以色列是美國在中東的重要盟邦，猶如美國在東亞和日韓的關係，他們也有共同的敵人—伊朗。但以色列猶如日韓之間，由於理念性因素，包括歷史記憶、文化認同、宗教、文明差異等，長期以來難以建立較為密切的合作關係。本論文將討論並驗證車維德所提美日韓「二實一虛」關係觀點是否能適用解釋在中東正在形成中的美以色列三邊戰略關係。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資料來源

基於中東問題錯綜複雜特性，相關國家均可能在某一事件中扮演一定角色，本



文係採用文獻分析法 (Document Analysis) 進行質性研究，除引用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智庫中東研究中心的書籍資料外，亦引用來自以色列與沙烏地阿拉伯的文獻資料，綜合梳理自 2009 年歐巴馬上任至 2020 年川普任期期間，美國的中東政策、以沙關係以及相關的中東情勢變化，部分議題會向前回溯自二次大戰結束起，橫跨象徵中東情勢轉折的「1979 年伊朗宗教革命」、開啟中東後冷戰時期的「阿拉伯之春」等節點，向後跨越至 2021 年拜登上台對前述美國中東政策進行反證。

第五節 研究變項與研究架構

本文的研究以 2009 至 2020 年歐川時期美國政府的中東政策與伊朗因素變遷作為研究的自變項，包括歐巴馬「重返亞洲」戰略下所為「縮減中東駐軍」、「提供中東盟國政治協助」、「堅拒對中東出兵」、打擊恐怖主義、敦促以巴雙方上談判桌推動「兩國方案」，繼之以在「阿拉伯之春」放任穆巴拉克 (Hosni Mubarak) 政權垮台，2015 年 7 月主導簽署伊朗「核協議」；至川普任內軍售沙國、撤出伊朗「核協議」、以巴問題一面倒支持以色列、哈紹吉事件、2020 年 8 月「亞伯拉罕協定」聲明等政策。

伊朗因素則以 1979 年宗教革命為起點，討論其透過提供瀕危國家(weak state) 及國家機器無法治理的地方 (non-state) 軍援及財政援助，在中東地區建立代言勢力 (Loft, 2022)，兼以發展核武，使以沙共同感受到威脅，在美國主導下，以沙或可能走向準同盟/同盟關係，抑或走向建交？

依變項部分，包括以沙兩國對美國中東政策及伊朗因素變遷之回應、彼此的外交政策演進以及兩國之間關係發展。發展出兩個論述：一是不管美國對以沙安全承



諾變化如何，以沙兩國關係發展是向前進的；二是不管以沙對伊朗威脅程度感受強弱，兩國關係亦是朝正向發展。這種因果邏輯呈現於圖 1-2 的研究架構圖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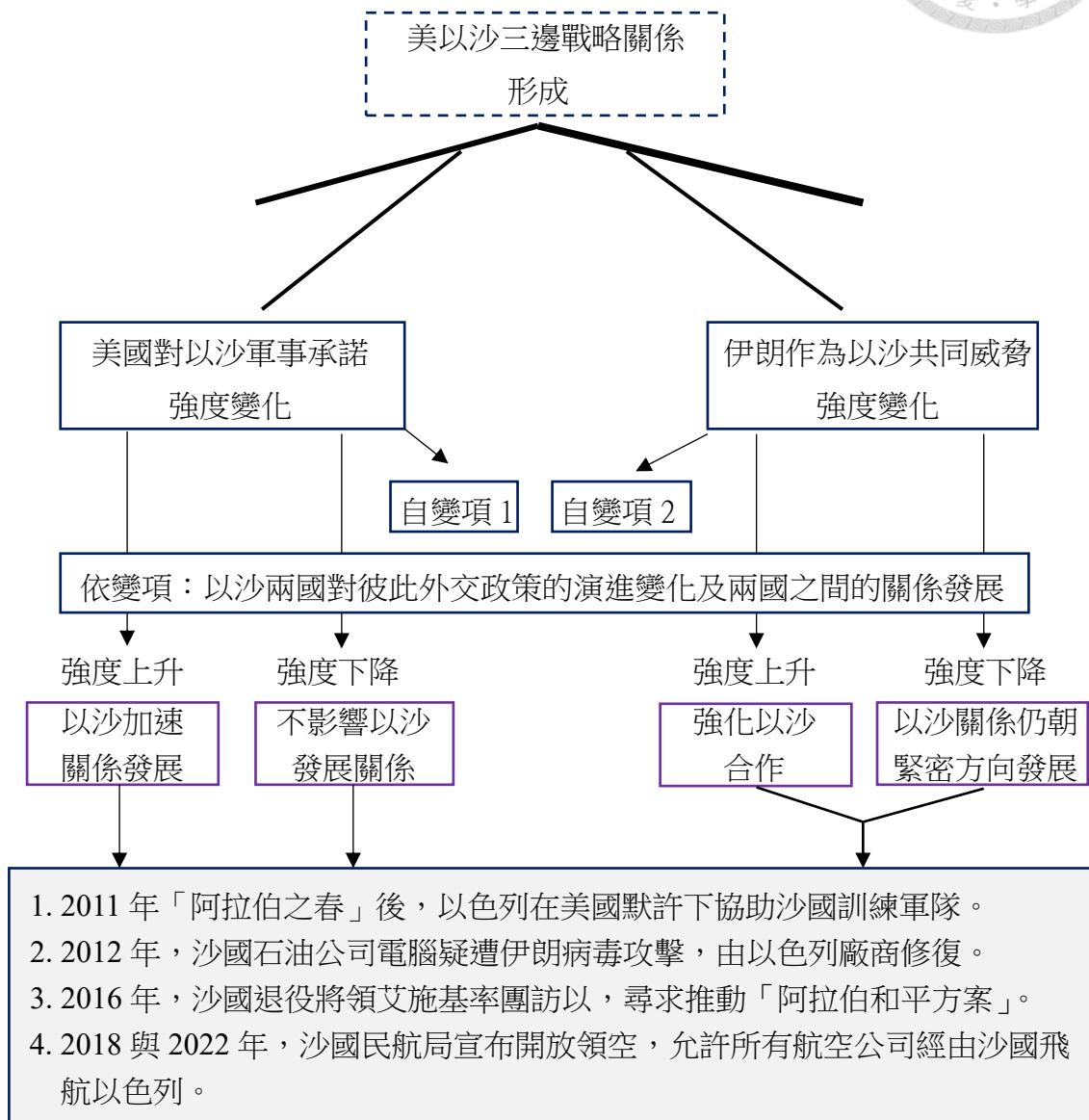


圖 1-2 美以沙三邊戰略關係形成（作者自行繪製）

沿續上圖，在美國的主導下，美以沙有是否有走向三邊戰略關係趨勢？基於美以與美沙兩組關係成立的時間與背景不同，兩組戰略關係的強度不同，美以戰略夥伴關係是漸次形成，美沙關係自 1933 年紹德皇室成立到 2010 年油頁岩產業興起前，一直是以軍售交換石油利益及區域安全，儘管 2019 年後美國因油頁岩量產躍



居全球第一原油產國，使兩國成為競爭者，但沙烏地阿拉伯仍是美國維持中東區域安全的支柱。至於以沙關係雖向前發展，但因為巴勒斯坦與沙國國內因素使兩國無法踏入準同盟/同盟關係，或是進一步走向建交？如下圖 1-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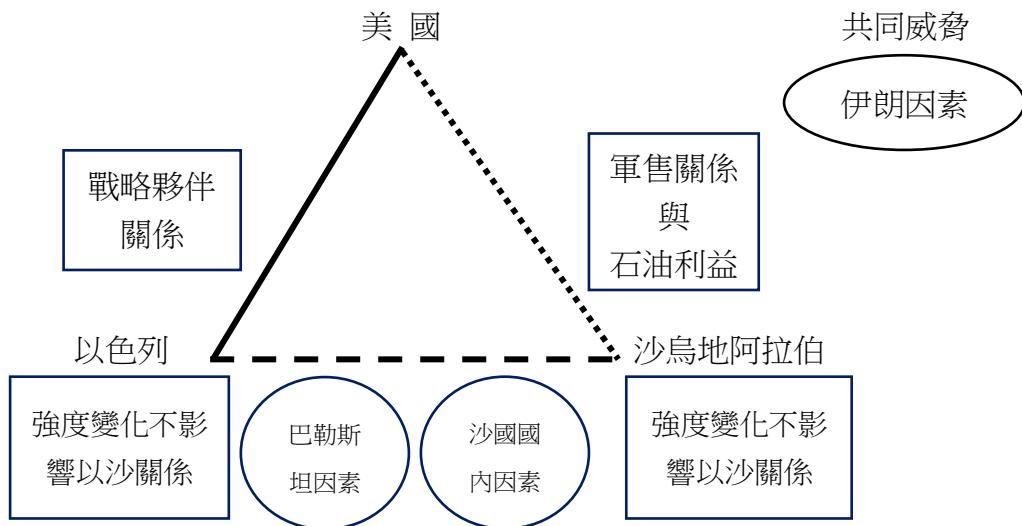


圖 1-3 美以沙三邊戰略關係（作者自行繪製）

當美國的安全承諾強度降低時，沙國基於國家利益，維護皇室政權，而可能在強化與以色列關係同時，與其他強權，如中國、俄羅斯、印度、巴基斯坦等國家合作，如圖 1-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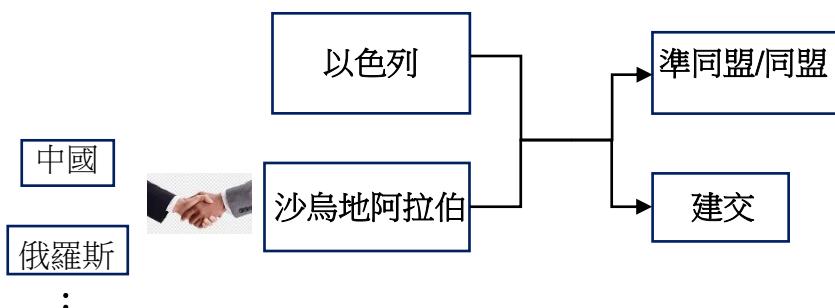


圖 1-4 以沙關係未來走向（作者自行繪製）

第六節 研究限制



本論文作者因工作關係曾外派以色列，與以國政府、學術界熟稔，故本文所引用的資料，多來自以色列學者及智庫的一手資料，輔之以美國中東研究學者及智庫的資料，故多從以色列和美國的角度探討，這是國內論文較少有的角度探討。由於不熟稔阿拉伯語，故在沙國和伊朗方面的資料上，除引用美國智庫中東問題研究中心的資料外，多擷取自沙伊兩國政府或智庫在網路上的英語資料，抑有來自歐洲、俄羅斯之中東智庫的二手資料，所以資料來源及所產生的論點仍有討論之處。

其次，巴勒斯坦問題受限於巴國自身分裂成為「法塔」與「哈瑪斯」兩派系，無法找到一個可以代表全體巴勒斯坦的觀點，而僅能自美國、阿拉伯國家和當事國之一以色列的角度闡釋，且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國民議會議員已超過 10 年未改選(上次改選為 2006 年)，數目不詳且無身份待回歸巴勒斯坦難民遍布於約旦、敘利亞、埃及、沙烏地阿拉伯等國家，故本論文不擬從巴勒斯坦角度探討。

另一方面，本文所引述的學者觀點，對同一事件有不同的闡釋，只能各自表列，最後再綜整其異同推估可能的發展，這是國際關係特有的展現，一個強人的觀點或作為可能推翻推估的結論。

最後，本文所討論的美以沙三邊戰略關係以軍事、外交、能源合作關係為主，經貿層面受限於以色列猶太裔人口分佈世界各洲，難以數量化展現雙邊或多邊貿易關係。也因為素材較為新穎，希望本篇的撰擬能為國內中東問題研究提供新素材，供後人進一步研究參考。





第二章 美國的中東政策與伊朗因素的變化

本章在敘述本論文兩核心自變項，一是美國中東政策的變遷，一是伊朗的政策變遷。

第一節 美國中東政策的變遷

美國前駐埃及大使艾塞頓在 1984 年所撰”Arabs, Israelis—and Americans: a Reconsideration”一文中形容美國的中東政策像是「鐘擺」一樣，一端是從宏觀的全球角度以「應然面」看中東，而給予中東各國各種期盼的角色；另一端是「國內政治因素外溢影響」，由國內各組勢力對決決定中東政策。在面對中東境內各項問題，鐘擺時而朝左，時而朝右，忽以全球角度看，忽以國內角度由各方政治角力結果決定政策方向。(見下頁圖 2-1)

1948 年第一次中東戰爭，美國影響力尚未進入中東，因而是把鐘擺放在「宏觀的全球角度」支持聯合國決議，要求以阿雙方儘速結束戰爭；50 年代初，鐘擺的「國內政治因素」這一邊由猶太勢力和阿拉伯勢力對決，最後由於阿拉伯勢力不團結，表面雖支持巴勒斯坦建國，實則為爭奪巴勒斯坦領土各懷鬼胎而失敗，由猶太勢力勝出，在「國內政治」的鐘擺方決定了美國「支持以色列」立場。

此時正值冷戰形成前夕，美國正在重建國際秩序，重心放在歐洲，對亞洲採取「靜觀其變」態度，對中東的政策如鐘擺般時而朝左、時而朝右，但核心政策利益是「避免蘇聯勢力滲入」，這點不被中東國家認同，因為當時的阿拉伯國家認為以



以色列比蘇聯的威脅更大，所以埃及和敘利亞轉向蘇聯，允許蘇聯派駐軍事顧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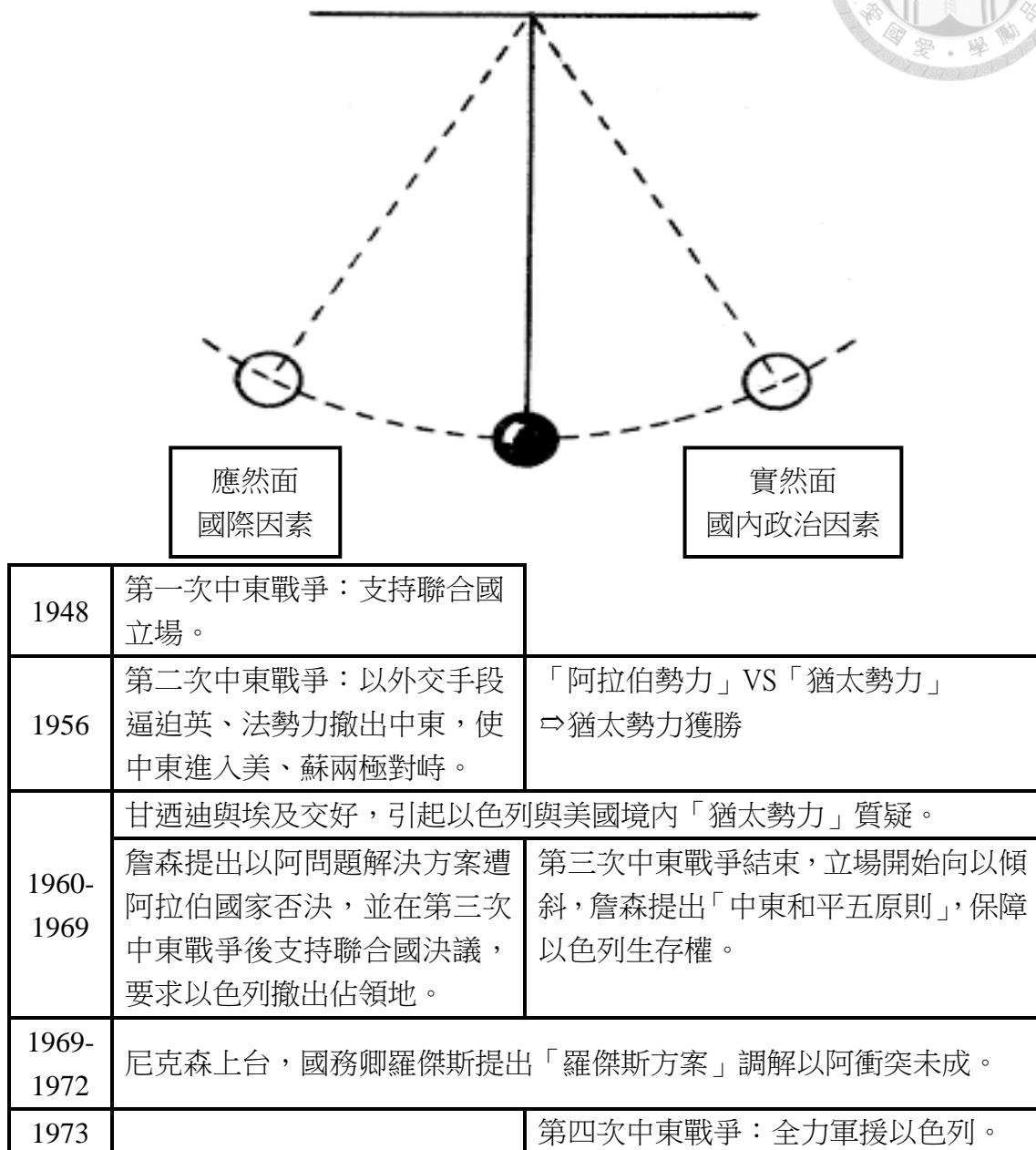


圖 2-1 美國在 1973 年以前中東政策鐘擺立場（作者自行繪製）

1956 年 10 月，第二次中東戰爭爆發，埃及納塞政府宣布將蘇伊士運河國有化，引起英法舊殖民勢力反對，英法鼓動以色列出兵佔領西奈半島，雙遭美國反對，除強迫英法放棄控制蘇伊士運河，使英法勢力撤出中東，另強迫以色列撤出西奈半島，



這讓阿拉伯國家一度誤以為美國友以態度改變，轉向支持阿拉伯國家，實際上是美國為防止已在埃及、敘利亞的蘇聯勢力進一步滲入中東，美國的中東政策並沒有改變，仍在鐘擺間搖擺中。

到了 60 年代初，美國的中東政策鐘擺又擺回以「應然面」聚焦於解決個別中東衝突中。甘迺迪政府（1961.1-1963.11）積極與埃及建立關係，遭以色列懷疑及國內猶太勢力的反對，至詹森時期（1963.11-1969.1），美國發展出一套可以同時解決以阿與巴勒斯坦難民問題方案。但這個努力始終遭到「阿拉伯國家拒絕承認以色列」與「堅持巴勒斯坦建國」兩立場而無疾而終。

1962 年 9 月葉門政變導致埃及與沙烏地阿拉伯關係緊張，期間以色列因屢受來自約旦和敘利亞鼓動境內巴勒斯坦恐怖份子的攻擊而對兩國反擊，埃及為表示對約旦、敘利亞的支持，封鎖蒂朗海峽，進軍西奈半島，最終引爆以色列於 1967 年 6 月發動第三次中東戰爭，以六天時間擊潰埃及與敘利亞軍隊。此時美國鐘擺仍在「全球角度」面向，支持同年 11 月 22 日聯合國安理會 242 號決議，要求以色列撤出第三次中東戰爭所占領的土地、衝突各方立即停戰、保證蘇伊士運河等國際航道暢通。

1969 年 1 月，尼克森總統上台，美國鐘擺在「全球角度」以「應然面」防堵蘇聯勢力進入中東，羅傑斯（William Rogers）擔任國務卿調停以埃衝突，並提出「羅傑斯方案」試圖讓以埃雙方落實 1967 年聯合國安理會 242 號決議，要求以色列撤出「六日戰爭」所取得土地，各方立即停戰，保證蘇伊士運河暢通，但均不被



雙方接受，¹⁰ 導致 1973 年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

1973 年 10 月第四次中東戰爭，由白宮支持羅傑斯國務卿所提出的以阿衝突解決方案和國務院所代表的「防堵蘇聯滲入中東」思維，在「全球角度」的鐘擺端對決，結果是國務院所代表的勢力取勝，在防堵蘇聯勢力滲入下，決定對抗曾獲蘇聯支持的埃及，全力支持以色列。

1973 年季辛吉 (Henry Kissinger) 就任國務卿，改採「權力平衡、遵守國際法、漸進式的和平」的政策思維，他以康德 (Immanuel Kant) 的思想為圭臬，認為「國與國間的衝突最終將因資源耗盡而達成和平」(Conflict between states would lead over time to the exhaustion of their powers. Eventually they would prefer peace to the misery of war.)，中東和平是漸進形成的，無法一蹴可幾，中東的秩序維持重於和平，所以尋求中東和平的方式並非是各國簽訂和平條約，而是取得各方都同意的一個秩序，它不會讓衝突消失，但會縮小規模。他另引用奧地利外交家梅特涅 (Klemens von Metternich) 和英國前外交事務大臣凱薩里 (Lord Castlereagh) 的說法認為，中東應該倣效 19 世紀的權力平衡體系，讓中東形成一個各方都同意的秩序 (Indyk, 2021:155)。

據此，他發動以色列、埃及、敘利亞和平進程。首先在 1973 年 10 月第四次中東戰爭結束後，在以埃進行「穿梭外交」，在 1979 年卡特總統任內完成「以埃和平協定」，以埃建交。

10. 「羅傑斯方案」：(1)以色列與埃及談判迦薩地區安全及阿卡巴灣通行權；(2)以色列必須撤出「六日戰爭」自埃及所取得的土地，並根據安全需要調整邊界；(3)就地安置及賠償巴勒斯坦難民問題；(4)將耶路撒冷國際化，成為以色列和約旦共有的城市；(5)有關各方應先就解決以巴問題的整體計畫達成協議，再探究實際執行方法。



但這樣的思維到了柯林頓時期被冷落，到 2003 年更因小布希總統派兵發動伊拉克戰爭而破壞，造成伊朗崛起，挑戰中東由美國為主導以遜尼派阿拉伯盟國為主的權力平衡體系。

前國務卿萊思 (Condoleezza Rice) 在 2008 年的一篇文章 “Rethink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American Realism for a New World” 中指出，2001 年「九一一事件」讓美國重新審視國家利益，改以「國土安全」取代「世界警察」作為國家利益核心。「九一一事件」打破了外界認為中東獨裁國家沒有反對團體的假象。為此，美國在中東除「繼續維持和傳統盟邦關係」外，增加了「消滅恐怖組織」的核心目標 (Rice, 2008: 1-2)。

萊思在同篇文章指出，美國的中東利益是以「區域穩定」為主，但二戰後美國不管是民主黨或共和黨總統主政，其中東利益是矛盾卻相互依存，既支持中東的獨裁政權國家，卻又要求他們推動民主。這表現在埃及、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等中東盟國上。美國對此類盟國的核心要務是協助控制力不佳的統治者（皇室）強化內部控制 (Rice, 2008: 1)。

中東國家受「全球化」(Globalization) 影響對內部更不易控制，這種控制力不佳情形外溢到其他國家，使得中東秩序越趨不穩定，降低國際秩序穩定 (Rice, 2008: 16)，「阿拉伯之春」即在此背景下發生，造成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葉門四國政府被推翻。

綜合上述，艾塞頓、季辛吉與萊思都認為美國應扮演中東秩序的衡平者，中東主要國家（沙烏地阿拉伯、以色列、伊朗、埃及...）的對外政策都會因美國中東政策的變動而改變。



第二節 歐巴馬時期的中東政策

2009年1月歐巴馬上任，延續前述「國土安全」取代「世界警察」理念，針對小布希總統所遺留下來的伊拉克駐軍問題、以巴和平進展停滯、恐怖組織發展方興未艾、伊朗持續發展核能力等泥沼，他以「縮減對外駐軍」並「提供中東國家政治協助」為政策主軸，輔之以緊縮外交政策、要求當地盟國擔負更多責任、堅拒出兵處理任內中東問題（Lynch, 2015: 18）。

因此，歐巴馬將「美軍撤出伊拉克」視為上任後優先政策，依據自己的進度執行，並在超越解決舊有戰爭泥沼的背後，努力排除讓美國再陷入新的戰爭中，利比亞、敘利亞、遭伊朗染指的伊拉克、葉門等均未見大量美軍進入（*No boots in Syria, Iraq and Yemen*）。

但在實際執行時卻發現，他的「縮減對外駐軍」乃至「堅拒出兵中東」提供了伊朗、俄羅斯、中國勢力介入的機會。在伊拉克，美軍於2011年11月撤出後落入伊朗控制，並成為什葉派國家及恐怖組織溫床；在敘利亞、美軍撤出使其遭俄羅斯與伊朗勢力分據，大批難民湧向歐洲且超過10年內戰迄今未息；在利比亞，美國和西方支持的叛軍擊潰格達費（Muammar Qaddafi）政府軍，不僅未讓其成為民主國家，反而使利比亞成為由數支回教勢力把持的分裂狀態（Kuperman, 2015）；在阿富汗，歐巴馬於2012年10月宣布逐步撤出駐阿美軍，當最後一批美軍於2021年8月底撤出後，原扶植的阿富汗政府軍旋即遭塔里班民兵推翻及佔領，權力真空由中國填補（Adamczyk, 2022）。而「提供中東國家政治協助」則被盟國拿來做為維護獨裁政權的護身符，間接造成「阿拉伯之春」自北非蔓延進入波斯灣。



在以巴議題上，歐巴馬在 2009 年 1 月 23 日上任第三天，即派遣前參議員密契爾（George Mitchell）為中東特使前往以國要求停止在約旦河西岸的屯墾興建，並力促以巴雙方重上談判桌（CNN, 2009/01/22），2010 年末，首次嘗試安排以巴雙方討論以色列屯墾區興建問題。2013 至 2014 年，國務卿凱瑞（John Kerry）努力協調以巴雙方建立新的框架，卻遭以色列總理納唐雅胡陽奉陰違式的抗拒及巴勒斯坦的不諒解而一事無成。¹¹ 針對以色列，歐巴馬雖嚴厲抨擊以色列的屯墾作為並稱其將威脅「兩國方案」（Two-State Solution）的推動，¹² 但終其八年任期因未見其停止屯墾行為，而激怒歐氏在 2016 年 12 月任期結束前於聯合國安理會處理以國屯墾行為的譴責案中投出棄權票，¹³ 讓聯合國首次通過譴責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的屯墾行為，不再為以國護航，讓美以關係降至冰點。

針對巴勒斯坦內部分裂，歐巴馬孤立了反對和平解決以巴衝突的「哈瑪斯組織」，並於 2011 年 5 月宣布「以巴邊界應在雙方同意下基於 1967 年界線訂定」，並在第二任期朝這目標前進，一再宣稱以巴衝突的解決是其核心利益，但他實際作為卻與此背道而馳。他一再說以巴現狀難以維持，卻又拒絕嘗試改變現狀，2011 年 9 月，歐巴馬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阿巴斯（Mohammed Abbas）於聯合國大會開會期間於紐約會面，直接表達反對巴勒斯坦入聯申請，並稱必要時將動用否決權，但巴勒斯坦仍在同年提出，最終在 2012 年 11 月 27 日獲聯合國大會投票通過成為

-
11. 美國國務卿凱瑞致力爭取以巴在 2014 年 7 月底前重啟談判，要求以色列不要在此期間宣布新的屯墾計畫，納唐雅胡總理雖未公開表態卻在「利庫黨」（Likud）內部會議重申將繼續「擴建」屯墾區，引起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憤慨。
 12. 「兩國方案」（Two-State Solution）主張以巴兩國依據 1967 年第三次中東戰爭以前的邊界，分別建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國，其中巴勒斯坦國包括約旦河西岸和迦薩走廊地區。最早是在 1974 年由聯合國提出，到 1991 年「馬德里會議」逐漸為各國接受。以國態度隨國際情勢而對本案採游離態度，其未停止的屯墾行為是「兩國方案」推動的主要障礙。
 13. 聯合國安理會與 2016 年 12 月 23 日通過 2334 號決議案，譴責以色列在包括東耶路撒冷在內的巴勒斯坦領土的屯墾行為，美國一改以往行使否決權，改以棄權表示對以不滿的態度。



觀察員，使歐巴馬成為 40 年來首位在以巴問題上毫無建樹的美國總統 (Elgindy, 2016)。

2010 年 12 月 17 日，「阿拉伯之春」自突尼西亞爆發並在隔月蔓延至中東引發骨牌效益時，歐巴馬顯得措手不及，對每個受「阿拉伯之春」影響的國家視其與美關係、原統治者是否遭推翻、各國反對勢力在推翻政府後有無能力統治而做不同反應 (Jervis, 2017: 39-45)。

在埃及，2011 年 1 月 25 日，埃及群眾發動反穆巴拉克總統示威遊行，很快就變成大規模反對運動，美國政府對如何應對呈現分歧，國防部長蓋茨 (Robert Gates)、國務卿希拉蕊 (Hillary Clinton)、副總統拜登對推翻穆巴拉克下台持審慎態度，因為這樣做將危及美國在中東利益；但白宮年輕一代幕僚均認為這是歷史的契機，如果不趁此機會把穆巴拉克推翻下台，將無法兌現歐巴馬先前在開羅大學演講對中東擘畫的願景。¹⁴ 最後歐巴馬採納年輕幕僚的意見，在抗議活動的第 4 天 (1 月 28 日) 逼迫穆巴拉克下台遭拒，最後在歐巴馬公開要求埃及統治階層需和平移轉政權要求下，穆巴拉克於 2 月 11 日下台，距離群眾發動抗議日起算僅 18 天，效忠美國長達 30 年的穆巴拉克政權就此下台。

在利比亞，2012 年 2 月港口城市班加西 (Benghazi) 爆發反政府示威，意圖逼迫格達費下台，格達費原來反美且支持恐怖主義，在 2003 年 3 月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時轉向，與美國在「反核」與「反恐」議題上合作。但當「阿拉伯之春」於 2011 年 2 月 15 日蔓延至利比亞要求格達費下台時，歐巴馬於 2 月 27 日公開附議，並加入西方陣營制裁，最後格達費於同年 8 月下台，10 月遭到殺害。

14. 歐巴馬於 2009 年 6 月 4 日於開羅大學演講，主張美國與全球各地穆斯林間要有一個「新開始」，並呼籲伊斯蘭國家擁抱民主、婦權、容忍異教、以巴和平共存、以色列應停止屯墾區興建。



在敘利亞，「阿拉伯之春」帶來迄今超過 10 年未息的內戰。一開始，敘利亞猶如利比亞，內部異議人士發動大規模反阿薩德統治的遊行，敘利亞政府一開始即以武力鎮壓，為避免造成人道災難，歐巴馬仍本於「堅拒出兵中東」政策，排除軍事介入敘利亞戰事，結果造成多方國際勢力介入無解並產生難民潮，有超過 600 萬敘利亞難民逃離家園，美國對此束手無策。

在對抗恐怖主義上，歐巴馬仍奉行他「堅拒出兵中東」的政策，改以無人機、區域結盟、扶植當地友美勢力等方式處理，這在他第一個任期（2009.1-2012.1）做的相當成功，2011 年 5 月賓拉登（Osama bin Laden）遭狙殺後，蓋達組織勢力迅速式微。但在「阿拉伯之春」後，許多恐怖組織藉由選舉取得政權而無法根除，「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即為一例，它在「阿拉伯之春」後透過選舉成為突尼西亞和埃及的執政黨。

但之後的發展卻是，2013 年 7 月埃及發生軍事政變，國防部長塞西（Abdel Fattah al-Sisi）發動政變推翻經由民選產生「穆斯林兄弟會」的總統摩西（Mohammed Morsi），敘利亞內戰未息、伊拉克因前總理馬利基（Nouri Kamil Mohammed Hassan al-Maliki）治理不當（misrule），造成「伊斯蘭國」在兩國崛起，使得這些飽受「阿拉伯之春」影響的國家對民主不信任、日益嚴重的暴力衝突、不安定，而朝向極端主義方向發展。

2015 年 7 月 14 日，歐巴馬政府為在其任內中東政策留下一些後續影響，率「伊朗核問題六國機制」與伊朗政府簽署「核協議」（Collinson, 2015），伊朗據此需交出已生產的濃縮鈾、三分之二的離心機、未來 15 年內不得生產濃度超過 3.67% 濃縮鈾且須不定期接受「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的檢查，如果伊朗確實遵守核協定的各項內容，美國、歐盟及聯合國安理會將解除對伊朗的經濟制裁作回報。歐



巴馬並於同年 10 月宣布有條件解除對伊朗經濟制裁。

歐巴馬此舉原意不在完全禁絕伊朗使用核技術，而在透過國際社會力量限制伊朗將核技術使用於和平用途，斷絕伊朗發展核武的可能。然而歐巴馬沒有意料到的是，「核協議」的簽訂引起了國際社會強烈反應，它使美以關係緊繃、美沙關係緊張、以沙進行抬面下的合作、伊朗持續輸出恐怖主義使什葉派與遜尼派的衝突加劇。

第三節 川普時期的中東政策

2017 年 1 月川普上任，延續歐巴馬時期將軍力撤出中東，重返亞洲大戰略，未再大幅增加中東駐軍，提供其認定的中東盟國政治協助，但推翻了許多歐巴馬的政策。

在以巴問題，川普改採對以色列「一面倒」政策，2017 年 2 月就任之初宣布不再堅持「兩國方案」，並分別任命極右派猶太裔律師佛萊德曼（David Friedman）擔任駐以色列大使、在猶太屯墾區長大的格林布雷特（Jason Greenblatt）為以色列顧問、女婿庫許納（Jared Kushner）負責主導以巴和平談判進程，他們都不認為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領地上的屯墾行為非法，非以巴和平障礙，並把反對屯墾者視為「納粹的同路人」（Zunes, 2018）。稍後川普於 12 月 6 日宣布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隔（2018）年 5 月 14 日以色列獨立 70 周年紀念日，將美國駐以大使館自台拉維夫遷至耶路撒冷（Zunes, 2018）。

庫許納和納唐雅胡是私人好友，個人在以色列有商業往來，是庫許納家族基金會的共同理事，該基金會出資支持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領地的屯墾行為。2019 年 3



月 25 日，川普在與以色列總理納唐雅胡舉行新聞記者會上簽署協議，承認戈蘭高地是以色列的一部分，並宣布關閉美國位於耶路撒冷駐巴勒斯坦總領事館，造成巴人赴美簽證困難。以上舉動，讓川普謀求以巴雙方回復和談的機會微乎其微 (Zunes, 2018)。

巴勒斯坦一直以承認以色列擁有西耶路撒冷主權來換取以色列對巴國在東耶路撒冷主權的承認，但川普忽視這一歷史事實，導致巴勒斯坦拒絕回到談判桌，並認定川普不是公平裁決者，川普政府對此以斷絕提供「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及工程處」的財政援助作報復，斥責巴勒斯坦無意與以色列發展和平進程。

綜觀川普的外交政策，本質上充滿不確定性，既沒有經過內部詳細討論，也沒有具體的執行方法，所以當執行碰到各方衝突的壓力時，川普立刻就退縮搖擺，尤其表現在其 2018 年 5 月宣布退出伊朗「核協議」上 (Zunes, 2018)。

川普政府認為 2015 年 7 月歐巴馬前總統與伊朗所簽「核協議」讓伊朗仍存在生產核武的空間，並在 2017 年 12 月所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明指伊朗仍持續違反協議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把伊朗和北韓並列「流氓國家」(rouge states)，認定其危害區域穩定、威脅美國及盟邦安全 (The White House, 2017)。因而在 2018 年 5 月宣布退出「核協議」，改以對伊朗施以強度無上限的經濟制裁，並要求伊朗除非遵守以下 12 項要求，才能換取新的協議，否則美國將對伊朗採無上綱的經濟制裁，一直到其無能力生產核武為止，為伊朗所拒。

1. 向國際原子能總署報告所有與軍事有關的核計畫並放棄推動。
2. 停止生產濃縮鈾並關閉重水反應爐。
3. 允許國際原子能總署無條件進入境內任何可能生產核武的地點檢查。



4. 停止試射導彈及進一步研發具投射核子武器的導彈系統。
5. 釋放伊朗境內遭扣押的美國公民。
6. 停止支持中東地區恐怖組織。
7. 停止支持阿富汗及周邊地區塔利班恐怖分子。
8. 終止伊朗革命衛隊聖城旅對外輸出武器。
9. 尊重伊拉克政府的主權，允許其境內什葉派民兵解除武裝，重返社會。
10. 停止軍事支持反葉門政府的「胡塞組織 (Houthi)」，促進葉門問題和平解決。
11. 停止威脅以飛彈攻擊以色列和沙烏地阿拉伯。
12. 不再威脅國際航道安全及發起網路攻擊 (Al Jazeera, 2018/05/21)。

問題在於，他的國安顧問群在提出這 12 項要求同時，並沒有再討論要投入什麼樣的資源執行。相反地，只聽到代理國防部長沙納漢 (Patrick Michael Shanahan) 反覆強調「中國」才是美國優先處理的標的，不是伊朗 (McGurk, 2020)。

在高壓經濟制裁一年後，伊朗依然固我，對發展核武的態度未改變，反利用美國撤出伊朗「核協議」測試美國對沙烏地的安全承諾。2019 年 5 月 12 日，伊朗攻擊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海域內的沙烏地油輪，川普沒有果斷採取軍事報復，同年 9 月，伊朗透過葉門「胡塞組織」以無人機和飛彈攻擊沙國在阿布蓋格 (Abqaiq) 與庫瑞斯 (Khurais) 兩處的煉油設施，川普仍然毫無作為，只有在推特上發表威脅語言，讓伊朗更加挑釁，也讓沙國對美國期待(希望美國採取包括出兵在內軍事措施)產生落差，埋下沙烏地皇室對美國的不信任感，轉而尋求可能的盟國（中國、俄羅斯...）取代美國在中東地位 (Farouk & Leber, 2022)。10 月，伊朗利用其在伊拉克扶植的民兵 (Kataib Hezbollah, KH) 攻擊駐伊美軍，表示美國對伊朗的經濟制裁無效，川普仍無對策，一直到第 11 次伊拉克民兵的火箭攻擊造成美國基地承包商死亡後，美國才反擊，伊拉克民兵隨後攻擊美國駐巴格達大使館，川普一直到 2020



年 1 月 3 日下令並以無人機在巴格達機場外狙殺伊朗革命衛隊聖城旅 (Quds Force) 指揮官蘇雷曼尼 (Qasem Soleimani) 作為報復 (Crowley et al., 2020)。

這樣的攻擊→反擊模式變成一個無盡的循環：當伊朗對波斯灣美國利益發動攻擊，美國即以加強經濟制裁方式（非軍事攻擊）反擊，當伊朗暫停攻擊，川普即稱目標已達成，回復到原先對伊朗的嚇阻政策，隨後伊朗為表示川普的經濟制裁無效，再發動下一次攻擊。（見圖 2-2）

川普的高壓經濟制裁並沒有使伊朗屈服，反而更具侵略性，它儲存更多濃縮鈾、有更多的離心機，並建立與支持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葉門境內親伊勢力，川普政府原先設定以伊朗遵守 12 項要求換取新的核協議目的完全沒有達成。

在對抗恐怖組織上，川普沒有遵循歐巴馬「堅拒出兵中東」政策，而是增派軍隊進駐敘利亞和伊拉克，空中攻擊伊拉克大城摩蘇爾、拉卡等城市，掃蕩當地恐怖組織及背後支持的伊朗勢力，2017 年 4 月，美軍在掌握敘利亞軍隊以化學武器攻擊 ISIS 所掌控的汗謝洪鎮 (Khan Sheikhoun) 並造成平民死傷後，以巡弋飛彈自海上攻擊敘國空軍基地及效忠敘國的民兵組織 (Davenport, 2017)。此外，和以沙烏地阿拉伯為首的「海灣國家合作理事會」合作，防堵由伊朗支持的恐怖組織。

在對沙烏地阿拉伯的關係上，川普服膺現實主義，把兩國關係建立在軍售、安全合作與石油利益上 (Zunes, 2018)，在美國撤出中東的戰略態勢不變下，2017 年 5 月，川普以沙烏地阿拉伯作為他上任外交出訪的首站，對沙出售一千一百美元武器，並簽署 10 年軍售協議做為對沙安全保證，以延續皇室的生存換取石油利益及穩定油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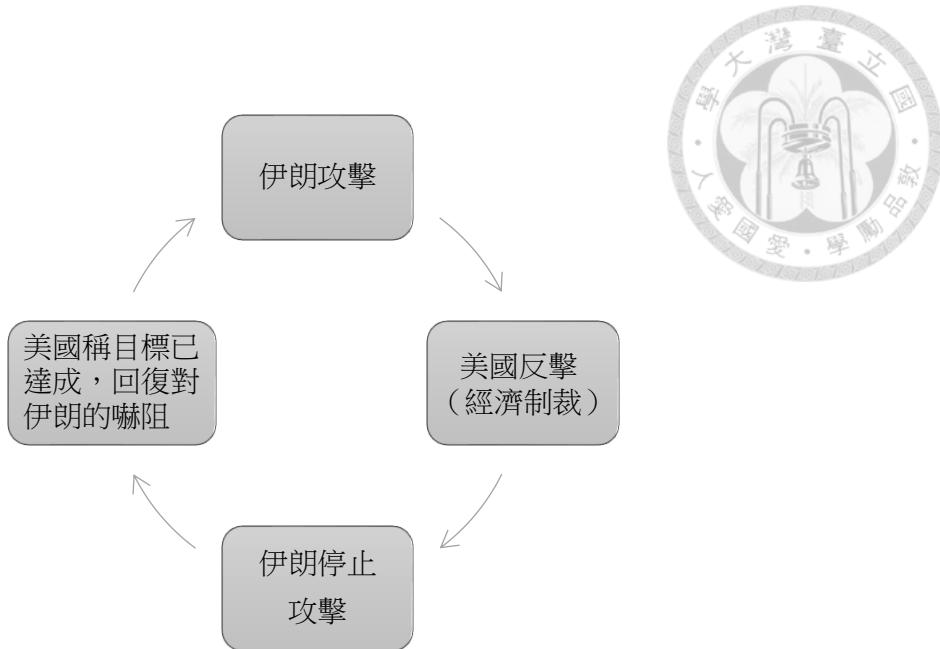


圖 2-2 川普時期經濟制裁伊朗困境(作者自行繪製)

2018 年 10 月 2 日，沙烏地阿拉伯異議記者、美國「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哈紹吉在沙國駐伊斯坦堡領事館遭殺害，美國參議院於 2019 年 3 月 4 日為此通過譴責案 (Bowman, 2019)，要求薩爾曼王子要為哈紹吉的死及葉門內戰所造成的人道危機負責，但被川普否決，川普對沙國在哈紹吉被刺事件上採取寬容態度，讓薩爾曼王子知道他不用對哈紹吉的死負責，為的是要以此換取沙國增產石油，降低油價，共同對抗伊朗及恐怖組織，協助鞏固美國在中東地位。

2020 年 8 月 13 日，在川普的牽線下，以阿發表聯合聲明並於 9 月簽訂「亞伯拉罕協定」，在以色列同意「暫時中止」以屯墾行為併吞約旦河西岸條件下，陸續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安曼、巴林、摩洛哥、蘇丹建交，目的在將以色列融入美國在中東聯盟防禦體系之一員，讓以阿並存 (Zanotti, 2022)，和 73 年前形同水火的以阿關係對照完全反轉。此時，沙烏地阿拉伯因受限於遜尼派領導國地位及巴勒斯坦因素，而未在此波跟隨與以建交。



第四節 伊朗的政策變化

伊朗曾經是在宗教上海納百川、兼容並蓄的國家，用精確的文字形容，應該是個「部落國家」，它的部落觀念凌駕於王權之上，伊朗人從小就被馴服於對父權的絕對尊崇，延伸到對部落酋長的服從；宗教的印記深刻在人民心中，宗教領袖和總理的關係猶如美國總統和最高法院的關係一樣，是相互制衡的（林佑柔，2019: 164-166），政教合一政權的本性是自古就有，要施行純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幾乎是不可能。

1908 年，英國在伊朗開採到石油後，透過「英伊石油公司」（Anglo-Iranian Oil Company, AIOC）以「經濟殖民」的方式掠奪石油資源，與蘇聯分別瓜分伊朗南部，後者在亞塞拜然區建立「吉蘭共和國」（1920.5-1921.5）、庫德區建立「庫德斯坦共和國」（1945.12-1947.12）掠奪政治利益。

二次大戰後，伊朗想與英國重新談判石油利潤分配，遭英國拒絕，1951 年 3 月，總理摩薩台（Mohammad Mosaddegh）單方面取消與英伊石油公司和約，將石油公司國有化，英國威脅出兵並遊說美國共謀策動政變讓摩薩台下台，時值美蘇冷戰全面爆發，英國以伊朗恐為中東下一個骨牌為餌，由軍情六處（MI 6）與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合作於 1953 年 8 月策動政變讓摩薩台下台，迎回外逃的巴勒維國王主政，此舉破壞了伊朗穩健派的政治力量，讓統治階層獨裁化，為極端份子開闢道路，並埋下伊朗延續至今的反美情緒（林佑柔，2019：253）。

巴勒維為人優柔寡斷、懦弱，為維持政權延續，他成立類似東德的史塔西（STASI）的「薩瓦克」（Sazman-e Ettelaat va Amniyat-e Keshvar, SAVAK）組織，目的在鎮壓包括宗教在內的各方反對勢力，對外極度親美、擴充軍備，自詡為蘇聯勢



力的抗衡者，1953 年執政後獲得美國 10 億美元金援，領導伊朗於 1955 年加入「巴格達公約組織」(Bagdad Pact)，後因 1958 年伊拉克政變變成「中部公約組織」，與亞洲「東南亞公約組織」、西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為冷戰時期美國圍堵蘇聯勢力向外擴張的三大聯盟。1964 年與美國簽訂軍事合作協定，允許美軍在伊朗享有排外的刑事管轄權，勾起人民對過去英蘇列強不平等條約的回憶，瘋狂地對美採購軍備，到尼克森時期達到高峰，1972 年後的五年間軍購金額超過 100 億美元，遠超過伊朗實際國家安全所需，美國甚至透過以色列向伊朗提供核武技術與設備，成為 30 年後伊美核對抗基礎。巴勒維未將石油收入挹注民生建設，改善人民生計，反而將其無限制擴張軍備，此時大多數伊朗人民仍生活在貧窮線下，對政府建軍普遍無感，但他持續鎮壓國內異議人士，宗教成為人民不滿情緒的宣洩出口，1977 年底，伊朗發生數十座城市居民反巴勒維暴動，致使石油生產受到影響，經濟衰退，人民失業率惡化，到 1978 年 1 月宗教革命發生前，巴勒維仍對美另訂購 120 億美元武器，最終爆發革命，1979 年 1 月 16 日，巴勒維出逃，同年 2 月 1 日何梅尼被人民迎回返伊朗擔任政教合一的精神領袖（林佑柔，2019：355-357）。

1979 年 5 月，何梅尼重建伊朗革命衛隊（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 IRGC），負責保護什葉派伊斯蘭教中的「烏里瑪（Olema）」統治權力、制衡巴勒維時期美國訓練的伊朗軍隊及其他世俗政黨；¹⁵ 在民間成立「革命委員會」(komitehs) 打擊任何反對何梅尼政權者，他反對美國，認為美國是最邪惡的「大撒旦」，以色列是「小撒旦」（陳立樵，2018: 235），美英策動於 1953 年推翻首任民選摩薩台總理及巴勒維統治時罔顧民生的共同記憶，成為何梅尼煽動伊朗人民反美的依據。1989 年 6 月 3 日，何梅尼去世後，哈米尼（Seyyed Ali Hoseyni Khamenei）繼任迄

15. 烏里瑪不是教會成員，亦非由上級機關任命，他們是一群自我延續且有鬆散聯繫的團體，要成為烏里瑪的一員必須要有被人認同的知識、聲譽及為人接受的道德觀、引起學生的興趣並能行使影響力；其實際運作過程，連烏里瑪成員都不是很理解(林佑柔，2019：155)。

今仍承襲何梅尼的精神，以「反美」與「反以」作為政權支柱（林佑柔，2019：320）。



壹、1979 年後的對外擴張

為維持 1979 年宗教革命的光榮、擺脫國際孤立，伊朗透過提供「瀕危國家」及「國家機器無法治理的地方」軍援及財政援助，在中東許多地區建立代言勢力（Loft, 2022），包括：

一、黎巴嫩真主黨

1982 年 6 月，真主黨於第五次中東戰爭中成立，一開始為秘密組織，直至 1984 年才公開，以「消滅以色列」為宗旨，伊朗趁黎國長期內戰，國內陷於各方勢力分據，政府無利控制整個疆域時，提供真主黨資金、協助訓練部隊，使其成為既是民兵，又是政治組織。依據 2022 年 8 月英國下議院資料，伊朗提供真主黨的援助包括：(一) 財政援助：確實援助金額不可考，但據 2017 年的一份資料，真主黨每年取得約 10 億美元資金，這資金來源除了伊朗外，還透過販毒、海內外黎巴嫩人上繳政治獻金或稅收；(二) 軍事援助：自 2006 年起伊朗每年提供真主黨數千枚火箭、飛彈及各類輕武器（Loft, 2022）。

依據同一份資料指出，真主黨對中東區域所造成的威脅除「消滅以色列」外，還包括：(一) 造成黎巴嫩政經危機：真主黨有自己的軍隊與財源，在議會佔有席次，但黎國政府無力應對，真主黨利用自伊朗取得的資源攏絡在黎國信仰者壯大勢力，使黎巴嫩經濟情況雪上加霜；(二) 成為敘利亞阿薩德政府軍候備部隊，並訓練葉門「胡塞組織」和伊拉克親什葉派民兵；(三) 協助伊朗逃避國際制裁，並負責運送伊朗原油予敘利亞。



二、敘利亞阿薩德政權

2000 年代初，伊朗透過財政及軍事援助成功結合敘利亞阿薩德政府勢力成為其第二個代理國。對伊朗而言，敘利亞問題既是挑戰也是機會，當 2011 年 1 月「阿拉伯之春」席捲進入敘利亞時，伊朗為免成為下一個骨牌，而全力協助鞏固阿薩德政權。

2011 年 1 月 26 日，大馬士革發生反政府示威遊行，在人民要求進行政治改革與恢復公民權利時，伊朗動員黎巴嫩真主黨部隊和來自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的什葉派民兵支援，成功將「阿拉伯之春」阻擋於伊朗門外，在敘利亞止步。當 2014 年敘利亞內戰深陷泥沼，呈現膠著狀態時，伊朗動用革命衛隊守護阿薩德，到 2015 年阿薩德政權岌岌可危時，伊朗說服俄羅斯派空軍進駐敘利亞，保護阿薩德政權。

根據 2022 年英國下議院引述聯合國官員在 2015 年的資料，伊朗每年提供敘利亞 60 億美元援助、2013 至 2018 年提供價值 100 億美元的原油、與真主黨共同訓練敘利亞正規軍並提供武器 (Loft, 2022)。

雖然敘利亞部隊在 2016 年 12 月「阿勒坡戰役 (Aleppo)」打敗反阿薩德的遜尼派軍隊，但阿薩德政府已無力控制原有疆界，包括庫德族、土耳其、伊拉克及伊斯蘭恐怖組織 (ISIS) 在敘利亞均盤據一定勢力範圍，使敘利亞對伊朗的依賴日深。

在伊朗宗教革命 44 年後的今天，伊朗意圖利用其成功結合敘利亞的經驗複製到其他地方。現在，伊朗正尋求與敘利亞協議，將其在中東的代言國家連結成線 (伊朗 → 伊拉克 → 敘利亞 → 黎巴嫩) 於敘利亞西岸地中海建立一個出海港口 (Rabinovich, 2019)。



三、伊拉克

伊朗勢力進入伊拉克源於 2003 年美軍入侵伊拉克消滅海珊 (Saddam Hussein) 政權，使伊朗有機會結合伊拉克境內什葉派勢力製造代言者，並分別於 2006 年扶植馬利基、2011 年扶植阿巴迪 (Haider al-Abadi) 為總理，使伊拉克成為伊朗羽翼，軍事攻擊伊斯蘭恐怖組織，對抗美國聯軍。它在 2014 年協助伊拉克成立「人民動員組織」(Popular Mobilization Forces, PMF) 政團並於 2015 年進入伊拉克國會；協助巴達爾民兵組織 (Badr Organization)，時而出沒攻擊在伊拉克美軍；協助建立伊拉克真主黨部隊 (Kataib Hezbollah)，對抗駐伊美軍。



圖 2-3 伊朗勢力西進圖

(by McMaster H.R., David Adesnik and Behnam Ben Taleblu, 2019: 9)

四、葉門

伊朗利用 2011 年「阿拉伯之春」席捲葉門導致原總統沙雷 (Ali Abdullah Saleh al-Ahmar) 下台，新選出總統哈迪 (Abdrabuh Mansur Hadi) 於 2012 年上任，國家機器無法控制疆域之際，於 2014 年策動「胡塞組織」叛亂，佔領包括首都沙那



(Sana'a) 在內的北葉門，意圖將葉門納入伊朗勢力範圍，讓伊朗海軍深入紅海進入亞丁灣。

根據 2022 年 8 月英國下議院引述美國和沙烏地阿拉伯的資料，伊朗提供「胡塞組織」數百萬美元財政援助、另派黎巴嫩真主黨協助訓練「胡塞組織」民兵、支援駭客操作協助破壞沙烏地阿拉伯的基礎設施（包括油田）及提供反坦克飛彈、地雷、短程飛彈等武器（Al-Sulami, 2022）。

同份報告指自 2021 年 1 月至 8 月，「胡塞組織」對沙國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以飛彈和無人機發動超過 240 次攻擊。這些攻擊英國相信背後就是來自伊朗。

貳、伊朗和以色列的關係

伊朗在巴勒維時期因親美的關係與以色列交好，對以色列而言，伊朗是其面對阿拉伯敵國環伺的突破口，兩國曾在經貿、學術、軍事情報等方面有深度交流。但 1979 年的宗教革命轉變了兩國關係，原先宗教革命的出發點不在於反美，而是因為何梅尼多次發表反對美國在伊朗取得的特權，或是批判巴勒維政府重視美國人而不是伊朗本地人的言論，在革命成功後成為他追隨者強調的政治路線，這導致同年 11 月發生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人質遭劫持事件，1980 年 4 月伊美斷交。此事件雖非何梅尼指使，但發動者卻聲稱是追隨何梅尼路線，讓何梅尼順水推舟把它成為反美的重要成果，以色列就在這氛圍下，成為伊朗第二個反對的對象。

伊朗前國會議長拉夫桑亞尼（Ayatollah Hashemi Rafsanjani）曾說：「要徹底去除以色列的方式，就是要在巴勒斯坦建立另一個政府，而這需要凝聚整個伊斯蘭世



界的力量。」之後許多官員都表示反對任何與以色列妥協的協議。也就是說，1979 年後的伊朗神權政府是建立在「反美」與「反以」的意識型態上，並沒有什麼真正的仇恨（陳立樵，2018: 235）。

伊朗也將這套思維用於其他反以國家，進而結盟，敘利亞便是一例。以色列前駐美大使拉賓維琪（Itamar Rabinovich）引述「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伊朗裔經濟學者沙加普爾（Karim Sadjapour）的話說：「伊朗支持扶植敘利亞的原因不在其地緣政治或是財經利益，而在於由阿薩德家族所主導的利比亞發自內心且無可救藥的仇恨以色列（...visceral and seemingly inextinguishable hatred of the state of Israel）。伊朗資深官員維拉雅堤（Ali Akbar Velayati）說『由伊朗、敘利亞、真主黨、伊拉克與哈瑪斯連結成的反以色列陣營，敘利亞佔有這區塊鏈中的樞紐地位』，雖然以色列和伊朗領土沒有接壤，以色列沒有對伊朗人民生活有直接影響，但是『反以』是 1979 伊朗宗教革命意識型態的基石。所以迄今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米尼不論在哪演講，即使是農業或教育場合演說，他都會帶上『猶太主義是邪惡』（the evils of Zionism）的字眼」（Rabinovich, 2019）。

參、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的關係

1979 年 2 月 1 日，何梅尼被人民迎回擔任伊朗政教合一的精神領袖，強烈批評沙國皇室的寡頭統治，挑戰沙烏地在回教教主及其對麥加、麥地那兩聖地的宗主地位，致 1980 年 8 月當同屬遜尼派的伊拉克海珊總統訪問沙國時，獲得哈立德國王的支持對抗伊朗，沙烏地提供伊拉克數十億美元財政援助，協助伊拉克出兵對抗伊朗。據統計，「兩伊戰爭」估計造成 75 萬伊朗軍民和 50 萬名伊拉克軍民死亡（Kruzman, 2017）。期間，1987 年 7 月 31 日，伊朗什葉派朝聖者在麥加與沙國安全部隊發生衝突，造成 200 多名伊朗什葉派朝聖者遭踩踏死亡，沙國也因為其外



交官死亡及伊朗人民攻擊沙烏地駐伊朗大使館下於 1988 年宣布與伊朗斷交（Ramos, 2023）。但在隨後波灣戰爭，沙伊共同譴責伊拉克入侵者的立場，經濟制裁伊拉克，而於 1991 年復交。

2003 年 3 月美國入侵伊拉克，推翻海珊政權，讓伊朗勢力滲入扶植境內原即占多數的什葉派勢力，再加上其發展核計畫，當時總統拉馬丹加（Mahmoud Ahmadinejad）欲控制波斯灣，使得自詡為遜尼派宗主的沙烏地阿拉伯感到威脅。

2011 年「阿拉伯之春」席捲進入中東，沙烏地控訴伊朗策動巴林發動反沙國皇室動亂；另利用敘利亞內戰支持阿薩德對抗由沙國支持的遜尼派軍隊；2015 年，伊朗支持「胡塞叛軍」對抗沙烏地支持的葉門政府軍；同年 9 月 24 日麥加朝聖再度造成信徒踩踏事件導致約 2 千人死亡，包括 400 名伊朗什葉派回教徒，4 個月後的 2016 年 1 月 2 日，沙烏地處決境內什葉派信徒最重要的領導者尼姆及另外 46 名死囚，由於尼姆是什葉派在沙國的領導人物，因此他遭到處決，無疑會引起作為什葉派宗主國的伊朗的憤怒。隔（3）日，伊朗暴民入侵沙烏地駐伊朗大使館，沙國第二次宣布與伊朗斷交（Spectum News, 2016/01/04）。2017 年 11 月，沙烏地阿拉伯攔截到由伊朗支持的「胡塞組織」自葉門發射欲攻擊利雅德機場的飛彈；2018 年 5 月，川普撤出伊朗「核協議」激勵了沙國，薩爾曼王子並警告如果伊朗發展核武，沙國將跟進發展（Al Jazeera, 2023/03/10）。2020 年 1 月 3 日，伊朗革命衛隊聖城旅指揮官蘇雷曼尼遭美國無人機阻殺，沙國政府公開表示慶祝。因此 2023 年 3 月 10 日，在中國的斡旋下，沙國與伊朗宣布將於 2 個月內復交（Wintour, 2023），可說是一項難以預料到的發展。

肆、伊朗的核武發展及解決



伊朗的核武奠基於 1970 年代巴勒維執政下美國的協助，1975 年，季辛吉和伊朗財經部長安塞瑞（Hushang Ansary）簽約，出售八座核反應爐予伊朗並同意提供燃料協助 2 座輕水反應爐運作。巴勒維於隔（1976）年即編列 13 億美元予伊朗原子能組織聘用近 1,500 名核子專家進行製造，並在 70 年代末期與以色列討論如何將地對地飛彈改造成核武的計畫，但因 1979 年宗教革命中止（Burr, 2009）。直到 80 年代後期，伊朗總統拉夫桑亞尼重啟核計畫，90 年代分別與俄羅斯和中國簽訂兩項核能合作協議，1995 年，伊朗與俄羅斯簽署核能計畫生產濃縮鈾，並聲稱是用於核能發電，但西方國家憂心其用於生產核武，於是英法德三國出面與伊朗溝通，避免核子活動在伊朗擴散，談判自 2003 年起持續至 2015 年，期間中國、美國、俄羅斯於 2006 年加入談判，組成「伊朗核問題六國機制」，2006 至 2010 年，聯合國安理會對伊朗可能的核發展通過六項制裁決議，包括凍結與鈾濃縮計畫相關的資產，禁止提供伊朗相關核科技（Iran Watch, 2016/08/09）。

經由美國、聯合國與歐盟共同推動的制裁重創伊朗經濟，最後魯哈尼（Hassan Rouhani）總統讓步，「伊朗核問題六國機制」和伊朗在 2015 年 7 月 14 日於維也納簽訂「核協議」，西方國家於同年 10 月解除對伊朗經濟制裁，讓伊朗經濟短暫復甦後，川普上任於 2018 年 5 月片面退出，改施以高壓式經濟制裁，使伊朗經濟再次受到打擊（歐佳盈，2019：55）。

2022 年 8 月，「伊朗核問題六國機制」與伊朗外長阿布杜拉希揚（Houssein Amir-Abdollahian）在維也納針對重簽伊朗「核協議」進行談判，儘管以色列和沙烏地阿拉伯仍持反對態度，但情勢已與 2015 年伊朗「核協議」簽定時不同，因為伊朗自 2018 年美國片面退出「核協議」後即全面生產高濃度濃縮鈾，且這次談判已在 9 月停止。根據美國國會研究中心（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2022 年 7 月 25 日有關「伊朗核武生產報告（Iran and Nuclear Weapons Production）」引述國



際原子能總署 (IAEA) 同年 5 月份報告估計，伊朗已生產各式濃縮鈾 38.09 公斤，包括 33 公斤 90%純度的濃縮鈾，距離生產核子武器所需 40 公斤 90%濃縮鈾僅咫尺之遙，這讓伊朗生產第一枚核子彈的時間僅需六個月，低於 2015 年伊朗「核協議」版本所估算的一年製造期，必須施以新版的伊朗「核協議」才能規範限制伊朗的核武發展，由於伊朗需要西方解除制裁以活絡經濟，仍願意就限制核武製造與「伊朗核問題六國機制」國家談判 (Zanotti, 2022)。

要如何防止伊朗發展核武？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曾任甘迺迪總統時期中東及北非政策制定成員威廉·波爾克 (William R. Polk) 提出三項可使伊朗停止發展核武的方式：

- (一) 美國必須放棄攻擊伊朗的主動權：這在歐巴馬總統時期表示過，並於 2017 年 7 月簽署伊朗核協議後即已達成，但到川普退出核協議而回到原點。
- (二) 讓國際承認伊朗的主權獨立，並保證不會允許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和以色列的攻擊。
- (三) 建立一個無核的中東地區 (林佑柔，2019: 455-456)。

由上述條件衡酌現況，要讓伊朗不發展核子武器是不可能的，至少在「中東無核化」一項下，要求以色列放棄核武實屬困難。

第五節 小結

綜理本章，二戰後美國的中東政策是以「防堵蘇聯勢力滲入中東」為核心利益，初期因為尚無區域影響力，在英法舊殖民勢力仍盤據中東時，只能以「鐘擺」形式，時而以應然面呼應聯合國決議附議其中東秩序，時而受美國境內中東代理勢力拉鋸，決定其立場。1973 年末，第四次中東戰爭結束，美國中東政策由以季辛吉「權



力平衡」模式為主流，尋求建立中東主要國家都同意的秩序，容許小規模衝突，季辛吉並在以埃進行「穿梭外交」，在卡特總統任內完成「以埃和平協定」，促使兩國建交。

2001 年「九一一事件」讓美國中東政策思維從「世界警察」角色轉成維護「國土安全」，2003 年小布希總統以「海珊涉嫌持有大規模殺傷性化學武器」為名出兵伊拉克，推翻了海珊政權，卻也破壞了季辛吉所建立的「中東權力平衡體系」，讓伊朗勢力趁勢而起，結合原本就以什葉派人口為多數的伊拉克成為其羽翼向西延伸至地中海，成為中東威脅來源 (Indyk, 2021: 157)。

到歐川時期，延續著「國土安全」重於「世界警察」的思維，美國中東政策以「縮減對外駐軍」、「堅拒出兵中東」為主軸，使以沙兩國基於各自安全利益而關係日益接近，美國對以色列和對沙烏地阿拉伯有不同程度的安全承諾，不論這安全承諾上升（川普退出伊朗「核協議」）或下降（歐巴馬簽署「核協議」）均未影響到以沙兩國發展實質關係。

尤其當歐巴馬面對「阿拉伯之春」的進退失當，造成了恐怖組織透過原政府垮台而滲入國家機器無法控制的地方（敘利亞、伊拉克...），或直接透過選舉成為政府統治者（埃及、突尼西亞）使中東政局更為混沌，以沙關係反而因為「反恐」而更為緊密。

在以巴問題上，歐川採取完全不同的政策，歐巴馬逼迫以巴兩國走上「談判桌」，強行推動「兩國方案」讓當時的沙國皇室認為歐巴馬可以協助解決巴勒斯坦問題而與以色列發展關係，雖然事與願違，沙國皇室反而對巴勒斯坦政府拒絕接受任何與以色列的和平方案而漸感厭倦，續與以色列發展關係；2020 年 8 月 13 日「亞伯拉



罕協定」聲明讓以色列與眾多阿拉伯國家建交，沙國政府雖未跟進，卻也做出諸如開放領空、派遣前任高官訪問以色列，讓外界對以沙關係進一步發展產生想像空間。

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的關係時敵時友，兩國敵意原僅止於遜尼與什葉派教義的宗教衝突，1979 年何梅尼主政後，伊朗公開挑戰沙國在回教及對麥加、麥地那兩大聖地的宗主地位，80 年代「兩伊戰爭」，沙烏地站在伊拉克的一方對抗伊朗，並在 1987 年「麥加朝聖事件」後第一次斷交，復於 1991 年波灣戰爭共同譴責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而復交；但在海珊政府被推翻後，伊朗扶植伊拉克什葉派勢力、發展核武，在 2011 年「阿拉伯之春」後擴大什葉派勢力範圍深化了沙國的威脅感，使沙國尋求與包括以色列在內的國家結盟，以取代美國撤出中東所可能造成外部勢力對沙國皇室統治正當性的挑戰。

2016 年 1 月，沙國處決境內什葉派教主尼姆等死囚，引起伊朗不滿，在伊朗暴民入侵沙駐伊大使館後，兩國二度斷交，2023 年 3 月，在中國的斡旋下，兩國二度復交，在兩度斷交的歷史殷鑑下，不論中國意圖為何，始終不能消除伊朗是威脅來源的事實。

1979 年宗教革命後的伊朗，其「反美」與「反以」的意識型態治理核心成為美以兩國共同的敵人，讓兩國關係日近。伊朗對以色列的敵意源自於 80 年代後期，伊朗總統拉夫桑亞尼重啟核計畫及無可救藥的反以意識型態，並利用其代理人（敘利亞、真主黨、哈瑪斯...）不時地攻擊以色列而加深。川普輕率退出伊朗「核協議」，使得伊朗恢復生產核武所需的濃縮鈾，現有儲量讓伊朗生產第一枚核彈的時間已低於原歐巴馬所簽「核協議」規範接受「國際原子能總署」定期檢查的時間而危機加深，美國的堅拒出兵，僅以嚴厲卻未見效的經濟制裁讓同感威脅的以沙兩國因此有發展準同盟/同盟，甚至建交的趨勢。



第三章 以色列的政策反應

第一節 以色列與美國的關係及對歐川時期美國外交政策的反應

壹、以色列與美國雙邊關係的基本背景

以色列早期的對美關係是依附在戰後美國的中東政策下，配合美國國家利益，時而結合美國國內猶太族群力量，讓美國做出有利以色列政策。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獨立，美國是第1個外交承認以色列的國家。5月15日，阿拉伯國家聯盟攻打以色列，爆發第一次中東戰爭，此時美國影響力尚未進入中東，因而支持聯合國決議，要求以阿雙方儘速結束戰爭，但由於猶太人在美國強大的遊說力量，以色列未接受美國在聯合國所提出以臨時託管計畫取代以巴分治案，卻也動用力量讓美國否決安理會對以色列的制裁案（Atherton Jr., 1984: 1194-1195）。

1956年10月，第二次中東戰爭爆發，埃及納塞政府宣布將蘇伊士運河國有化，以色列受英法鼓動進占西奈半島，雙遭美國反對，艾森豪總統要求以國撤出西奈半島並收斂在巴勒斯坦的屯墾行為，未特別偏袒以色列（Atherton Jr., 1984: 1195）。

1961年甘迺迪就任總統，積極與埃及建立關係，遭以色列懷疑及國內猶太勢力的反對，1963年詹森繼任，美國態度開始向以色列傾斜並提出維護以色列的主張，1967年6月19日第三次中東戰爭結束後9天，詹森發表「中東和平五原則」



(five principles for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¹⁶ 提出包含保障以色列生存權力在內的「確保中東各民族的生存權利」原則 (Center for Israel Education, 1967)。

1969 年尼克森當選總統，國務卿羅傑斯以安理會 242 號決議為架構提出「羅傑斯方案」調解以阿衝突未成，在埃及友蘇情勢未變下，美國在第四次中東戰爭中全力救援以色列，使以色列再次成功取得戰事勝利。1974 年 6 月，尼克森成為首位訪問以色列的美國總統，發動以埃和平進程。季辛吉在繼任的福特總統授意下調解以巴問題，至 1979 年卡特總統任內完成「大衛營協定」(Elgindy, 2016)。但同年伊朗宗教革命、蘇聯進軍阿富汗，隔 (1980) 年 8 月爆發兩伊戰爭，改變了中東權力平衡態勢，使得美國原本以「防堵蘇聯勢力滲入中東」架構新增了伊朗的缺口，強化與以色列及沙烏地阿拉伯的關係，使得以色列成為維護美國在中東利益的兩大支柱，而宗教革命後的伊朗勢力向西推進，擴張什葉派勢力範圍並發展核武，使得「反伊」成為美以沙發展三邊戰略關係的理由之一。

1985 年，以色列和美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美國成為以色列最大貿易國，並自 1985 年起至 2004 年，每年提供 30 億美元援助以色列，總計援助 4,600 億美元，使得以色列成為二戰後接受美援最多的國家 (Sharp, 2023)，以色列藉由美援發展經濟，從一個發展中國家進展成為西方國家經濟體系成員。

90 年代初冷戰結束，中東成為美國外交政策重心，2001 年「九一一事件」，蓋達恐怖份子攻擊美國本土，使得「恐怖組織」與「伊朗議題」成為美以共同的挑戰 (Zanotti, 2022)。

16. 詹森「中東和平五原則」：(1)確保中東各民族的生存權利；(2)難民應獲得合適的待遇；(3)中東各國有自由航行不受妨礙的權利；(4)中東各國和國際大國有責任採取措施，避免新一輪軍備競賽；(5)維護中東各國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



但回顧以色列對美外交，以色列並非事事順從美國。首先在核武發展上，以色列自 60 年代開始發展核武，甘迺迪總統曾警告過以色列，發展核武恐將導致中東地區的不穩定及核武競賽，遭以國總理本古里昂（David Ben-Gurion）辯稱以色列核技術發展僅限於學術研究及和平用途，1962 年美以簽訂協議，以國同意美方每年派員定期赴以納蓋夫沙漠（Negev）檢查核發展情況，之後尼克森總統與梅爾總理（Golda Meir）達成協議，不在公開場合談論以國擁有核武一事。根據 2022 年 7 月 1 日「美國國會研究中心」報告，以色列現約擁有 90 枚核彈頭（Zanotti, 2022）。

在屯墾議題上，以色列亦未順從美國。以色列自 1967 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取得西奈半島、戈蘭高地、東耶路撒冷、約旦河西岸和迦薩地區並不被各國承認，除 1979 年以埃簽訂和平協議撤出西奈半島，2005 年夏隆總理主動撤出迦薩走廊而停止在兩地的屯墾行為外，仍不顧國際各方（美國、歐洲、海灣國家合作理事會...）要求持續在約旦河西岸、東耶路撒冷地區與戈蘭高地進行屯墾，使得「屯墾議題」成為國際推動以巴和談與「兩國方案」的主要障礙（Yaalon, 2016）

貳、以色列對歐川時期中東外交政策的反應

2009 年歐巴馬上任後，分別自伊拉克、敘利亞撤軍，2011 年「阿拉伯之春」放棄埃及，未將中東區域體系導入有利美國的權力平衡體系，使恐怖組織進駐填補真空，這讓未被推翻的阿拉伯國家心生疑懼；川普時期延續歐巴馬將軍力撤出中東，未再大幅增加中東駐軍，但在以巴問題上對以色列「一面倒」、退出伊朗「核協議」、持續加強防堵恐怖組織、強化與沙烏地阿拉伯關係，以維護石油利益。2020 年 8 月推動「亞伯拉罕協定」聲明，對此，以色列與各國合作「反恐」、堅持屯墾行為、公開反對伊朗「核協議」，並受惠「亞伯拉罕協定」與阿拉伯國家建立外交關係。



一、與阿拉伯及其他國家合作加強「反恐」：「反恐」一直是以色列強項，以色列平日即應付來自北部（真主黨、敘利亞民兵）與西南部（哈瑪斯組織）的恐怖攻擊，實戰經驗豐富，基於「反恐」的共同利益，以色列除與阿拉伯國家合作外，亦與俄羅斯合作，並提供阿拉伯國家武器、協助訓練部隊與恐怖組織情資交換，這措施在美國默許下延續迄今（Zanotti, 2022）：

1. 與約旦的反恐情資合作：約旦代管聖殿山（或稱奧瑪清真寺）及阿卡薩清真寺（Al Aqsa Mosque），吸納來自敘利亞和伊拉克的難民，以約為此定期進行反恐情資合作，以減低隨時發生的動盪（Danin, 2016）。
2. 與埃及的反恐合作：在效忠美國長達 30 年的穆巴拉克政府垮台後，2011 年 2 月，埃及選出源自恐怖組織「穆斯林兄弟會」的摩西為總統，旋即遭到國防部長塞西政變推翻，而「穆斯林兄弟會」影響力深植於埃及，其與控制迦薩走廊的哈瑪斯組織、伊朗關係盤根錯節，這些都被塞西認定係危及其政權的「恐怖組織」，因而與以色列進行秘而不宣的反恐合作（Mandour, 2018）。
3. 與俄羅斯的反恐合作：敘利亞受「阿拉伯之春」影響身陷內戰，迄今超過 10 年未解，境內除阿薩德政府軍外，分別有庫德族、伊朗、土耳其及伊斯蘭聖戰組織滲入形成各自勢力範圍，俄羅斯受阿薩德與伊朗之託，在敘國駐軍，它「友伊反恐」的態度與以色列「反伊反恐」態度產生交集，在俄羅斯默許下，以色列部隊經常發動攻擊位於敘利亞境內的恐怖組織基地（DW, 2016/07/06）。

二、在以巴問題上堅持屯墾行為，無意推動「兩國方案」：2010 年末，歐巴馬政府首次嘗試安排以巴雙方討論以色列屯墾區興建問題。2013 至 2014 年，國務卿凱瑞努力協調以巴雙方建立新架構，以鷹派勢力佔多數的以色列國會面對被法塔與哈瑪斯派分割的巴勒斯坦，使以色列有恃無恐地拒絕在屯墾議題上讓步。

到了川普時期，以色列充分利用了其「一面倒」政策，儘其所能將以巴問題的天平拉向不可逆支持以色列的一端，將川普宣布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



都、美國駐以大使館遷往耶路撒冷、承認戈蘭高地是以色列的一部分視為勝利，更利用對川普親以決策官員遊說，擴大在約旦河西岸的屯墾行為，意圖將屯墾行為成為既成事實，使以巴問題和談前提中，巴勒斯坦要求以國停止屯墾行為與以色列要求巴勒斯坦承認以色列國、巴勒斯坦不再以恐怖手段攻擊以色列成為不對稱的天平，屯墾問題成為未來以巴和平推動的障礙強度增加(見圖 3-1)。

¹⁷ 2021 年，拜登就任總統重申推動「兩國方案」，但他無意改變川普時期對耶路撒冷定位並將美國駐以大使館續留耶城，使得以巴和平推動和過去相比發生了情勢變遷，兩方關係產生了根本上的改變。

1. 承認以色列國。
2. 不能以恐怖方式攻擊以色列。



圖3-1 以巴和談天平（作者自行繪製）

-
17. 在美國的斡旋下，以巴官員首次於1978年9月會談，當時的巴勒斯坦代表是依附在埃及和約旦談判代表團中，就以埃和平協議中有關解決巴勒斯坦居民在約旦河西岸、迦薩走廊自治問題與以色列代表進行會談，會談結果雖然失敗(Sayegh, 1979)，但國際情勢讓以巴和談天平站在巴勒斯坦一方；1991年10月，兩國代表在美、蘇斡旋下進行「馬德里會談」，巴勒斯坦代表首次以獨立身份參加，1993年雙方簽署「奧斯陸協定」，以巴正式承認對方，後續在美國調停下，以巴代表續簽訂「懷伊河協定」、「大衛營五原則」，以色列首度讓步支持「兩國方案」，讓以巴和談天平達成平衡，但同年9月爆發的為期五年的「第二次起義」，使以巴天平再次傾斜至支持巴勒斯坦一方，中間雖有沙烏地阿拉伯提出「阿拉伯和平方案」，美、俄、歐盟、聯合國提出「中東和平路線計畫圖」，但均未被雙方接受，亦未面對面談判，最近一次以巴就「兩國方案」面對面談判是在2013年7月歐巴馬時期國務卿凱瑞為推動「新版兩國方案框架」所提新一輪談判，至2014年1月因以色列通過新的屯墾計畫破裂(Jervis, 2017)，此時的國際情勢因為中東歷經「阿拉伯之春」、恐怖組織興起、伊朗威脅，阿拉伯國家不再如以前支持巴勒斯坦，再歷經川普對以色列「一面倒」政策使以巴和談天平倒向以方且短期之內看不出變動趨勢。之後所謂的「以巴會談」均非以「兩國方案」或「屯墾問題」為主題，而是為解決以巴雙方暴力衝突之會談。



三、譴責歐巴馬與伊朗簽署「核協議」，對川普退出表示歡迎：2015年7月14日，歐巴馬率聯合國5常任理事國及歐盟與伊朗簽署「核協議」，限制伊朗濃縮鈾生產並不定期接受「國際原子能總署」檢查，如果伊朗確實遵守協議各項內容，美國將率西方國家解除對伊經濟制裁。以色列政府反應激烈，納唐雅胡總理在同（14）日下午發表電視講話說，伊朗「核協議」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歷史性錯誤」，世界會因為這一協議變得更加危險。他說，伊朗在未來10年內會因為這一協議得到數千億美元的資金提供支持敘利亞、黎巴嫩、葉門等什葉派國家及真主黨、維持其消滅以色列的政策，以色列將一如既往地保衛自己的安全（Booth & Egash, 2015）。

川普於2018年5月宣布退出伊朗「核協議」，以色列除表歡迎外，另尋求影響美國的伊朗政策朝有利以國方向制定，包括遏止對伊朗核發展、減低伊朗在敘利亞、黎巴嫩、伊拉克、迦薩走廊的影響力，和美國一起重新制定對伊朗的核心經濟制裁（Zanotti, 2022）。

四、對「亞伯拉罕協定」聲明的反應：以色列在川普的推動下，於2020年8月分別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安曼、蘇丹、巴林等阿拉伯國家建交。

對以國國內而言，以色列左派所主張與包括巴勒斯坦在內的阿拉伯國家和平共存的勢力在納唐雅胡的政治操作下，一直處於分裂狀態，無法制衡右派「建立純猶太政府」主張（Ghanem, 2016），使得以色列視「亞伯拉罕協定」為對阿拉伯國家外交的重大勝利（Sisci & Prezzi, 2020）。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的政治承認，等同於突破2002年「阿拉伯和平方案」所設定的框架，以色列毋須撤出第三次中東戰爭所取得的土地即可獲得和阿拉伯國家建交的外交成

果，進一步和阿拉伯國家進行經貿、科技、政治交流，巴勒斯坦不再是以阿關係發展障礙。



依據美國國會研究中心 2022 年 7 月 1 日更新資料，拜登政府將延續該協定精神，促成更多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建交，並和以巴問題脫勾 (Zanotti, 2022)。

第二節 以色列與沙烏地阿拉伯的關係

壹、以色列與沙烏地阿拉伯雙邊關係基本背景

對以色列而言，與沙烏地阿拉伯交好符合以國安全利益，以色列和沙烏地阿拉伯的關係是建立在其與「海灣國家合作理事會」會員國的關係架構下。以色列在 1948 年建國後一直在危機中生存，最終希望能和阿拉伯和回教國家和平共處。一直到 80 年代末期，在美、蘇兩國推動下，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於 1991 年 10 月在馬德里舉行中東和平會議，六個「海灣國家合作理事會」成員國與埃及一起向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 Arafat、敘利亞總統老阿薩德 (Hafez al-Assad) 施壓，強迫其接受「馬德里會議」決議，與以色列建立溝通談判管道，1993 年 9 月 13 日以巴簽訂「奧斯陸協議」，「海灣國家合作理事會」終止對以色列的杯葛，並在水資源、再生能源、經濟合作、難民、武器管制等五項議題合作。迄今仍延續的合作包括：

一、水資源合作：1996 年以阿在安曼設立「中東海水淡化研究中心」(Middle East Desalination Research Center, MEDRC)，成為包括以沙在內的以阿海水淡化技術合作及多軌外交平台。

二、再生能源合作：2009 年「國際再生能源組織」(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IRENA) 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首都阿布達比設立，它提供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再生能源研發與合作交流平台，以色列為示對「國際再生能源組織」的支持，每次都會派遣部長級官員參加年會，2016 年以色列和沙烏地阿拉伯官員即藉由「國際再生能源組織」平台擔任研討會與談人。

三、經貿合作：在「海灣國家合作理事會」架構下，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的經貿合作早已存在且多透過第三國進行，和沙烏地阿拉伯的貿易項目主要是農業、科技產品，以色列透過塞浦勒斯、約旦、巴勒斯坦等國將產品輸出沙國 (Ulrichsen, 2016)。

2002 年，沙烏地阿拉伯提出「阿拉伯和平方案」政治承認以色列，但要求以色列需要退出 1967 年「六日戰爭」佔領區，被以色列夏隆總理拒絕，因為當時的以色列認為，巴勒斯坦不是與阿拉伯國家發展的障礙，且這觀點一直延續至今，並在川普「一面倒」政策下，以色列已和部分阿拉伯國家建交。

對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在內的「海灣國家合作理事會」國家而言，與以色列進行資安、軍售、部隊訓練、高層官員會面共同對抗伊朗、避免伊朗在中東稱霸，比巴勒斯坦問題更重要 (Dekel & Guzansky, 2013)。

然而，這並不代表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關係發展就此平順無礙，海法大學教授薛福坦 (Dan Schueftan) 認為，以色列存在著以下四個結構性的劣勢，任何事件只要勾起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在內的阿拉伯國家爆發出以下民族主義情緒，以阿(沙)關係就可能會逆轉：一、以色列是在阿拉伯回教領地上唯一一個非阿拉伯民族且非回教國家；二、以色列像是西方國家在阿拉伯土地的斥候，非法在不屬於它的阿拉伯國家土地統治；三、以色列曾與每個阿拉伯激進強權衝突，每次衝突都希望將它菁英分子回復過往猶太光榮的歷史昭告世人，希望能為世人認可；四、以色列的成

功建國是踩在阿拉伯國家的痛楚上 (Schueftan, 2017)。



但是對於薛福坦的上述說法，本文的判斷是：當這些結構性因素重要性上升時，以沙關係進展受到阻礙，究竟是長期現象，抑或只是短期因素，根據過去多年經驗來看，似乎是後者。由於中東回教國家彼此之間各種利益錯綜糾結，除了合作之外也往往發生衝突，因此，以色列在特定條件下也會對某些中東回教國家產生工具作用，介入這些國家之間彼此的衝突和對抗，這使得薛福坦所說的結構性劣勢即使重要性上升時，也仍有可能被這種工具作用所掩蓋。

貳、歐川時期，以色列對沙國相關政策行為

2011 年「阿拉伯之春」提供了以色列和「海灣國家合作理事會」在軍事與安全方面「交往」與「和解」的機會 (Ulrichsen, 2016: 82)，恐怖組織透過選舉或外國勢力協助取代了原遭推翻的政府，並對外輸出恐怖主義，沙國看到歐巴馬未施援手放棄埃及並與伊朗簽訂「核協議」而對美產生疑慮，惟恐伊朗因此提供敘利亞、葉門、黎巴嫩真主黨等恐怖組織資金，擴大地區影響力，加上伊朗自 1979 年「宗教革命」成功後，明訂要將伊朗「政教合一」政體輸出恐危及中東區域安全，因此尋求與包括以色列在內的國家合作對抗。

據傅辛格 (Jonathan Ferziger) 與瓦德曼 (Peter Waldman) 在 2017 年 2 月彭博商業週刊發表文章指出，在「阿拉伯之春」之前，以沙合作未曾公開，但在「阿拉伯之春」後，兩國不僅公開合作，且擴及資安、雙方官員公開見面。2012 年，沙烏地石油公司遭到一支據信由伊朗製造的沙姆 (Shamoon) 病毒攻擊，癱瘓了該公司的電腦系統，最後是由以色列的科技廠商兼律師身份馬爾格利特 (Erel Margalit) 以近一個月時間修復；2015 年，沙烏地尋求以色列科技公司 (IntuView) 協助追蹤



恐怖份子在社群媒體對沙國的攻擊，據彭博社報導，該公司提供協助從推特、臉書等社群媒體中近 4 百萬則留言過濾出可能來自恐怖組織對沙國皇室的威脅留言，並擴大監控社會大眾可能透過相同途徑對皇室發表反對意見 (Ferziger & Waldman, 2017)。

2016 年 7 月 23 日，沙國退役將領艾施基 (Anwar Eshki) 率團訪問以色列，尋求與以推動「2002 年阿拉伯和平方案」，訪以期間，接受以色列外交總長高爾德 (Dore Gold) 會見，訪團同時訪問巴勒斯坦首府拉馬拉 (Ramallah) 會見總統阿巴斯。艾施基在率團赴以之前告訴台拉維夫媒體「新消息報 (Yedioth Ahronoth)」稱「今日的地緣政治已有改變，我們可以很輕易指出我們的共同敵人。以國議員佛瑞 (Issawi Frej) 和蘿辛 (Michal Rozin)、史維特拉瓦 (Ksenia Svetlova) 亦參與和艾施基將軍會談，佛瑞說，沙烏地意圖對以色列開放並發展關係，他們想沿續 1978 年時任埃及總統沙達特所開始的以埃協定，和以色列發展更進一步關係。這次的訪團史無前例且對沙國而言有「試金石」(trial balloon) 的味道，要說以色列和「海灣國家合作理事會」的 6 個國家近期建交比較不可能，但非官方的合作意涵已可嗅出氛圍 (Ulrichsen, 2016: 79-89)。

2017 年 11 月，以國防軍參謀長艾森考特 (Gadi Eisenkot) 在倫敦首次接受沙烏地阿拉伯媒體訪問稱，以國軍方已準備好與沙國政府進行與伊朗有關的情報交換。國防部長利伯曼 (Avigdor Liberman) 籲請溫和派阿拉伯國家領導人與以國結盟，共同對抗伊朗。2018 年 2 月，印度航空宣布取得沙國政府同意經由該國領空飛航新德里至台拉維夫航線，阿拉伯籍的阿聯酋航空更在 2020 年與以色列航空共同宣布將互飛經過沙國領空的杜拜至台拉維夫航線。2022 年 7 月 15 日，沙烏地阿拉伯民航局宣布開放領空予所有航空公司，主要係針對以色列航空，象徵以沙關係的進一步升級 (CNBC, 2022/07/15)。

2019 年 5 月 3 日，穆斯林世界聯盟（Muslim World League）邀請猶太教訪團在 2020 年訪問沙烏地阿拉伯，顯見以阿亦在宗教領域展現合作（Middle East Monitor, 2019/05/04）。



第三節 小結

綜理本章，以色列是美國親密的盟友，卻非處處聽從美國的要求，核武問題、屯墾問題，以色列有自己的政策方針，伊朗的宗教革命讓美以找到合作的議題。面對歐川時期的中東政策，以色列加強與阿拉伯國家的反恐作為、提供阿拉伯國家武器、協助訓練部隊及反恐情資交換。

在以巴問題上，以色列堅持屯墾政策，無意推動「兩國方案」，並利用川普對其「一面倒政策」將以巴問題的天平拉向不可逆的一端，產生情勢上的變遷，使得美國擔任調解者力量減弱，亦使以巴問題趨於無解。

在以沙未來走向上，本論文作者認為，兩國國內因素加美國主導是以沙走向建交與否的關鍵，對以國而言，與沙建交一直是以國政府推動方向，巴勒斯坦不是障礙；對美國而言，以沙建交有利其將以國納入其中東共同防禦體系，讓以阿共存，共同對抗伊朗；對沙國而言，沙國囿於其遜尼派宗主國地位、薩爾曼國王仍堅持「阿拉伯和平方案」的建交條件及國內民意仍呈現分歧下，暫無法與以色列建交，¹⁸ 而薩爾曼王子能否平順繼承就任國王是以沙關係可否大幅邁進的關鍵。

18. 沙烏地境內有許多巴勒斯坦的流亡勞工，有麥加、麥地納兩個回教聖地。境內遜尼「瓦哈比（Wahabbi）教派」是強烈擁護巴勒斯坦人權益及堅持東耶路撒冷為巴勒斯坦首都，這派勢力限制了薩爾曼王子2020年跟隨巴林與以色列建交（Bruce Riedel, 2022）。



隨著 2020 年「亞伯拉罕協定」簽定，在美國牽線下，以色列政府同意「暫時中止」對約旦河西岸屯墾行為，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巴林、摩洛哥等國建交，而沙國也以允許以色列航空飛越領空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巴林通航以表示對「亞伯拉罕協定」的支持，已從先前堅持 2002 年「阿拉伯和平方案」立場向前邁一步，且沙國媒體在報導與以色列有關的新聞時，也從過去的漫罵批評改朝正面方向報導，¹⁹ 隨著沙國背負「遜尼派宗主國」與薩爾曼國王堅持巴勒斯坦完成建國始有建交的一派思想凋零後，以沙始會朝向建交之路前進，是故以沙建交不會是立即的，但會是朝漸進方向進行。

以阿雙方因為宗教、歷史、理念等因素自二次大戰後經歷 4 次大型戰爭和大小不同的衝突，1979 年以埃簽訂和平條約象徵以阿衝突破冰、卻也使「阿拉伯團結」不再可能，讓以色列成功分化阿拉伯國家。這樣的分裂使得日後當其他阿拉伯國家出事時，沒有阿拉伯國家出面聲援，1981 年，以色列攻擊巴格達核子反應爐、1982 年以色列出兵佔領貝魯特，阿拉伯國家無法再組聯盟對抗以色列。

2011 年「阿拉伯之春」更讓許多阿拉伯國家解體，埃及、利比亞、突尼西亞、葉門或是解體，或是由恐怖組織入主成為執政者，傳統的部落社會秩序瓦解，新的公民社會秩序未及建立，要再組成一個聯盟在強權間游走，成為競爭籌碼的環境已不復存在，伊朗成為取而代之的威脅，歐巴馬的中東政策讓中東國家認知到需要與以色列建立一個信賴的策略夥伴關係才能對抗威脅，這才有「亞伯拉罕協定」的推動，讓以阿邁入新的關係，讓以色列進入中東權力平衡體系並扮演要角，擴大在中東政治的影響力。

19. 2016 年 6 月 8 日台拉維夫市中心沙隆納市場（Sarona Market）發生巴勒斯坦人恐怖攻擊事件，造成 4 名以色列人死亡，沙烏地阿拉伯媒體「泛阿拉伯新聞報（Pan-Arab News）」抨擊此次恐怖攻擊事件，阿拉伯記者協會在推特上說，我們支持巴勒斯坦並不表示我們支持巴勒斯坦人可以殺害無辜老百姓。我們對此受害者家庭致上最深的哀悼。



但對以色列而言，這新型態關係的建立並沒有完全解決中東的暴力衝突，以國海法大學國家安全研究中心薛福坦說，以阿衝突或許暫時結束，但以色列的威脅並沒有因此降低反而增加，「伊朗」成為取代阿拉伯國家今日以色列的最大威脅，它在黎巴嫩扶植真主黨並提供金援與武器，在敘利亞扶植民兵在以、敘邊界不定期攻擊以色列，在迦薩走廊支持哈瑪斯以暴力推翻以色列。





第四章 沙烏地阿拉伯的政策回應

第一節 沙烏地阿拉伯與美國的關係及對歐川時期美國外交政策的回應

壹、沙烏地阿拉伯與美國雙邊關係的基本背景

沙國自 1932 年建國起，內部融合紹德家族(Saud Family)與回教保守瓦哈比(Wahabi)勢力形塑成沙國 2 股民間草根力量，主張皇室制度、遵守極端回教教義及保守的宗教律法，這 3 點成為沙國政府制定各項政策的思維，對外提供資金鼓勵穆斯林教徒在全球興建回教學校 (Ernst, 2018)。

沙國和美國的交往始於石油利益，兩國自 1933 年開始合作，1938 年美國標準石油公司（現為 Chevron）和沙國皇室協商取得東沙烏地阿拉伯探油開採權。1945 年，羅斯福總統在埃及和法德國王 (King Fahd) 見面，建立起以「石油交換安全」的戰略關係 (Ernst, 2018)。

1961 年，沙烏地阿拉伯同委內瑞拉、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在奧地利維也納成立「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沙國對「石油輸出國家組織」有絕對的影響力，它的產油量猶如石油市場的「中央銀行」，扮演調節全球油價的關鍵角色。因此，「維護沙烏地阿拉伯和波灣國家的石油生產」數十年來一直是美國在中東的核心利益。但「石油輸出國家組織」成立後試圖控制石油市場及油價，1973 年，沙國為懲罰第四次中東戰爭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國家而對西方國家採取石油禁運，造成全球第一次能源危機。80 年代，沙國主導「石油輸出國家組織」與非「石油輸



出國家組織」會員國展開價格競爭，以增產的方式在半年內讓油價下跌 60%，這樣的 operation 損害了非 OPEC 會員國的蘇聯，最後造成油價崩跌，也讓沙國將石油作為國際政治的戰略武器（Ernst, 2018），但沙美關係並不緊密。

1979 年 12 月，蘇聯進軍阿富汗，包括美國和沙烏地阿拉伯、巴基斯坦共同軍援阿富汗境內反蘇武力，造成在中東和北非數千名遜尼派穆斯林份子進入阿富汗，沙國最大建築公司「沙烏地賓拉登集團」（Saudi Binladin Group）創始人之子賓拉登就是在此時加入恐怖組織訓練沙國恐怖份子對抗蘇聯。而美沙軍事合作關係在 1991 年波灣戰爭時期達到高峰，1990 年 8 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1991 年 1 月美國率聯軍反攻，將伊拉克勢力逐出，戰後沙國惟恐成為伊拉克下一個攻擊目標，請求留駐包括美軍在內的部份聯軍在沙國，一直到 2003 年才完全撤出（Ernst, 2018）。1990 年，賓拉登返回沙國，因與沙國的情報組織過從甚密且反對美軍在中東駐軍而不見容於皇室，在美國率領聯軍將海珊勢力逐出科威特後，賓拉登於 1992 年初離開沙烏地，1994 年遭沙國註銷國籍轉投靠阿富汗塔里班組織下，並在 1996 年頒布回教律令稱，在沙烏地阿拉伯的 2 個回教聖地—麥加與麥迪那，現正遭到美國勢力所佔領（Ernst, 2018）。

2001 年賓拉登發動「九一一攻擊事件」，19 名涉嫌恐怖攻擊的嫌疑犯中有 15 名具沙國國籍，使得沙美關係急轉直下，時任利雅德省長的薩爾曼親王（2015 年繼任國王）胞兄，沙國內政部長納耶夫和沙國國防部長沙頓（Sultan）是提供賓拉登資源，讓蓋達組織能成功向沙國領土以外發展的關鍵者（Henderson, 2021），但美國政府無視此發展仍透過軍售以換取石油利益與區域安全而維持與沙國交往。2003 年小布希總統以伊拉克藏有化學武器為由出兵伊拉克，推翻海珊政權，阿布杜拉王子樂見海珊被推翻，但希望由溫和的遜尼派人士取代意見遭美國忽視，美國無視伊拉克境內什葉派人民占多數的事實，與什葉派與遜尼派的基本矛盾，執意將



民主政治中的「多數決統治」原則帶入伊拉克，反而提供伊拉克什葉派與伊朗什葉派結合的機會，伊朗勢力進入伊拉克，事後證明所選出的總理馬利基、阿巴迪未依民主精神，以宗教教義治國，致造成「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the Levant, ISIL) 崛起，如此平白將伊拉克奉送給伊朗羽翼下，讓沙烏地皇室心生警惕，面對弱化的皇室統治機器，沙國皇室無法控制境內「新世代青年」對網路新資訊吸收及與他國人民資訊交流、宗教和石油收益已無法框住他們的思想(梁文傑, 2018:25)，如果再將此種西方式「多數決統治」帶進沙國，等於是宣判沙國皇室死刑。

貳、沙烏地阿拉伯對歐川時期中東政策的回應

歐巴馬 2009 年 6 月出訪沙烏地阿拉伯，期間向阿布杜拉國王承諾將對以色列施壓解決以巴問題，讓沙烏地誤以為以色列會因此屈服美國壓力在巴勒斯坦問題上讓步，但事實卻是，以色列未停止屯墾行為，巴勒斯坦因此拒絕與以色列走上談判桌，間接加深沙烏地阿拉伯對美不信任 (Lynch, 2018: 120)。

「阿拉伯之春」讓沙美關係更惡化，沙國希望歐巴馬能支持傳統盟國—埃及，但最後卻是穆拉克跨台，埃及經由民主程序選出由恐怖組織「穆斯林兄弟會」派系支持的摩西為總統，又成為 2003 年海珊下台的翻版，再一次讓沙國皇室震懾於民主浪潮可能進入沙國的恐懼 (Riedel, 2016)。

讓沙烏地處境更難堪的是，以什葉派人口占多數的鄰國巴林受「阿拉伯之春」波及，民眾要求遜尼派皇室下台，險些蔓延至沙國。沙國東部一直是以什葉派人口



占多數的地區，沙國政府一直是以「優渥的福利措施」籠絡，²⁰ 面對民選的摩西政府及巴林的民主改革訴求，歐巴馬基本上是支持的，讓沙國皇室戒慎恐懼，為此，沙國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聯合派兵進入巴林敉平動亂，才讓「阿拉伯之春」中止未再向沙國蔓延，而當曾擔任埃及駐沙大使館武官的塞西於 2013 年 7 月發動政變推翻民選的摩西政府時，沙國皇室馬上站出來支持，並提供塞西總統資金援助。

2015 年 7 月 14 日，歐巴馬政府率「伊朗核問題六國機制」與伊朗政府簽署「核協議」。加深了沙烏地阿拉伯對伊朗的疑慮，沙國擔心的不只是其違背承諾繼續發展核武，更擔心伊朗藉此擴充勢力，在中東稱霸，再加上歐巴馬總統允諾倘伊朗確實遵守「核協議」，將解除對伊朗經濟制裁，逐步把美軍勢力撤出中東，讓伊朗在增加財政收入及國防武力之餘，在背後煽動其他中東國家政權叛亂，讓中東地區更加動盪不安，敘利亞、葉門都是案例。

且伊朗「核協議」的簽訂時機適逢沙國內部國王更迭及薩爾曼王子宣布軍事介入葉門戰事。美國雖然提供沙國情報、武器、空中加油等措施協助對抗胡塞組織，但其「堅拒出兵中東」政策仍與沙國對美國的安全承諾期待有差距，間接使得葉門內戰迄今未能平息。2015 年 10 月 18 日，歐巴馬依據伊朗「核協議」承諾簽署備忘錄，解除對伊朗的經濟制裁，伊朗重啟原油生產，至 2016 年 2 月，國際油價跌至每桶 30 美元，間接使沙國原油收入驟減，沙伊兩國變成競爭關係(Tabrizi, 2016)。

川普和歐巴馬的中東政策有一個共同點：「美國勢力應該要逐漸撤出中東」，首

20. 沙烏地阿拉伯對國民的「優渥福利措施」包括：(1)食品與商品的價格補貼：由政府依照各家實際家庭人數提供食品及補貼、汽車免稅及燃油補助；(2)免費教育及醫療：沙國學生免繳學費，技職及大學生每月均可取得政府補助，政府並出資供學生出國深造；(3)無息房貸：每位公民可取得政府 75% 購屋無息貸款，償還期 25 年；(4)免徵個人所得稅，獨占的沙國商人所繳納稅捐由個人決定；(5)其他：沙國政府針對貧民提供濟貧貸款、社會保險等。



先，他在 2018 年 5 月 8 日宣布退出伊朗核協議，改採有利以色列的經濟制裁伊朗、無意與「伊斯蘭國」恐怖組織正面衝突、延續歐巴馬支持沙烏地領導的葉門戰爭，卻無意作更深入的軍事介入。

沙國對此先是支持川普退出伊朗「核協議」，抨擊伊朗表面接受「核協議」的規範，卻暗中繼續發展核武及長程飛彈系統，在敘利亞扶植阿薩德政權，在黎巴嫩扶植真主黨，並在 2003 年伊拉克遜尼派海珊倒台後，扶植什葉派建立自己勢力，另扶植葉門「胡塞組織」騷擾沙國南疆、違反聯合國安理會決議阻撓國際水域航行安全，損及沙國在中東的利益（The Embassy of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Washington DC News, 2018/05/08）。

以巴問題上，沙烏地阿拉伯在年輕的薩爾曼王子主政後，對川普一面倒向以色列並沒有做出以往的強烈反應，相反地，他對巴勒斯坦在以巴問題的「不作為」表示抱怨。2018 年 10 月 2 日，沙裔美籍異議人士哈紹吉在沙國駐伊斯坦堡領事館遭殺，美國認定是薩爾曼王子在背後主導，但遭沙國政府及薩爾曼王子本人否認，美國參議院為此通過對薩爾曼王子譴責案遭川普否決，川普總統的寬容態度為的是要換取沙國增產石油，降低油價以鞏固美國在中東的地位，沙國也如美國所願並加強軍購，使沙國與美維持穩定關係。

第二節 沙烏地阿拉伯的內部變革與挑戰

石油是沙烏地阿拉伯最主要的收入來源，但 2014 年美國成功發展油頁岩技術成為產油國，挑戰了沙國在世界石油霸權地位及石油收入（Ramos, 2023），為分散沙國過度依賴石油收入及沙國面臨油價下跌所造成的財政赤字，創造更有利的投資環境，薩爾曼王子 2016 年 4 月 25 日提出「願景 2030 (Vision 2030)」改革。



- 一、希望讓沙國成為一個充滿活力的社會（A Vibrant Society）：依循「回教溫和路線」，人民享受美好的社會生活與美麗的自然環境。
- 二、建構一個「以服務市場經濟」為導向的教育體系（A Thriving Economy）：為企業提供人力，政府要發展各類投資工具啟動構想，創造多樣性經濟型態與就業需求。
- 三、建立一個有效、透明、負責、高效能的政府（An Ambitious Nation）：以提供人民、公司企業、NGO 承擔責任，迎接挑戰、抓住機遇、營造氛圍（黃學呈・哈賽寧，2019）。

可是多數學者多不看好薩爾曼王子所提出的經濟改革，他們普遍對「沙國內部真實發展」存疑（Henderson, 2021）。依據「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 Watch）在 2021 年 2 月於貝魯特所提出人權報告，沙國政府雖提出一系列改革，卻未曾停止對內部異議人士鎮壓及基本的人權尊重（Human Rights Watch, 2021/02/25），2018 年 2 月 8 日，薩爾曼王子宣布頒布「個人地位法」（Personal Status Law）解除女人披頭紗禁令，女人可以自由結、離婚及主張對子女的監護、繼承權。但這相關規定細節並未公布，亦未真正見諸法律文字，使得何時實施無從知悉。

2019 年，沙國宣布進行婦權改革，包括放寬婦女駕車限制，允許婦女單獨旅行、為子女登記出生證明、在職場免受歧視及性騷擾，但即使如此，那些婦權倡議者，像是哈斯婁（Loujain al-Hathloul）與阿迪拉吉（Nouf Abdelaziz）仍在獄中受到禁錮，在沒有獨立的婦權團體為沙國的婦權政策背書及那些批評政府的異議人士仍遭囚禁的情況下，人權觀察組織對薩爾曼王子所宣稱的改革是否能真正落實，抱持懷疑態度。



事實證明，沙國政府所聲稱的改革措施並不完整，沙國女性仍需在男性監護人同意下才能結婚、出獄、至醫院做婦科檢驗。男性有權對妻子、女兒、女性親戚的「不聽話」當面指責，提出「行為不檢」的指控，甚至強令其返回男監護人住所，若不遵守，可將其送至監獄。

這份人權報告指出，薩爾曼王子由上而下的改革，在沒有公民參與的情況下是不會成功的。

谷戰斯基亦指出薩爾曼王子的「願景 2030」改革面臨以下障礙與挑戰：

- 一、 薩爾曼王子雖然進行社會改革，縮減宗教警察的部分權力、重新開放了電影院、允許婦女單獨駕車。但整體而言，沙國距離「性別平等」的路還很遙遠。沙國仍禁止組成「任何形式的政治組織」，並仍受回教伊斯蘭法律管轄。
- 二、 失業率未見改善：沙國 30 歲以下人口占全國 70%，年輕人是支持薩爾曼王子改革的主要力量，但這一層年輕人的失業率卻有 30%，「願景 2030」推動至今已近 7 年，我們無法預測年輕人的支持能撐多久，如果薩爾曼王子沒有作出具體成果，一旦年輕人態度轉向將危及皇室政權。

三、薩爾曼王子個人問題

(一) 薩爾曼王子既要擔任「皇室制度的保衛者」又要擔任「社會改革的推動者」，他「由上而下」(top-down)的改革，試圖將國家體制由「集體領導」改成為「定薩爾曼王子為一尊」，任何反對薩爾曼王子的個人、媒體、宗教團體、商人、及皇室成員，或遭「解散」、「逮捕」、或被冠以「貪腐」罪名而遭囚禁。這樣的改革造成沙國有錢人的擔憂，惟恐遭「貪腐」罪名羅幟，只能被迫帶著大量資金外逃。

(二) 薩爾曼王子在國內的地位是否穩固，這讓有意投資的外國廠商躊躇不前。

四、薩爾曼王子為避免財政收入過度依賴石油所採取的財政改革效果未如預期：



- (一) 「願景 2030」設定以外匯儲備及出售債券方式填補 1,000 億預算目標並未達成。
- (二) 為因應不斷上漲的生活成本，沙國政府針對低收入人口（約 1 千萬人）啟動「公民帳戶（Citizen's Account）計畫」，把不具沙國公民資格且占三分之一的高端技術人員排除在外，結果就是迫使這些人離開沙國，所遺留下來的技術真空，非國內人力可補足。
- (三) 過去政府用補貼方式換取人民對皇室的忠誠，但薩爾曼王子在「願景 2030」削減這類補貼，恐降低人民對皇室的效忠。薩爾曼王子深知這恐危及皇室的穩定，所以他在 2018 年初取消對水電瓦斯的補貼後，同時對受影響者加薪，但這能否真正撫平人民情緒，仍待觀察。

華盛頓中東問題研究中心波灣與能源政策研究計畫研究員韓德森（Simon Henderson）在 2021 年 10 月發表”Saudi Arabia: what has changed, what hasn't”一文中指出，「九一一事件」後的 20 年沙國最大的算計是「想成為中東的霸主」，2015 年 1 月薩爾曼王子跟隨父親繼位國王，就任經濟發展部長後提出「願景 2030」計畫，意圖將沙國對石油的強烈依賴轉變成以替代能源取代，但要發展替代能源需要資金，仍需靠沙國出售石油收人才能推動，因此，提高產量及維持高油價是必要的手段。基於全球各國對氣候變遷的關心，石化燃料對全球氣候所造成的溫室效應不容薩爾曼王子的改革樂觀（Henderson, 2021）。

韓德森在文中引述財經時報（The Financial Times）8 月報導，以「沙國宏偉的氣候計畫難以啟動（Saudi Arabia's grandiose climate plans struggle to take off）」為標題，副標題為「對沙國能否帶動下一個綠色時代深表懷疑（Skeptics questions whether kingdom's pledge to lead “next green era” will be matched by tangible action）」。薩爾曼王子並沒有針對綠色革命的部分有再多著墨，先前他承諾 2030 年全國將有 50%



的石化能源將由替代能源取代，其餘則來自天然氣，在未來的 10 年，沙國將在國內種植 100 億棵樹，但實際作為卻無從查考 (England & Hodgson, 2021)。

薩爾曼王子雖然放鬆對婦女諸多禁令，但韓德森質疑這些婦女解禁只見於利雅德、吉達等大城市，並沒有真正落實到鄉村小鎮和其他傳統省份人民。此外，沙國極度依賴外籍勞工，卻又嚴厲逮捕非法外勞，矛盾的是，根據沙國內部報告，年輕人找不到工作，失業率高，國內物價悄悄的上漲，但政府對人民的補助逐步縮減中，人們外出工作為的是要取得維持比皇室生活低的水平，而沙國人民平均國民所得在「海灣國家合作理事會」國家排名是倒數的，韓德森擔憂薩爾曼王子計畫耗費 5 兆美元為拚經濟轉型所計畫興建的「新未來城」，最後恐怕只會成為沙國皇室御用的機場和宮殿，而非如薩爾曼王子所說是人民可以安居樂業的地方 (Henderson, 2021)。

第三節 沙烏地阿拉伯和以色列的關係

沙烏地阿拉伯基於同屬阿拉伯陣營的關係，自 1948 年以色列建國以來一直站在巴勒斯坦一方拒絕承認以色列，它以「大阿拉伯主義」為號召，在歷次中東戰爭均無條件地提供巴勒斯坦財政、經濟等方面援助，尤其費瑟國王提供巴勒斯坦數百萬美元的援助，建立「泛回教組織」讓巴勒斯坦在國際舞台有發聲的機會。

1967 年，費瑟國王對以色列提出「三不政策」，1968 年宣布將耶路撒冷作為麥加、麥地那之外回教的第三個聖城 (Ramos, 2023)。1972 年，費瑟國王稱，所有國家應該對以色列發動戰爭。1973 年 10 月第四次中東戰爭失敗，他以石油當武器對西方國家實施石油禁運，讓以沙對立達到高峰，並對戰爭受害國埃及、敘利亞、巴勒斯坦增加石油供應。1974 至 1975 年透過回教組織國際會議推動巴勒斯坦入聯，



即使他稍後於 1975 年遇刺身亡，沙國仍持續提供巴國援助。

如此的沙以關係在波灣戰爭中發生變化，1990 年 8 月波灣戰爭，阿拉法特支持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使沙巴關係陷入谷底，沙國停止對巴援助，伊拉克意圖透過飛彈攻擊以色列逼迫以國還擊，藉此團結阿拉伯國家共同抗以之企圖未成功，反而讓沙以關係躍進，90 年代，在美蘇兩國的推動下，沙烏地阿拉伯以「海灣國家合作理事會」成員國身份和以色列交往，在水資源、再生能源、經貿等領域合作。2002 年，阿布杜拉王子在貝魯特提出「阿拉伯和平方案」，有條件政治承認以色列，隨著日後伊朗威脅日增，以沙兩國因共同利益擴大而小心翼翼地在抬頭下進行靜默外交，沙國不再否定以色列的存在。但此期間，沙國仍致力調解巴勒斯坦內部糾紛，2007 年 2 月成功調解「法塔」和「哈瑪斯」衝突，簽署「麥加協定 (Mecca Agreement)」，²¹ 為巴勒斯坦建國帶來希望 (Ramos, 2023)。

2011 年「阿拉伯之春」，沙國看到歐巴馬總統放任埃及穆巴拉克政權垮台，2015 年 7 月美國率領「伊朗核問題六國機制」與伊朗簽訂「核協議」讓伊朗勢力擴大，危及其遜尼派宗主國地位，沙國因而尋求與包括以色列在內的中東國家合作對抗伊朗。

2022 年 3 月，在美國的推動下，以色列高層國防官員與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卡達、巴林、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埃及、約旦國防部高層官員在埃及西奈半島城市沙姆沙伊赫 (Sharm el-Sheikh)，就如何共同對抗伊朗議題進行會談，這是首次以阿國防高層的軍事峰會 (McKernan, 2022)。

21. 麥加協定：(一)停止一切內部鬥爭，組建民族聯合政府。(二)重建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三)民族聯合政府組織由哈瑪斯派擔任。(四)新組建的民族聯合政府應尊重巴解組織以前簽署的所有協定。(五)副總理由法塔派人士擔任。(六)財政部長、外交部長、內政部長由獨立派人士擔任。



壹、巴勒斯坦因素對以沙關係的影響

對沙烏地而言，巴勒斯坦問題在其發展與以色列關係上一直存在著宗教成份，無法單純以外交上的地緣政治或權力平衡考量，特別是在「耶路撒冷地位」問題上，這讓敵對國家（伊朗）以宗教理由讓巴勒斯坦內部衝突持續以謀取自身利益。對沙國國內而言，巴勒斯坦因素糾結在以下部分：

- 一、以色列強大軍力與核武能力讓沙國認為以色列是可以合作共同對抗伊朗的國家。
- 二、巴勒斯坦現已分裂成為掌控約旦河西岸的法塔組織與控制迦薩走廊的哈瑪斯組織，而伊朗正是哈瑪斯組織背後的影武者，不定期的對以色列攻擊，使沙國對巴勒斯坦的支持呈現分歧。（Nonneman, 2019: 330）

薩爾曼王子曾在2018年3月於紐約會見當地猶太領袖時斥責巴勒斯坦政府不應只是拒絕與以和平方案，而是接受與以和談，不然就是閉嘴（...they should either start accepting peace proposals or "shut up"）（Perper, 2018），薩爾曼王子同時說巴勒斯坦議題已非沙國當今所需處理的首要議題，對沙國而言，伊朗威脅比巴勒斯坦問題更為急迫（Staff, 2018）。

2022年3月，薩爾曼王子表示以色列已非敵人，而且是潛在的同盟，但其擔任國王的父親仍以傳統視角看待以色列，認為以色列惟有遵循「阿拉伯和平方案」中所設定的條件，兩國關係正常化才有可能。可預見的是，沙以關係要大幅邁進恐怕要等到薩爾曼國王去逝、薩爾曼王子平安繼任及沙國國內民意是否轉向才能決定與以是否繼續朝前發展。

基本上，沙國內部民意對和以關係正常化多持保守拒絕的態度，過去幾年，沙



國內部正在作變革，但這樣的變革並不必然會將民意導向同意沙國與以色列建交，儘管內部已有支持與以色列建交的聲音出現，但要取得來自傳統穆斯林教派「塞拉非運動」(Salafi streams)的支持，仍有努力空間 (Guzansky, 2022)。沙國教授拉希德說薩爾曼王子不是1981年時的沙達特，他沒有能力在與以色列簽署建交公報的同時平息來自皇室及民間的反對聲音 (Al-Rasheed, 2020)。

貳、「亞伯拉罕協定」對沙烏地阿拉伯的影響：沙國是否會跟隨其他阿拉伯國家腳步與以色列建交？

2018 年 2 月，印度航空宣布取得沙國政府同意經由該國領空飛航新德里至台拉維夫航線，阿拉伯籍的阿聯酋航空更在 2020 年與以色列航空共同宣布將互飛經過沙國領空的杜拜至台拉維夫航線，十足證明以沙兩國關係公開化及進展。2020 年 8 月 13 日，在川普的主導下，美國、以色列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共同簽署官方協定，以色列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關係全面正常化。1 個月後，2020 年 9 月 11 日，在美國協助下，巴林宣布與以色列建交。沙國受限於其遜尼派宗主國地位、巴勒斯坦因素、薩爾曼國王仍堅持以色列須遵守「阿拉伯和平方案」的條件下，而未跟隨巴林、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在 2020 年與以色列建交 (Guzansky, 2022)。

對沙國而言，「亞伯拉罕協定」的簽訂是和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的前奏，而與以色列建交則是其「九一一事件」造成美國國會嚴厲譴責沙國之後，沙國改善對美關係的工具之一 (Guzansky, 2020)，沙烏地阿拉伯對「亞伯拉罕協定」的支持表現在前述沙國開放領空允許其他國家班機進出以色列，沙國國營媒體也一改過去，在報導與以色列相關的新聞時，不再漫罵批評，而改以正面方向報導。沙國外長朱拜爾曾說，雖然沙國政府迄今仍強調以巴問題須遵循「阿拉伯和平方案」解決，沙以才



有建交可能，但事實上以沙關係正常化是無法避免的趨勢，「巴勒斯坦因素」已不是以沙關係發展的障礙，(Guzansky & Marshall, 2020)。

「亞伯拉罕協定」顯示阿拉伯國家對抗伊朗的決心，沙烏地在美國的支持下，基於和以色列有共同的敵人—伊朗才願意和以色列發展關係。谷戰斯基認為，「亞伯拉罕協定」迄今近 3 年給大家的啟示是，波灣國家可能與其他阿拉伯國家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的共識脫勾，自行對所謂的「巴勒斯坦問題」作出符合自身國家利益的定義，因此沙國也有可能透過與以色列加強關係而把巴勒斯坦問題放在一邊，以彌補美國離開中東所喪失的安全感。的確，沙美關係，特別是美國在中東領導者的角色在沙以關係正常化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一旦沙烏地阿拉伯領導人認為和以色列改善關係可以間接強化沙美關係時，那麼沙國可能會對以色列正常化議題上朝更正面方向發展。現階段沙國站在「亞伯拉罕協定」背後當其他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關係推動的「影武者」是最符合當前沙國利益的。美國如果在以沙關係正常化上對沙國過度施壓恐會造成反效果 (Guzansky, 2022)。

「亞伯拉罕協定」為以阿建交樹立門檻：在以色列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建交公報中，以色列同意延緩對約旦河西岸的合併，將來如果以沙建交，沙烏地必能取得比阿拉作聯合大公更高的門檻，為巴勒斯坦取得更多的利益。(Guzansky & Marshall, 2020)。

然而，波灣國家對以色列的立場不一致，2002 年「阿拉伯和平方案」承認了以色列的生存權。因此沙烏地阿拉伯有可能隨著時間推移，以和以色列關係正常化做為與美國關係正常化的籌碼。



沙國和以國發展正常關係的底線是以「漸進式」先透過「議題式的合作」（反恐、反伊）進行合作，接著是否會擴大議題範圍，進而朝準同盟/同盟，或提建交方向前進，所以沙國是否加入「亞伯拉罕協定」精神與以進一步發展關係，要視以下 4 個因素而定：

1. 「亞伯拉罕協定」本身是否執行成功？
2. 以巴關係是否改善？
3. 美國是否出售沙國先進武器？
4. 沙國內部變化與薩爾曼王子能否安穩繼承王位（Riedel, 2022）？

第四節 巴勒斯坦因素的背景與影響

壹、阿拉伯國家對巴勒斯坦建國態度-以約旦、埃及為例

巴勒斯坦自1948年5月以色列建國後便分裂成兩個統治區，四次中東戰爭（1948.5-1973.10）造成數十萬人出逃，約旦、埃及、敘利亞等都是他們的逃亡標的，這些阿拉伯國家表面支持巴勒斯坦建國，其實心中各有盤算，以約旦為例，國王胡笙（King Hussein, 1952.8-1999.2）以「支持巴勒斯坦建國」的強烈承諾，全力協助安置巴勒斯坦難民，實則是試圖兼併約旦河西岸土地，此舉引起巴勒斯坦人反抗。

1967年「六日戰爭」結束後，約旦和巴勒斯坦民兵爆發多次衝突，1974年秋，阿拉伯聯盟在拉巴特（Rabat）峰會通過承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是代表巴勒斯坦唯一合法政府，挫敗了胡笙國王併吞約旦河西岸的想法，11月23日，胡笙解散包括約旦河東西岸的國會，1979年以埃簽署和平協定，胡笙於1983年4月同意巴勒斯



坦自決，1993年協助促成以巴簽署「奧斯陸協定」，1994年10月26日順勢與以色列簽署和平協定，兩國建交 (Nasur et al., 2012: 1-16)。1999年阿布杜拉二世 (Abdullah II bin Al Hussein) 繼位，同年5月訪美時強調約旦願意做為中東區域的穩定力量，對以巴問題主張實現「兩國方案」(Columbia University World Leaders Forum, 2011)，但已未見其他支持巴勒斯坦建國的作為。

埃及在納塞總統執政時期 (1952.7-1960.10)，以高舉「支持巴勒斯坦建國」大旗實則為實現埃及成為中東及北非「泛阿拉伯國家 (Pan-Arab States)」共主的工具。1948 年，埃及在迦薩成立「巴勒斯坦執委會」做為巴勒斯坦政府，但嚴格限制他們的政治權力，1956 年 10 月第二次中東戰爭，埃及失去西奈半島，納塞以更激進口號號召阿拉伯人團結抗以，視那些不支持巴勒斯坦建國的人為「異議份子」(heretic)，這些異議份子會被自己人懲罰、消滅 (Schueftan, 2021)。這樣子的主張一直到 1967 年「六日戰爭」以色列奪下迦薩地區後才有改變。「六日戰爭」後，納塞面對巴勒斯坦表現的既激進又溫和，為的是強調他在「泛阿拉伯國家」的地位及取得美俄兩國最大的政經利益。因此，當他在面對西方人民演說時，他刻意貶低巴勒斯坦要毀滅以色列的最終目標，並強調接受「1949 年停戰協定」(1949 Armistice Agreements) 及接受以色列存在的事實；但在面對阿拉伯人民演說時，他又強調支持巴勒斯坦，消滅以色列，卻避免使用「解放巴勒斯坦」的字眼。由此可知，支持「巴勒斯坦建國」對納塞而言只是一枚棋子而已 (Sharnoff, 2021: 12-13)。

1973 年第四次中東戰爭失敗，以埃於 1979 年建交，埃及放棄原先堅持「巴勒斯坦建國」主張並和以色列發展緊密關係。時至今日，現任總統塞西對「巴勒斯坦問題」的基本立場附和沙烏地阿拉伯所提「阿拉伯和平方案」之上，但實際上埃及的優先議題是防止國內既有的「穆斯林兄弟會」結合由伊朗控制位於迦薩的哈瑪斯組織與西奈半島既存的恐怖組織成為一股推翻埃及政府的力量，因而與以色列進



行緊密情報合作，「支持巴勒斯坦建國」已非優先處理議題。

貳、美國對巴勒斯坦問題的處理方式

美國對以巴問題的處理序列是置於以阿問題的框架下，1973年國務卿季辛吉在福特總統授意下，與巴勒斯坦建立秘密溝通管道；1979年卡特總統調停促成「大衛營協定」，隔（1980）年以埃建交，另由以色列、巴勒斯坦、埃及、約旦討論約旦河西岸、迦薩走廊巴勒斯坦居民的自治問題，使以巴和解初露曙光。雷根總統之後的美國總統對以巴問題的處理都是以承接前任總統的框架下向前推進，以和平解決、「兩國方案」為藍本提出路線圖（road map），但這個推進動力到歐巴馬總統時中止。

歐巴馬雖勉力調停要求以色列停止在約旦河西岸的屯墾興建，2013年至2014年國務卿凱瑞努力協調以巴雙方建立新的框架，卻遭以色列總理納唐雅胡陽奉陰違式的抗拒及巴勒斯坦的不諒解而一事無成，迫使歐巴馬總統在2016年12月聯合國安理會討論譴責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領地的屯墾行為時投下棄權票通過2334號決議案首次譴責以色列的屯墾行為。2017年1月川普上任，對以色列採一面倒政策，使得國際間認為美國已不再是以巴問題的中立調停者。2021年拜登總統上任，雖有意拉回「兩國方案」的行動方針，但卻對川普所造成的既定局面並沒做過多改變（Harb, 2022），尤其川普在2018年宣布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並在隨後與納唐雅胡總理於記者會上共同宣布以色列在戈蘭高地的主權已改變「兩國方案」的本質，使以巴衝突更為難解，巴勒斯坦離建國之路更為遙遠。

綜合上述，以巴雙方在邊界畫定、耶路撒冷定位、難民問題、以巴安全及相互



承認等議題迄今仍沒有獲得共識，美國做為調解國的能力和意願也隨時間降低，短期之內以巴問題難見曙光（Robinson, 2022: 1-17）。

參、以色列角度對巴勒斯坦建國的態度

當今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問題的態度越來越強硬，無論是2021年推翻納唐雅胡的聯合政府總理班奈特（Naftali Bennett, 2021.6-2022.7）、看守總理拉皮德（Yair Lapid, 2022.7~2022.12），亦或是2022年12月三度回鍋擔任總理的納唐雅胡均表示反對巴勒斯坦建國且無意與巴勒斯坦政府進行談判。

埃及前駐加拿大大使約瑟夫（Hesham Youssef）在2022年2月所發表”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The Danger of 'No Solution' Messaging”一文中表示，以巴未來恐朝災難性方向發展，以色列政府對巴勒斯坦問題正朝向不可逆的「六不」（Six No's）境地前進，使以巴問題漸趨無解，包括：

- 一、不接受「兩國方案」（No Two-State Solution）：此一主張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班奈特，他說「如果讓巴勒斯坦建國等同於是讓一個恐怖主義國家建立」，這與他主張在巴勒斯坦領地進行屯墾行為的狂熱支持如出一轍。
- 二、不允許「巴勒斯坦建國」（No One-State Outcome）：巴勒斯坦建國會破壞以色列領土的完整性，摧毀具猶太特色的以色列國。
- 三、不與巴勒斯坦「談判」（No Negotiation）：自納唐雅胡第二度擔任總理（2015.5-2021.6）以來，為拉攏右翼政黨的支持維繫國會多數，以色列政府已無與巴勒斯坦談判的意願；2021年繼任的班奈特與2022年7月擔任看守總理的拉皮德均反對任何與巴勒斯坦進行政治談判，2022年12月第三度回任總理的納唐雅胡



態度更是強硬。

四、不會停止「屯墾行為」(No End to Settlements)：自從「六日戰爭」以後，以色列的屯墾行為實際上對巴勒斯坦產生「蠶食鯨吞」效果，這使得巴勒斯坦建國的希望越來越渺茫，因此已成為阻撓以巴和平推動的主要因素，尤有甚者，就算2016年12月聯合國安理會通過2334號決議譴責，但以色列政府仍然置之不理。

五、不承認巴勒斯坦在東耶路撒冷的主權 (No Palestinian Sovereignty in Jerusalem)：巴拉克總理 (1999.7-2001.3) 時期曾同意讓巴勒斯坦擁有東耶路撒冷主權，但後續發生的「第二次起義」(2nd Intifada) 與以巴軍民無止境的衝突，使武力日趨強大的以色列越來越不願意對弱小分裂的巴勒斯坦讓步。

六、不允許難民返回原居地 (No Refugee Return)：2002年的「阿拉伯和平方案」對重置巴勒斯坦難民設定條件，但仍是「第二次起義」的發生使得解決難民問題的時機消失。以色列並自2003年起對包括巴勒斯坦難民重返原居地、屯墾問題、巴勒斯坦建國等3議題態度越趨強硬，毫無讓步空間 (Youssef, 2022)。

第五節 小結

綜理本章，美沙關係從來就沒有和諧過，沙國資助恐怖組織、對外輸出回教教義、不佳的人權紀錄、缺乏民主字眼年年出現在美國國務院的年度報告上，但兩國為了維繫石油和區域安全利益並未絕裂 (Riedel, 2016a)。

歐巴馬曾在2009年向阿布杜拉國王承諾將協助解決以巴問題，讓沙烏地誤以為以色列會在美國的壓力下讓步，但事後發展並非如此，加深沙國對美的不信任感，「阿拉伯之春」與伊朗「核協議」讓沙美關係更為惡化，迫使沙國尋求與包括以色列在內的國家發展關係，以維護皇室的生存。



沙國和以色列的關係在「阿拉伯之春」後公開化，具體表現在反恐、對抗伊朗發展核武及擴張代言勢力等議題上，雖然有沙國國內及巴勒斯坦因素等障礙，但在薩爾曼王子仍掌握實權下已非首要議題，2020年8月「亞伯拉罕協定」聲明發佈打破了沙烏地阿拉伯在2002年「阿拉伯和平方案」所設定的框架，這反應在沙國開放領空允許各國航空公司利用其領空飛往以色列。谷戰斯基認為「亞伯拉罕協定」迄今3年給大家的啟示是，波灣國家可能與阿拉伯國家共識脫勾自行定義「巴勒斯坦問題」，沙國也可能循此模式透過與以色列加強關係把巴勒斯坦問題放在一邊，以彌補美國離開中東的不安全感，但薩爾曼王子不能忽視的是，沙國境內有許多巴勒斯坦流亡勞工，及麥加、麥地納兩個回教聖地，境內的瓦哈比更是堅持擁護巴勒斯坦權益及堅持巴勒斯坦在東耶路撒冷主權的教派，這限制了薩爾曼王子跟隨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發展進一步關係（即「準同盟/同盟抑或建交？」）的阻力。

沙國內部穩定與否始終是一個謎，我們無法從文獻、新聞上看出端倪，多數學者並不看好薩爾曼王子的「願景2030」，對沙國內部真實發展存疑。不論是谷戰斯基或是韓德森，他們普遍認為薩爾曼王子的「願景2030」的執行過程不透明，空有解禁法律，卻無從得知落實程度，年輕人支持薩爾曼王子，卻不易找到工作；政府削減人民補助，但面對物價攀升，人民（特別是年輕人）是否持續支持「願景2030」、支持皇室續存表示存疑，這會讓以沙兩國關係的發展出現不確定性。

二戰後的巴勒斯坦一直是阿拉伯國家的「棋子」，沒有任何一個阿拉伯國家真心支持巴勒斯坦建國，沙烏地雖然曾是支持巴勒斯坦建國最有力的國家並提供實質的援助，但隨著伊朗威脅日增，再加上巴勒斯坦自身的分裂，使沙國對巴勒斯坦的支持遞減中。在以沙走向準同盟/同盟，抑或是建交的角色上，巴勒斯坦已無能力影響，據本論文作者外派以色列及與巴勒斯坦官員交涉的經驗，巴勒斯坦長期被以色列孤立，原先「奧斯陸協定」中畫歸巴勒斯坦政府管轄的「A區」，由以巴共



管的「B 區」及由以色列政府代管的「C 區」上的巴勒斯坦居民因長期被孤立，無法結合成聯合勢力，且基礎建設、水電設施高度仰賴以色列，已無力形成一股可左右以沙關係發展的影響力，在可預見未來，如果薩爾曼王子能平順繼任國王，巴勒斯坦將不會是沙以兩國關係發展的阻礙。

在以巴問題上，國際上雖仍有美國和「中東四方報告」機制調解以巴衝突，但前者在川普任內多項改變以巴和平前提的作為，拜登無意調整使以巴和談的前提已有根本變化（承認巴勒斯坦擁有東耶路撒冷、回復1967年前國界...），美國擔任以巴問題調停者的公信力減弱；後者只是美國、歐盟、俄羅斯及聯合國所加入針對以巴問題於固定時間提出的「中東和平路線圖計畫」建議，效力更是有限，是故，巴勒斯坦建國短期而言是遙不可及的。



第五章 車維德理論應用在美以沙關係及美日韓關係之比較

第一節 歐川時期美以沙戰略關係的演變

壹、美以與美沙的戰略關係

以色列和沙烏地阿拉伯是美國在1979年伊朗宗教革命後維繫中東秩序的兩大支柱，美國分別與以沙兩國有不同程度的戰略關係。

一、美國與以色列的戰略夥伴關係

美以戰略夥伴關係是演進而成的，1952年7月23日美國和以色列簽署「國防互助協定」(Mutual Defense Agreement) 美國據此提供以色列武器；1985年，美國和以色列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使美國成為以色列最大貿易國；2012年美以簽訂「加強安全合作法」(The U.S.-Israel Enhanced Security Cooperation Act)；2014年復簽訂「美以戰略夥伴關係法」(The U.S.-Israel Strategic Partnership Act)，將美以的合作領域自國防擴展到國土安全、資安、能源及貿易領域上。是以「美以戰略夥伴關係法」將以色列定位為美國的「主要戰略夥伴」，是現今美以安全關係的主要依據，其位階是在法律、行政命令之下 (Zanotti, 2022)。

美國和以色列並沒有簽訂任何軍事同盟協定，美國也沒有在以色列駐軍及軍事基地。我們可以從以色列在美國最大遊說團體「美以公共事務協會 (The 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 AIPAC)」的成立宗旨中看出：美以是具有共同價值與戰略利益的互惠夥伴關係，以色列是美國在中東安全架構下的關鍵支柱，中東唯

一的民主國家，和其他美國盟國不一樣的是，以色列堅守自主防衛，從不要求美國為以色列出兵，²² 但美國官員均定期表示對以色列的安全保證，且「美以公共事務協會」在美國政界具一定程度影響力，使美國所為中東政策較偏袒以色列。



根據美國國會研究中心於2022年8月出版「美以關係報告」(Israel: Background and U.S. Relations in Brief)，美國對以色列的安全承諾建立在以下兩個具體措施：

1. 迅速軍售以維持以色列對阿拉伯鄰國的「軍事質量優勢」(Qualitative Military Edge, QME)。
2. 持續軍援，讓以色列部隊成為全球技術最先進的部隊，國會授權以色列將這部分軍援透過「離岸公司（Offshore Procurement, OSP）」協助以色列建立自主國防產業，與美國共享研發成果 (Zanotti, 2022)。

美國對以色列的大量軍援可以回溯到1973年10月的第四次中東戰爭，最近的一次「美以軍援協定」於2016年9月14日簽署，依據該協定，美方自2018年10月起每年提供以色列38億美元軍事援助，為期10年。

二、美國與沙烏地阿拉伯以軍售交換石油利益的戰略關係

美國和沙烏地阿拉伯的關係在「阿拉伯之春」前是建立在以石油交換軍售與區域安全的利益上，1951年美沙簽訂「軍事合作協定」(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audi Arabia Concerning Mutual Defense Assistance)，沙國允許美國空軍東部「達蘭空軍基地」(Dhahran Air Base)，1957年美國以七千萬美元協助沙國基礎建設為名，續延長使用該基地五年，作為遏止蘇聯勢力向南擴展的前進基地，但隨著60年代阿拉伯民族主義興起，以埃及、伊拉克為首的阿拉

22. <https://www.aipac.org/relationship>



伯民族主義勢力反對美國在阿拉伯國家部署軍事基地，導致美國在1961年4月撤出，在波斯灣僅保留巴林與伊朗的空軍基地（孫德剛、鄧海鵬，2014: 55）。

和以色列一樣，美沙兩國並無簽署軍事同盟條約，冷戰時期，沙國除允許美軍使用其空軍基地作為美沙合作圍堵蘇聯勢力外，並沒有參加如「中部公約組織」之類有非阿拉伯國家成員的軍事聯盟。

美沙真正軍事合作首見於1979年12月蘇聯入侵阿富汗，美國與沙國共同對抗蘇聯，到1991年波灣戰爭時期達到高峰，1979年1月伊朗宗教革命，美國被迫斷絕與伊朗的軍事關係，同年12月，蘇聯入侵阿富汗，美國會同沙烏地阿拉伯、巴基斯坦共同軍援阿富汗境內反蘇武力；1991年1月，美國率領聯合國部隊以沙烏地阿拉伯為基地對伊拉克發動反攻，並奪回科威特，戰後沙國皇室惟恐遭到伊拉克報復而要求美國聯軍留駐沙國，一直到2003年因為沙國保守派宗教勢力反對、美軍續駐造成沙國的財政負擔及美軍基地屢遭恐怖組織攻擊等因素，使美國部隊撤出沙國，但仍在沙國保有空軍基地（孫德剛、鄧海鵬，2014: 58）。

期間，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讓美沙關係降至最低點，但後來的美國總統基於石油利益、軍售及維護中東區域安全，仍續維持與沙國戰略關係。2009年歐巴馬上任，諸多作為雖讓沙國感到憂心，但根據英國衛報（The Guardian）引述美國智庫「國際政策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軍火與安全項目主任哈東（William Hartung）於2016年所提報告，歐巴馬是美沙自1945年結盟71年以來對沙國軍售最多的一任總統，總計歐氏任內共出售沙國42筆、總價一千一百五十億美元武器。同份報告分析歐巴馬軍售沙國的目的在彌補美伊簽署「核協議」所造成沙國皇室的不安（Borger, 2016）。2017年5月，川普訪問沙國宣布將對沙出售一千一百億美元武器，並簽署10年軍售協議以做為對沙國安全的持續保證。2010年，美



國油頁岩技術開發成熟並在2014年大量增加，至2019年美國躍升為全球原油產量第一的國家之後（Amadeo, 2021），石油在美沙戰略關係份量下降，兩國反向成為石油出口競爭者，加上2017年川普和沙國所簽軍售合約實際執行率未如預期，拜登於2021年接任後宣布暫時凍結對阿拉伯聯合大公國50架 F35戰機在內及對沙逾百億軍售（Jewish News Syndicate , 2021/01/27），儘管美國仍以沙國做為其穩定中東區域安全的重要盟邦，但沙美關係已見傾斜。

貳、以沙的「準同盟關係」？

以沙兩國在以阿五次中東戰爭期間（1948.5-1982.6）是敵對關係，卻也沒有直接的軍事衝突，反而曾經在1962年9月的北葉門內戰中合作，共同支持當權皇室對抗埃及、蘇聯支持的共和派。做為遜尼派宗主國，沙國在歷次中東戰爭均站在阿拉伯國家一方，以「阿拉伯聯盟」成員國身份對抗以色列，但也僅止於財政與軍援阿拉伯盟國，並未實際派兵與以色列作戰。1982年法德國王宣布承認以色列的生存權，兩國關係始見融冰，沙烏地阿拉伯在「海灣國家合作理事會」體系下與包括以色列在內的猶太企業進行交流，「巴勒斯坦因素」一直是以沙發展全面關係的主要障礙。

1991年10月，象徵以巴和解前奏的「馬德里會議」開啟了以色列和沙烏地阿拉伯的合作先河，1993年「奧斯陸協定」簽訂後，以沙非官方交流抬頭化；2002年，沙國王子阿布杜拉提出「阿拉伯和平方案」，首度在政治上有條件承認以色列，卻遭以色列拒絕，使以沙關係未有進一步進展。

2009年歐巴馬宣布自伊拉克撤軍，堅拒出兵中東，2010年12月開始的「阿拉伯之春」讓恐怖組織滲入被推翻的國家，伊朗勢力趁隙向西擴充，2015年7月美伊簽署「核協議」讓以沙同時感到不安；2017年川普就任後雖然於隔（2018）年5月退



出「核協議」，但對伊朗的經濟制裁未見成效，伊朗持續對代言勢力提供經濟與軍事援助，讓以沙有合作發展空間。

2015年1月，薩爾曼王子進入權力核心，拋棄第一代領導人反以的包袱與以色列展開政治議題上的合作，範圍跨及軍事情報、軍售、部隊訓練、反恐到資安等領域，但受限於「巴勒斯坦因素」及沙國內部仍居高不下的反以民意，現階段只能看到議題式的基礎合作，兩國是否能走向高層互訪、公開的軍事合作等領域仍待觀察。

第二節 車維德的美日韓三邊戰略關係是否可以運用到浮現中的美以沙三邊戰略關係？

美以沙三角關係產生於1979年伊朗宗教革命後，初期僅為以沙兩國個別對美兩組關係，以沙原是敵對關係，至80年代開展民間領域（水資源、再生能源、經貿等）合作，至歐巴馬時期兩國始在特定議題上展開合作，並在「阿拉伯之春」後開展政治議題合作，川普更是主導擴大兩國合作領域，所以目前這組三邊戰略同盟關係尚在形成中，和美國在東北亞已形成的美日韓戰略三角關係的形成過程有相似性，如下頁圖5-1所示：。

車維德的美日韓三角同盟與浮現中的美以沙三角同盟的比較

一、以色列與沙烏地阿拉伯是美國維持中東區域安全的兩大支柱，就如同日本與南韓是美國維持東北亞區域安全的兩大支柱。



中東的冷戰樣態和亞太地區不同，1979 年伊朗宗教革命與 2010 年末開始的「阿拉伯之春」是中東情勢的分水嶺，前者發生後，僅產生美以、美沙兩組同盟關係，以沙尚為敵對關係，所以美以沙三角關係尚未形成，且以色列反而曾在伊朗宗教革命後與伊朗有短暫的軍事合作；²³ 後者讓中東進入後冷戰時期，伊朗及其代言勢力是這組關係的共同威脅，美國是這組三角關係的主導者，但其與以沙的軍事關係和對日韓軍事同盟關係不同，軍事合作程度亦不同。面對伊朗這個威脅的共同認知是維持三角互動關係及兩組雙邊同盟關係的重要環節，基於伊朗宗教因素，美國無法讓以沙製造「安全責任轉嫁的環境」，所以史奈德 (Glen Snyder)「同盟安全困境」及車維德的「日韓準同盟關係」情境，並不完全適用於此組正在形成中的三角關係。

2011 年元月「阿拉伯之春」進入中東，沙國認定歐巴馬政府的「不作為」放任埃及穆巴拉克政府垮台讓沙國懷疑美國的安全承諾，沙國惟恐美國重返亞洲，軍力逐步撤出中東產生「可能被拋棄的恐懼」，在尚未與以色列有公開的政治合作關係下，尋求與其他強權建立關係，以避免被恐怖主義與伊朗的侵蝕 (Hayman & Guzansky, 2022)，這部分符合史奈德所言「同盟安全困境」。

當 2015 年 7 月美國率「伊朗核問題六國機制」與伊朗簽署「核協議」時，薩爾曼王子已進入沙國權力核心，他開始強化沙國與以色列在「反伊」議題方面的合作。但根據車維德「日韓準同盟關係」假說，美國因為與伊朗簽署「核協議」將其對中東的安全承諾轉移由其他國家分擔，讓以沙兩國感受其安全承諾降低，會使兩國強化合作，事後證明也是如此。以沙兩國領袖均對伊朗「核協議」簽訂表示譴責，

23. 1979年伊朗宗教革命，「反以」雖是伊朗神權政府的立國基礎，但矛盾的是，隔（1980）年「兩伊戰爭」爆發，遜尼派的沙烏地阿拉伯支持同為遜尼派的伊拉克海珊政府，對抗什葉派的伊朗，使得伊朗和當時同與阿拉伯國家為敵的以色列合作，以色列並提供伊朗軍事協助。（陳立樵，2018: 235-2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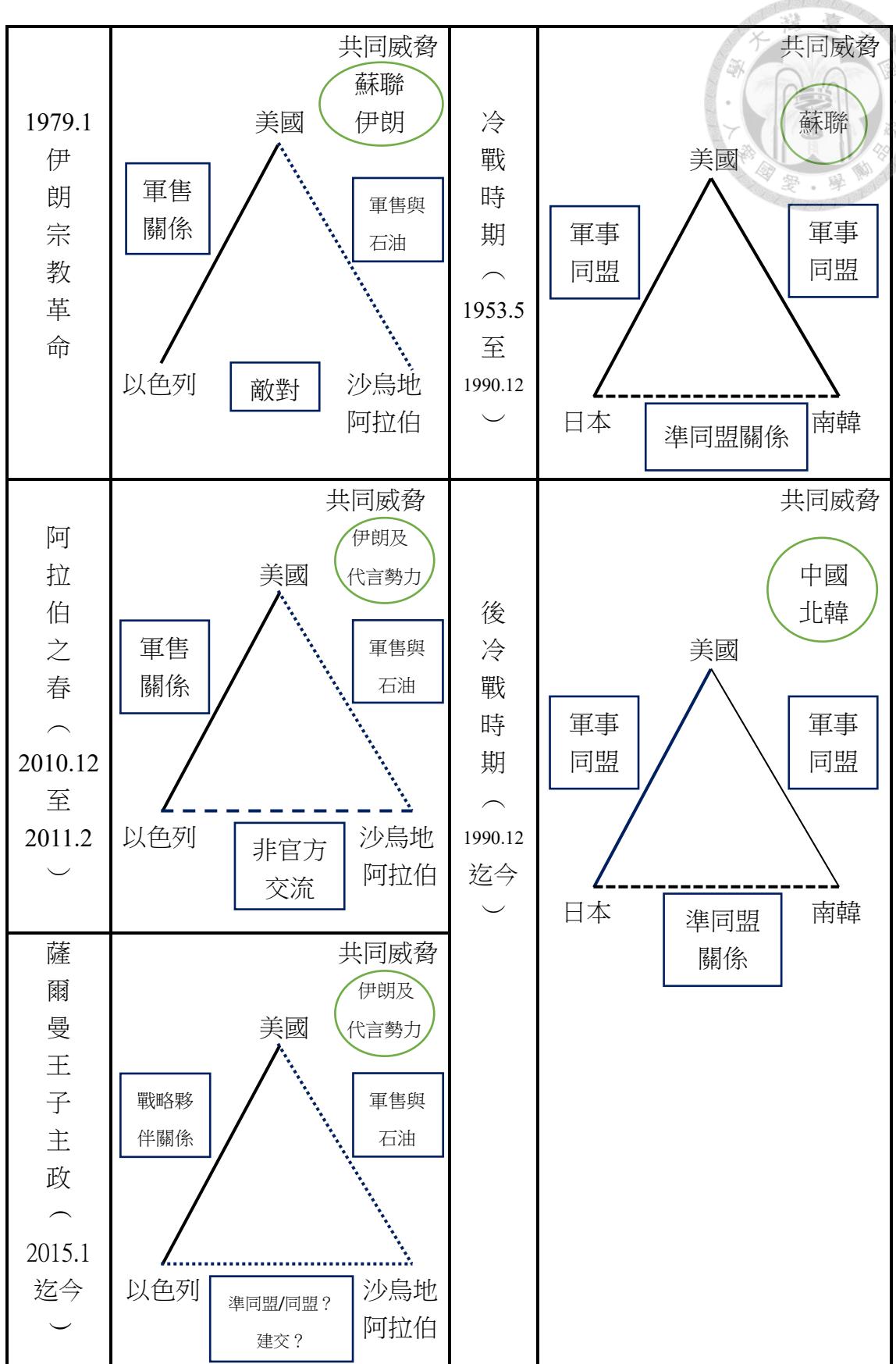


圖 5-1 美以沙仍在形成的三角關係與美日韓三角關係比較（作者自行繪製）



顯示「可能被拋棄的恐懼」，此時歷史因素、宗教因素皆非兩國合作障礙，但兩國的合作型態不對等，以色列因為在美國有「美以公共事務協會」等猶太勢力影響美國政府決策及美國持續軍援的安全承諾、堅守自主防衛，不要求美國為其出兵的明確立場且為擁核國家，讓美國不會作出過於悖離以色列的政策，是以所顯示「可能被拋棄的恐懼」低，相較於此，沙國所顯示「害怕被拋棄的恐懼」較以色列強烈，它除尋求與以色列合作外，另尋求與俄羅斯、中國等強權合作以維護皇室地位，然而這些強權和伊朗並無直接衝突，甚至存在著合作關係，尚無法取代美國的地位，所以當伊朗「核協議」於 2015 年 7 月 14 日簽署時，以色列總理納唐雅胡在同日下午強調，以色列將一如既往地保衛自己的安全 (Mitnick, 2015)，所以以沙兩國在伊朗「核議題」上的互賴是不對等的。

二、相較於美日韓三角關係，美國是日韓不可或缺的盟國；但在美以沙三角關係則否。

車維德指出，美國是美日韓這組三角關係的主導者，擔負大多數的同盟義務，並為日韓創造一個得以「將安全責任轉嫁的環境 (Freedom of irresponsibility)」，對威脅的共同認知是維持三角互動關係及兩組雙邊同盟關係的重要環節。

60年代，美國深陷越戰泥沼，美國須同時與蘇聯進行核武競賽，時任總統尼克森（1969-1972）一方面推動緩和措施降低美俄緊張，另一方面尋求與中國建立聯繫管道以「聯中制蘇」。「降低在日韓的駐軍」成為手段之一，引起日韓一致反應，兩國因「害怕被美國拋棄的恐懼」放下成見展開部長級會談，尋求如何對抗來自北韓頻繁的挑釁，使得日韓關係和緩且靠近。

1972年2月，尼克森訪問中國，美蘇對抗態勢出現緩和，美國向日本表示不會



放棄對其安全承諾，使日本有了「安全責任轉嫁的環境」，時任日本首相田中角榮（Tanaka Kakuei）抨擊南韓朴正熙長期的威權統治，拒絕承認南韓為朝鮮半島唯一合法政府，改採以與南北韓等距外交，1972年9月，日本與中國建交，另與北韓簽訂經濟協定，使兩國的貿易金額倍增，關係出現改善，造成南韓政府陷入「害怕可能被美日拋棄的恐懼」中，與日本關係陷入低點。

1975年4月30日，最後一批美軍撤出越南。卡特在極端的反戰浪潮中於1977年1月上任總統，他受美國內部反戰情緒制肘，主張撤除多數在日韓的美軍，造成日本與南韓對於「可能被美國拋棄的恐懼」加深，雖然日本對南韓的威權統治不表認同，但為共同對抗威脅，維持聯盟穩定，還是與南韓合作說服卡特政府維持駐日韓美軍數量。是故，美日韓三角關係在冷戰時期一直呈現「二實一虛」狀態，日韓關係時而合作、時而對抗，端看美國對這組三角關係的安全承諾強度而定。

日韓無論面對冷戰時期的蘇聯、北韓或是後冷戰時期的中國威脅時，均需要美國的安全承諾才能抵抗共同的威脅，無法單獨對抗；但以色列和沙烏地阿拉伯在面對伊朗及其代言勢力的威脅時，美國並非不可或缺的盟國。

2011年歐巴馬總統宣布「重返亞洲」、川普延續提出「印太戰略」，表示美國加強對亞太地區的安全承諾，希望透過包括日韓在內的亞太國家制衡中國。依照車維德的假說，日本與韓國會因為美國的承諾強度增加而降低合作，甚至出現摩擦，事實也是如此，但此時造成日韓摩擦的因素不是因為美國承諾強度增加所造成「可轉嫁的安全責任環境」，而是日韓對中國威脅的認知改變、領導人對歷史仇恨因素的加重詮釋，使得兩國關係出現分歧。

日本在中國取代蘇聯成為新威脅後跟隨美國強化美日安保體系，領土問題、



歷史問題使日中關係無法走近；相對於此，南韓因為在北韓核議題需要中國的協助，對中態度不如以前對冷戰時期的蘇聯那樣的零和思維，面對中國對韓、美同盟的懷疑，南韓逐漸在美、中之間採取等距外交（葉菀絨，2020：21），「2017年南韓佈署薩德反飛彈系統事件」鬆動了韓美軍事同盟默契。雖然車維德認為日本和南韓的歷史仇恨始終存在，兩國仍會基於國家利益，選擇跨越歷史鴻溝相互合作，但自2018年下半年開始所發生的日、韓衝突事件，²⁴ 及前述美日韓三國對中國威脅認知的不一致，使車維德的假說因情勢變遷產生新的變數無法涵蓋解釋。康乃爾大學國際關係博士候選人、喬治華盛頓大學安全與衝突研究所前研究員南韓籍曹恩娥（Eun A Jo）表示，歷史因素仍將是日韓關係無法進一步發展的原因（Jo, 2022）。²⁵

在面對伊朗於「阿拉伯之春」後擴張勢力至伊拉克、敘利亞、葉門時，歐川政府堅守「堅拒出兵中東」政策，僅提供後勤支援，以沙亦未顯示出美日韓三角關係中日韓「可能被拋棄的恐懼」，而是各自利用美國所提供的資源對抗。沙烏地阿拉伯為維繫其遜尼派宗主國的地位，在沒有美國的出兵支持下在伊拉克、敘利亞、葉門支持境內遜尼派勢力與伊朗什葉派代言勢力對抗；以色列更是早自第五次中東

24. 2018 年下半年，南韓民間掀起抵制日貨運動，拒買任何日本品牌商品；10 月 30 日，南韓大法院（同最高法院）判決支持 4 名在二戰時遭日本殖民政府強行徵用的南韓勞工有權向日本企業索賠；11 月再另判決日本三菱重工須賠償戰時受徵用的 5 名韓籍勞工，引起日本反彈。12 月 20 日，南韓海軍遭日本海上自衛隊雷達鎖定。2019 年轉為貿易戰爭，7 月 4 日安倍政府實施反擊，以查獲南韓非法將部分晶片原料氟化氫間接提供北韓發展化武為由，宣布限制出口晶片原料至南韓，使得依賴南韓半導體原料達 90% 的半導體產業無法正常生產，南韓宣稱將終止兩國於 2016 年所簽「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y Information Agreement, GSOMIA)」，引起美國關切。

25. 曹恩娥認為唯有南韓民意對日本殖民歷史有諒解的共識，且日本不再作出挑釁南韓民族情緒的作為，兩國關係才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2022 年 3 月，尹錫悅在總統競選期間作出與日本發展新關係的政見，但同一時間，日本卻修改教科書將「獨島(Dokdo)」列為日本領土，並減少朝鮮殖民時代「強徵勞工」、「性奴隸」用語，讓尹錫悅當選總統後難以說服國內民意與日本和解。



戰爭後，獨自面對來自黎巴嫩真主黨、敘利亞和哈瑪斯組織的攻擊迄今，不受美國的牽制實施反擊，以遏止其作大；美國則是以無人機對伊朗支持的恐怖組織或代言勢力進行「精準攻擊」，2020年1月3日，伊朗革命衛隊聖城旅司令蘇雷曼尼在巴格達機場遭無人機攻擊死亡；同年11月29日，伊朗首席核武專家法克薩德（Moshen Fakhrizadeh）在德黑蘭附近城鎮遭汽車炸彈攻擊致死；2022年7月31日，蓋達組織首領查瓦西里（Ayman al-Zawahiri）在喀布爾遭美國無人機攻擊死亡等事件顯示，美以沙這組三角關係對共同威脅的攻擊有自主性，不受盟國的制約。

三、以沙與日韓未結盟的原因不同

以沙是在中東戰爭時期是因為宗教與理念因素無法結成同盟，甚至是敵對關係，因為1979年伊朗宗教革命，美國失去伊朗後，成為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兩大支柱，2010年末「阿拉伯之春」所產生的伊朗勢力擴張，擴大了兩國合作的空間，綜理前面章節，兩國未來能否走向準同盟/同盟，除了美國的推動是必要因素外，與阿拉伯國家發展關係是符合以色列國家利益，變數較大的是沙國的因素，薩爾曼王子能否順利繼任？沙國內部改革能否成功？巴勒斯坦問題能否取得妥協？在現今趨勢不變下，以沙正朝準同盟/同盟的方向前進。

相較之下，日韓兩國仍陷在歷史因素及美國所營造的安全責任轉嫁環境，而無法走入正式同盟的道路。



第六章 結論



在 2009 年至 2020 年間，中東地區地緣政治發生了基本改變，「阿拉伯之春」將中東地區帶入另一個後冷戰階段，伊朗及其在中東地區的代言勢力成為美國、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的共同威脅。在歐巴馬宣布「重返亞洲」與川普沿續提出「印太戰略」，將美國的戰略重心自中東移出原則不變下，原本敵對關係的沙烏地阿拉伯和以色列正朝準同盟/同盟關係，未來不排除依循「亞伯拉罕協定」的精神，跟隨其他阿拉伯國家建交，共同對抗伊朗。

第一節 主要發現

本論文主要在探討美以沙三邊戰略關係的形成。針對此命題，本文先於第一章提出所四個研究問題，包括：

- (一) 作為影響以沙兩國關係演變的關鍵性因素，歐川時期美國中東政策的變遷為何？伊朗因素的變遷為何？
- (二) 以色列和沙烏地阿拉伯針對美國中東政策變遷以及針對彼此及其他因素（巴勒斯坦及沙國國內因素）有哪些具體政策反應。
- (三) 以色列和沙烏地阿拉伯會朝準同盟關係/同盟關係，抑或朝建交之路前進？
- (四) 美以沙三國是否會形成如美國在東亞和日韓形成的三邊戰略同盟關係？兩組關係有何異同？相關的理論觀點能否運用到美以沙三角關係？

由於美國是中東區域議題的主導者，伊朗因素牽動著美以沙關係的發展，本文以美國的中東政策變遷與伊朗政策變化為自變項，以沙兩國對美伊政策的反應及對彼此外交政策的演變及兩國關係的發展為依變項。以此為基礎於第二章梳理戰



後美國中東政策的脈絡與伊朗的政策變化；第三章探討以色列對美國的中東政策反應及以沙關係；第四章探討沙烏地阿拉伯對美國的中東政策回應、內部的變革與挑戰、沙以關係及巴勒斯坦因素對以沙發展關係的影響；阿拉伯國家、美國與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建國態度。

繼於第五章分析車維德理論能否應用解釋美以沙三邊戰略關係，及其與美日韓三角關係的比較。這四個研究問題均在本文前幾個章節獲得充分的討論及驗證，本節將簡述以下幾個發現成果。

壹、針對第一個問題研究發現

歐川時期，美國的中東政策本於國家利益，以「維持區域穩定」為主，但此利益卻是矛盾且相互依存，既需支持獨裁本質的中東盟邦，卻又要求他們推動民主，折衷成為協助控制力不佳的盟邦統治者（皇室）強化內部控制。

歐巴馬時期以「縮減對外駐軍」、「提供中東國家政治協助」為政策主軸，輔之以緊縮外交政策，要求當地盟國擔負更多責任，堅拒出兵處理中東問題。在以巴議題上，力促雙方走向談判桌以實現「兩國方案」，面對以色列陽奉陰違式的回應，歐氏憤而在任期結束前於安理會以投棄權票讓聯合國首次通過譴責以色列的屯墾行為。2010 年末肇始的「阿拉伯之春」，歐巴馬放任盟邦政權垮台及恐怖組織的興起，加深了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在內其他中東盟邦的疑慮，而尋求與包括以色列、中國、俄羅斯等國結盟，以保障國家利益。2015 年 7 月所簽訂的伊朗「核協議」是歐巴馬任期少數獲讚譽的中東政策成就。



川普沿續歐巴馬政策將軍力撤出中東，但在以巴議題上對以色列「一面倒」政策，退出伊朗「核協議」改以實施高壓經濟制裁卻未見效；在反恐上，增派軍隊進駐敘利亞和伊拉克，以防堵伊朗。基於石油利益及區域安全軍售沙烏地，包庇沙國皇室在「哈紹吉事件」的作為，讓美沙關係維持不墜。

伊朗本質上是個「部落國家」，部落觀念凌駕於王權之上，對父權是絕對尊崇，所以政教合一的本質自古就有，無法施行純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巴勒維時代的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是美國在 1956 年之後維持中東區域和平的兩大支柱，美國並協助伊朗建立核武，至 1979 年革命，巴勒維垮台，宗教勢力回歸主導伊朗，中東政局產生改變，以色列取代伊朗，與沙烏地阿拉伯成為美國維護中東區域和平的支柱。

宗教革命後的伊朗對外輸出革命，透過提供瀕危國家及國家機器無法治理的地方財政與軍事援助，成功在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葉門製造代言勢力，擴張什葉派版圖，結合原有美國扶植的核武技術，成為現今中東地區的主要威脅。

貳、針對第二個研究問題發現

一、以色列針對歐川時期中東政策的回應：

- (一) 尋求加強與阿拉伯及其他國家合作「反恐」：針對歐巴馬一系列撤出中東的作為、在「阿拉伯之春」放棄埃及，未將中東區域體系導入有利美國的權力平衡體系，讓恐怖組織進駐填補中東補權力真空，讓以「反恐」擅長的以色列藉此發展與約旦、埃及等阿拉伯國家及俄羅斯合作打擊恐怖組織。
- (二) 在以巴問題堅持屯墾行為，無意推動「兩國方案」，到川普時期，更是利用其「一面倒」政策，擴大在約旦河西岸的屯墾行為，意圖讓其成為既定事實。



實，使得以巴問題成為不對稱的天平，進而無解。

(三) 贊責歐巴馬與伊朗簽署「核協議」，對川普退出表示歡迎。

二、沙烏地阿拉伯對歐川時期中東政策的回應

(一) 尋求與美國以外的強權建立關係，以避免被恐怖主義與伊朗侵蝕，在薩爾曼王子進入權力核心後，尋求與受伊朗相同程度敵意及國安威脅的以色列合作，雖另持續尋求與中國、俄羅斯等強權國家合作，但因為該等國家與伊朗沒有直接利益衝突，甚至存在合作關係，目前尚無法取代美國的地位。

(二) 對美國處理以巴問題的態度沒有強烈反應，薩爾曼王子甚至對巴勒斯坦領導階層過去幾十年拒絕所有與以色列的和談方案感到厭倦，但為維持其遜尼派宗主國地位，仍對外強調惟有「巴勒斯坦問題」獲得解決才會與以色列有進一步發展關係的可能。

(三) 贊責歐巴馬與伊朗簽署「核協議」，對川普退出表示歡迎。

(四) 對川普袒護「哈紹吉事件」選擇配合美國維持石油價格穩定政策，與美國維持良好關係。

三、巴勒斯坦因素在中東問題的影響

巴勒斯坦一直是阿拉伯國家的棋子，從第一次至第四次中東戰爭，埃及、約旦等阿拉伯國家以「支持巴勒斯坦建國」為口號，實則以其為實現國家利益的工具。沙烏地阿拉伯則曾是支持巴勒斯坦建國態度最強烈的國家，在歷次中東戰爭中無條件提供巴勒斯坦財政、經濟援助，但到薩爾曼王子掌握實權後，基於對伊朗威脅的感受且對巴勒斯坦屢屢拒絕接受國際社會所提出的以巴和平方案感到厭倦，而在 2022 年 3 月公開表示以色列已非敵人，而是潛在的同盟，使得巴勒斯坦在以沙發展關係的障礙比重已逐漸下降。



在以巴問題上，國際的天平一直自象徵中東進入後冷戰時期的「阿拉伯之春」後向以色列方向傾斜且見不到拉回的跡象，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建交及以色列內部右派勢力長期執政，對巴勒斯坦朝向「沒有兩國方案」、「不允許巴勒斯坦建國」、「不與巴勒斯坦談判」、「不停止屯墾行為」、「不承認巴勒斯坦在東耶路撒冷的主權」、「不允許巴勒斯坦難民返回原居地」的「六不」政策，即使有美國的調停，但短期內以巴問題仍屬無解。

四、沙國國內因素對美以沙三邊戰略關係發展影響

學者多不看好薩爾曼王子「願景 2030」改革，普遍對「沙國內部真實發展」存疑，薩爾曼王子宣稱進行婦權改革，卻持續鎮壓異議人士。谷戰斯基指「願景 2030」將國家體制由「集體領導」改為「定薩爾曼王子為一尊」，恣意逮捕反對者，使國內資產階級者被迫出逃，且「願景 2030」所採取的財政改革未如預期，年輕人的繼續支持成為薩爾曼王子維持執政合法與否之關鍵。韓德森稱「願景 2030」華而不實，沙國政府所宣稱的重大革新成果難以查證。所以薩爾曼王子日後能否平穩繼任國王，成為美以沙三邊戰略關係形成與否的關鍵因素。

參、針對第三個研究問題的研究發現

學術界對於以沙未來走向看法分歧，認為兩國未來會走向建交者認為需要有美國的積極介入，巴勒斯坦問題能獲得解決、兩國對伊朗威脅有共識才能成立。但持以沙兩國無法進一步發展關係觀點的學者（如法魯克）認為，以沙建交並不能帶給中東和平、也不必然會促進美國在中東的利益、不會帶給沙國民主與現代化、美沙關係亦不會因此改善。但整體來看，以沙國內因素及美國的主導，才是兩國未來走向準同盟/同盟，抑或是建交的關鍵因素。對以色列而言，與沙國建交一直是其



政府推動的方向，巴勒斯坦不是障礙；對美國而言，以沙建交有利其將以色列納入中國東共同防禦體系的戰略目標，讓以阿共存，共同對抗伊朗；對沙國而言，受限於沙國身為遜尼派宗主國且現任薩爾曼國王仍堅持「阿拉伯和平方案」的建交條件及沙國國內民意仍反對下，現階段暫無法與以色列建交。

肆、針對第四個問題的研究發現

一、美以沙三國已朝「三邊戰略關係」趨勢發展，但仍在演變過程中而存在不確定性：

- (一) 美以與美沙的軍事關係性質不同：美以軍事關係是演進而成，至現階段「戰略夥伴關係」層次；美沙則僅及於以石油交換軍售與區域安全利益層次，沙國允許美軍使用其境內的軍事基地，美以軍事關係高於美沙軍事關係。
- (二) 以沙兩國自中東戰爭時期的敵對關係，到法德國王承認以色列的生存權，阿布杜拉王子提出「阿拉伯和平方案」，至薩爾曼王子進入沙國權力核心後開展成為議題式的合作關係：這些「議題」包括對抗伊朗及其代言勢力、恐怖組織，合作範圍跨及軍事情報交換、軍售、部隊訓練、反恐、資安等領域。

二、美以沙三角關係與美國在東亞的美日韓三角關係具比較性

- (一) 日本與南韓是美國於冷戰時期在東北亞防範共產勢力東擴的兩支柱，一如以色列和沙烏地阿拉伯是美國在 1979 年伊朗宗教革命後，維繫中東區域和平的兩支柱，美國是這兩組三角關係的主導者。
- (二) 車維德對冷戰時期美日韓三角關係的假說，對象徵中東進入後冷戰時期的「阿拉伯之春」後的美以沙三角關係具有部分解釋性。



1. 以沙兩國在「阿拉伯之春」後在伊朗、反恐議題上合作，在伊朗「核協議」上，兩國對美國可能降低安全承諾表示譴責，顯示「可能被拋棄的恐懼」，但沙國的恐懼感較以色列強烈，對以色列在此議題上的合作需求大於以色列對沙國的需求。
2. 美以沙在面對伊朗及其代言勢力的共同威脅時，以沙均有獨立對抗而不需要美國直接介入的行為，由此可見，美國並非「不可或缺的」夥伴。相較於此，日韓無論在對抗冷戰時期的蘇聯或是後冷戰時期的中國時，均需要美國的介入才有能力共同對抗，無力單獨應付，美國在這組關係上，是日韓「不可或缺的」盟國。

(三) 以沙與日韓未結盟的原因不同：以沙是在中東戰爭時期因為宗教與理念因素無法結成同盟，甚至是敵對關係，2010 年末「阿拉伯之春」所產生的伊朗勢力擴張，造就了兩國合作的空間，兩國未來能否走向準同盟/同盟關係，抑或是建交？除了美國的推動是必要因素外，變數較大的來自沙國。相較之下，日韓基於歷史、理念因素而無法結盟，到歐川時期，美國將戰略重心移回亞太，強化了對亞太盟國的安全承諾，但日韓卻仍糾結於歷史、理念、價值觀的衝突而無法結盟，時而摩擦、時而熱絡，對後冷戰時期面對共同威脅認知的改變，及日韓政治人物的民族主義情緒煽動下，兩國關係更為疏離。

第二節 美以沙三邊戰略關係的後續觀察

本文論點強調美以沙的三邊戰略關係仍在形塑中，仍有以下幾個待觀察的變項會影響這組三角關係的走向：

一、美國的強力推動：是強化美以沙朝向緊密的三角關係的必要因素。2021 年 1 月拜登總統上任後，極力推動將以色列納入以阿拉伯國家為主的中東防禦體



系內，承襲「亞伯拉罕協定」的精神，透過以色列與更多阿拉伯國家建交的方式，讓以色列積極融入以阿拉伯國家為主的中東地區。

二、以色列融入中東體系：儘管以色列在歷次中東戰爭均完勝，但其人口規模與國土面積終究無法與所有阿拉伯國家長期對抗，與阿拉伯國家交往有利以色列的長期生存，「巴勒斯坦問題」是以阿交往的主要障礙，屯墾問題尤為核心，以色列如何提出足以讓更多阿拉伯國家接受的「巴勒斯坦解決方案」，是其融入中東體系的關鍵。

三、沙烏地阿拉伯政局的穩定：許多研究沙烏地阿拉伯的學者均有一個共同的疑問，就是「沙國內部發展如何？」始終是一個謎 (Henderson, 2021)，對薩爾曼王子所推動的改革及「願景 2030」計畫的成果落實與否，亦持懷疑態度，薩爾曼王子雖有其父親薩爾曼國王的全力支持，本已身兼數職的他在 2022 年 9 月 27 日獲國王進一步任命為沙國總理，但他在國內的地位是否因此穩固，實無從查證，能否順利繼任王位，均關係到美以沙這組三角關係的變化。

四、伊朗勢力的再擴張及核武發展：伊朗是這組三角關係的共同威脅，並已在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葉門成功建立代言勢力，沒有人會質疑其繼續擴張的野心。而在川普宣布片面退出伊朗「核協議」後，伊朗擴大生產核武所需的高純度的濃縮鈾，縮短了生產第一枚核武所需時間，拜登政府能否成功透過「伊朗核問題六國機制」與伊朗簽署新的「核協議」是觀察美以沙三角關係的重點。

五、沙國強化與中國的關係，與伊朗復交及以色列對沙伊復交的反應：2022 年 12 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沙烏地阿拉伯，隱含著沙國政府走出惟美國馬首是瞻的可能，2023 年 3 月 10 日，沙烏地阿拉伯在北京斡旋下宣布與伊朗復交，象徵著中國勢力插旗中東，並在沙伊關係扮演一定角色，也為美以沙三邊戰略關係形成與否埋下伏筆 (Samer & Bozorgmehr, 2023)。

以色列總理納唐雅胡於第一時間獲悉沙伊即將復交的反應是，希望沙國重新思考與伊復交可能的風險，籲請沙國勿忘伊朗在黎巴嫩、葉門、敘利亞、



伊拉克建立代言勢力對中東局勢所造成影響，他強調中東問題有 95%來自伊朗，另外呼籲美國重申對中東的安全承諾 (Iordache, 2023)。本論文作者電郵在以友人，現任以國獨立記者、華府智庫中東問題研究中心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研究員塞爾柏 (Neri Zilber) 觀察表示：以國政府深知伊沙復交複雜性，目前持審慎觀察態度，尚未表達正式立場；但以國輿論初步認為，沙國正在「拉遠」和以色列與美國的關係，卻也避免對是否改變對伊朗政策表示任何立場 (Saudi growing more distant from Israel and the U.S. and hedging toward Iran)，是故以色列的下一步反應亦將影響美以沙三邊戰略關係走向。



參考文獻



第一節 中文資料

壹、專書

李偉成，譚溯澄譯，1996，《國際政治分析架構》，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周丕启譯，2007，《聯盟的起源》，北京大學出版社，譯自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林佑柔譯，2019，《伊朗：被消滅的帝國，被出賣的主權，被低估的革命，被詛咒的石油，以及今日的一伊朗》光·現出版，譯自 William R. Polk *Understanding Iran: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From Person to the Islamic Republic, From Cyrus to Khamenei*

陳立樵著，2018，《以色列史：改變西亞局勢的國家》，三民書局。

彭明輝著，2017，《研究生完全求生手冊》，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梁文傑譯，2018，《中東心臟：沙烏地阿拉伯的人民、宗教、歷史與未來》，八旗文化/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譯自 Karen E. House *On Saudi Arabia: Its People, Past, Religion, Fault Lines and Future*

貳、期刊文章（紙本）

王高成，2018，〈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內涵與影響〉，《展望與探索》，1月 16(1)：1-7。

歐佳盈譯，2019，〈制裁陰影下的美國與伊朗關係—從巴勒維時代到伊朗革命〉，《歐亞研究》第九期，譯自 Zahra Karimi *Iran-US Relations in the Shadow of Sanctions*。



參、期刊文章（網路）

吳安琪，2021，〈美國印太戰略最新發展〉，《中華經濟研究院東協中心》，檢索於2022年8月1日，<https://web.wtocenter.org.tw/Mobile/page.aspx?pid=364161&nid=15483>。

孫德剛、鄧海鵬，2014，〈美國在沙特軍事基地的戰略演變〉，《阿拉伯世界研究》，11月第6期，頁53-59，檢索於2022年10月29日，http://mideast.shisu.edu.cn/_upload/article/9b/4a/fc35f17c4e7da8b5509a269ba132/f5abcd46-5e15-4c50-88c5-c309a2a39588.pdf。

黃學呈・哈賽寧譯，2019，〈沙烏地阿拉伯王國2030願景全文〉，《中東研究通訊》，檢索於2022年10月29日，https://www.luoow.com/dc_tw/200734455。

肆、網路媒體報導

張良任，2020，〈美以關係新展望〉，《中時新聞》：
<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201129003825-262105?chdtv> 11月29日，檢索於2022年10月30日。

梅新育，2016，〈沙特願景2030的雄心與障礙〉，《21世紀經濟報導》：
<https://kknews.cc/zh-tw/news/6425xm.html> 5月5日，檢索於2022年10月30日。

伍、學位論文

黃泓聞，2017，《伊朗對美外交和解政策～魯治尼總統第一任期JCPOA核議為例》，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戰略與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葉苑絨，2020，《歐巴馬與川普政府美、日、韓三邊「準同盟」關係之研究（2009-2019）》，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第二節 外文資料

壹、專書

Cha, Victor D. 1999. *Alignment Despite Antagonism: The United States-Korea-Japan Security Triangle*. New York: Studies Of The Weatherhead East Asian Institute. Columbia University.

貳、期刊論文(紙本)

Abdulhakim, Bin B. 2020. “Security Plans to Address Iran's Dangerous Behavior in the Arabian Gulf.” *Rasanah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Iranian Studies*, April, 11(4): 6-23.

Atherton Jr., L. Alfred. 1984. “Arabs, Israelis-and Americans: a Reconsiderations.” *Foreign Affairs*, 62(5) Summer: 1194-1209.

Bani Nasur, Nader Ibrahim M., Abdulrahman A. Al-Fawwaz & Ahmad Kh. Al-Afif. 2012, “Jordanian Foreign Policy toward The Palestine Issue.” *British Journal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 8(1) January: 1-16.

Byman, Daniel. 2015. “Beyond Counterterrorism: Washington Needs a Real Middle East Policy.” *Foreign Affairs*, 94(6) November/December: 11-18.

Cook, Steven A. 2016. “Egypt's Nightmare: Sisi's Dangerous War on Terror.” *Foreign Affairs* 95(6) November/December: 110-120.

Danin, Robert M. 2016. “Israel Among the Nations- How to Make the Most of Uncertain Times.” *Foreign Affairs*, 95(4) July/August: 28-36.

Dekel, Udi & Yoel Guzansky. 2013. “Israel and Saudi Arab: Is the Enemy of My Enemy My Friend?” *INSS Insight*, No. 500 December 22: 1-4.

Gause III F. Gregory. 2016. “The Future of U.S.-Saudi Relations~ The Kingdom and the



- Power” *Foreign Affairs*, 95(4) July/August: 114-126.
- Ghanem, As’ad. 2016. “Israel’s Second-Class Citizens~ Arabs in Israel and the Struggle for Equal Rights.” *Foreign Affairs*, 95(4) July/August: 37-42
- Guzansky, Yoel. 2018. “The Saudi Revolution.” *INSS Insight*, April 22, 1045: 1-4.
- Guzansky, Yoel. 2020. “Saudi Arabia and Normalization with Israel.” *INSS Insight*, October 29, 1396: 1-5.
- Indyk, Martin. 2021. “Order Before Peace- Kissinger’s Middle East Diplomacy and Its Lessons for Today” *Foreign Affairs*, 100(6) November/December: 153-165.
- Jervis, David. 2017. “Obama and The Middle East.” *Teka Kom, Politol. Stos Międzynar.-OL PAN*, 12(2): 31-57.
- Karlin, Mara & Tamara C. Wittes. 2019. “America’s Middle East Purgatory: The Case for Doing Less.” *Foreign Affairs*, 98(1) January/February: 89-100.
- Kuperman, Alan J. 2015. “Obama’s Libya Debacle~ How a Well-Meaning Intervention Ended in Failure.” *Foreign Affairs*, 94(2) March/April: 66-77.
- Lesau, Ohad. 2006. “The New Middle Ea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ld Middle East” *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0(3), September: 46-62
- Lynch, Marc. 2015. “Obama and the Middle East: Rightsizing the U.S. Role.” *Foreign Affairs*, 94(5) September/October: 18-27.
- Lynch, Marc. 2018. “The New Arab Order~ Power and Violence in Today's Middle East.” *Foreign Affairs*, 97(5) September/October: 116-126.
- Lynch, Marc. 2021. “The Arab Uprisings Never Ended~ The Enduring Struggle to Remake the Middle East.” *Foreign Affairs*, 100(1), January/February: 111-122.
- Nasur, Ibrahim M. Bani & Avdulrahman Al-Fawwaz & Al-Afif. 2012. “Jordanian Foreign Policy toward The Palestine Issue.” *British Journal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8(1) January: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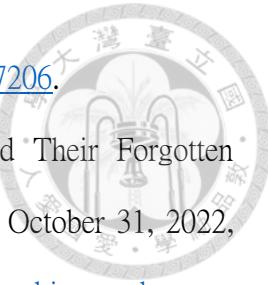


- Nonneman, Gerd. 2019. “Determinants and Patterns of Saudi Foreign Policy: ‘Omnibalancing’ and ‘Relative Autonomy’ in Multiple Environments.” March 27, *Academia*: 315-351.
- Pollack, Kenneth M. 2016. “Fight or Flight: America’s Choice in the Middle East.” *Foreign Affairs* 95(2), March/April: 62-75.
- Rice, Condoleezza. 2008. “Rethink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American Realism for a New World.” *Foreign Affairs*, 87(4) July/August: 2-14, 16-26.
- Sayegh, Fayez A. 1979. “The Camp David Agreement and the Palestine Problem.”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8(2), Winter: 3-40
- Schueftan, Dan. 2021.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f the Arab-Israel Conflict?”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on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Assessment, INSS* 24(4), November: 3-22.
- Ulrichsen, Kristian C. 2016. “Israel and the Arab Gulf States: Drivers and Directions of Change.” *Center for the Middle East, Rice University's Baker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September: 2-14.
- Ulrichsen, Kristian C. 2018. “Palestinians Sidelined in Saudi-Emirati Rapprochement with Israel.”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47(4) Summer: 79-89.

參、期刊文章(網路)

Adamczyk, Wojciech. 2022. “China’s role in Afghanistan after the US withdrawal.” *Warsaw Institute Foundation*, June 14, accessed October 31, 2022, <https://warsawinstitute.org/chinas-role-afghanistan-us-withdrawal/>.

Al-Atrash, Samer & Najmeh Bozorgmehr. 2023. “Saudi Arabia and Iran to Restore diplomatic ties after seven-year rift.” *Financial Times*, March 11, accessed March 16,



2023, <https://www.ft.com/content/62bdd6d6-4fd0-4df6-9fcc-2be528ab7206>.

Al-Rasheed, Madawi. 2016. “Saudi Arabia's Modern Islamists: And Their Forgotten Campaign for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February 16, accessed October 31, 202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saudi-arabia/2016-02-16/saudi-arabias-modern-islamists>.

Al-Rasheed, Madawi. 2020. “How Mohammed bin Salman is quietly enabling an Israeli axis in the Arab World.” *Middle East Eye*, October 18, accessed October 29, 2022, <https://www.middleeasteye.net/opinion/saudi-arabia-mohammed-bin-salman-quietly-enabling-israel-axis-arab-world>.

Al-Sulami Mohammed. 2022. “Yemen's role in Iran's strategic plan.” *Arab News*, January 24, accessed October 29, 2022, <https://www.arabnews.com/node/2011016>.

Amadeo, Kimberley. 2021. “US Shale Oil Boom and Bust.” *The Balance*, November 24, accessed June 6, 2023, <https://www.thebalancemoney.com/us-shale-oil-boom-and-bust-3305553>.

Beck, Martin. 2019. “Israel and the Arab Gulf: An Israel-Saudi Alliance in the Making.” *Center for Modern Middle East and Muslim Studie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Denmark*, November 8, accessed October 31, 2022, <https://www.e-ir.info/2019/11/08/israel-and-the-arab-gulf-an-israeli-saudi-alliance-in-the-making/>.

Booth, William & Ruth Eglash. 2015. “Israeli leaders condemn Iran deal, ‘one of the darkest days in world history’ .”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14, accessed October 29, 202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israel-blasts-iran-deal-as-dark-day-in-history/2015/07/14/feba23ae-0018-403f-82f3-3cd54e87a23b_story.html.

Borger, Julian. 2016. “Obama administration offered \$115bn in weapons to Saudi Arabia: Report.” *The Guardian*, September 8, accessed October 29, 2022,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6/sep/08/obama-administration-offered-115->



[billion-weapons-saudi-arabia-report.](#)

Bowman, Michael. 2019. “US Senators Blast White House Over Khashoggi Investigation.” *Voice of America*, March 5, accessed October 29, 2022, <https://www.voanews.com/amp/us-senators-blast-white-house-over-jamal-khashoggi-investigation/4813627.html>.

Burr, William. 2009. “U.S.-Iran Nuclear Negotiations in 1970s Featured Shah’s Nationalism and U.S. Weapons Worries.” *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January 13, accessed October 30, 2022, <https://nsarchive2.gwu.edu/nukevault/ebb268/>.

Collinson, Stephen. 2015. “Obama ties legacy to Iran nuclear deal.” *CNN*, April, accessed October 30, 2022, <https://edition.cnn.com/2015/04/02/politics/iran-nuclear-deal-obama-legacy/index.html>.

Crowley, Michael, Falih Hassan & Eric Schmitt. 2020. “U.S. Strike in Iraq Kills Qassim Suleimani, Commander of Iranina Forces.”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 2020, accessed October 29, 2022, <https://www.nytimes.com/2020/01/02/world/middleeast/qassem-soleimani-iraq-iran-attack.html>.

Davenport, Kelsey. 2017. “Sarin Attack Prompts U.S. Strikes.” *Arms Control Today*, May, accessed October 30, 2022, <https://www.armscontrol.org/act/2017/05/news/sarin/attack/prompts-us-strike>.

Dekel, Udi & Yoel Guzansky. 2013. “Israel and Saudi Arabia: Is the Enemy of My Enemy My Friend?” *INSS Insight No. 500*, December 23, accessed October 30, 2022. <https://www.inss.org.il/publication/israel-and-saudi-arabia-is-the-enemy-of-my-enemy-my-friend/>.

Dorell, Oren. 2016. “U.S. \$38B military aid package to Israel sends a message.” *USA TODAY*, September 14, accessed March 18, 2023,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world/2016/09/14/united-states-military-aid-israel/90358564/>

Elgindy, Khaled. 2016. “Obama’s Record on Israel-Palestinian Peace: The President’s Disquieting Silence.”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5, accessed October 31, 202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israel/2016-10-05/obamas-record-israeli-palestinian-peace>.

England, Andrew & Camilla Hodgson. 2021. “Saudi Arabis’s grandiose climate plans struggle to take off.” *Financial Times*, August 30, accessed October 31, 2022, <https://www.ft.com/content/07a6e392-5716-44c0-a6bd-d6f7ea474e5e>.

Ernst, Jonathan. 2018. “U.S.-Saudi Arabia Relation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December 7, accessed October 31, 2022,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us-saudi-arabia-relations?amp>.

Farouk, Yasmine. 2020. “What Would Happen If Israel and Saudi Arabia Established Official Relations?”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October 15, accessed October 31, 2022,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0/10/15/what-would-happen-if-israel-and-saudi-arabia-established-official-relations-pub-82964>.

Farouk, Yasmine & Andrew Leber. 2022. “America and Saudi Arabia Are Stuck With Each Other.” *Foreign Affairs*, April 1, accessed October 30, 202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persian-gulf/2022-04-01/america-and-saudi-arabia-are-stuck-each-other>.

Ferziger, Jonathan & Peter Waldman. 2017. “How Do Israel’s Tech Firms Do Business in Saudi Arabia? Very Quietly.” *Bloomberg Businessweek*, February 2, accessed October 29, 2022,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features/2017-02-02/how-do-israel-s-tech-firms-do-business-in-saudi-arabia-very-quietly>.

Guzansky, Yoel & Sigurd Neubauer. 2014. “Israel and Saudi Arabia: A Changing Region,



a Possible Partnership?”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ly 24, accessed October 31, 2022,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israel-saudi-arabia-changing-region-possible-partnership-10940>.

Guzansky, Yoel & Ron Tira. 2016. “How Iran's Strategic Drift Emboldens Its Enemies~ Tehran's military means and political ends are out of sync.” *The National Interest*, April 6, accessed October 31, 2022,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how-irans-strategic-drift-emboldens-its-enemies-156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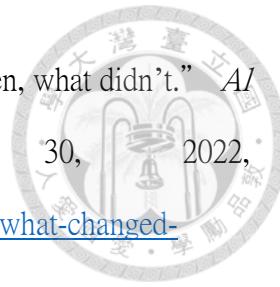
Guzansky, Yoel & Sigurd Neubauer. 2017. “Why Trump Will Disappoint the Saudis~ This is not the Reset They're Looking For.” *Foreign Affairs*, May 10, accessed October 31, 202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saudi-arabia/2017-05-10/why-trump-will-disappoint-saudis>.

Guzansky, Yoel. 2016. “Challenges Confronting Saudi Arabia.”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131-140, accessed October 31, 2022, <https://www.inss.org.il/wp-content/uploads/2017/01/11.pdf>.

Guzansky, Yoel & Zaqary A. Marshall. 2020. “The Abraham Accords: Immediate Significance and Long-Term Implications.” *Israel Journal of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30, 14(3):379-389, accessed October 31, 2022, <https://www.inss.org.il/publication/the-abraham-accords-immediate-significance-and-long-term-implications/>.

Guzansky, Yoel. 2022. “Saudi Arabia and Israel: Normalization at a Snail's Pace.” *INSS Insight No.1633*, August 15, accessed October 30, 2022, <https://www.inss.org.il/publication/saudi-arabia-israel/>.

Habibi, Nader. 2019. “Implementing Saudi Arabis Vision 2030 : An Interim Balance Sheet.” *Middle East Brief, Crown Center for Middle East Studies, Brandeis University*, April, accessed October 30, 2022, https://www.brandeis.edu/_crown/publications/middle-east-briefs/pdfs/101-200/meb127.pdf.



Harb, Ali. 2022. “Israel-Palestine US policy: What changed under Biden, what didn’t.” *Al Jazeera*, July 12, accessed October 30, 2022,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2/7/12/israel-palestine-us-policy-what-changed-under-biden-what-didnt>.

Hassan, Muhammad Abbas & Arhamma Siddiqa & Asad Ullah Khan. 2019. “Saudi-Israel: Nexus Implications for Iran.” *The Center for Iranian Studies in Ankara*, May 17, accessed October 30, 2022, https://iramcenter.org/en/saudi-israeli-nexus-implications-for-iran/?send_cookie_permissions=OK.

Hayman, Tamir & Yoel Guzansky. 2022. “The Arab World amidst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SS Special Publication*, June 13, accessed October 30, 2022, <https://www.inss.org.il/publication/arab-states/>.

Henderson, Simon. 2021. “Saudi Arabia: What has Changed, What Hasn’t.” *Policy Analysis,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October 13, accessed October 30, 2022,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saudi-arabia-what-has-changed-what-hasnt>.

Iordache, Ruxandra. 2023. “Israel PM cautions Saudi Arabia about Iran after China-brokered deal, urges greater U.S. presence.” *CNBC*, April 19, accessed April 24, 2023, <https://www.cnbc.com/2023/04/19/benjamin-netanyahu-israel-cautions-saudi-about-iran-after-china-deal.html>.

Jo, Eun A. 2022. “Japan and South Korea Are Still Haunted by the Past.”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 23, accessed November 30, 202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japan/japan-and-south-korea-are-still-haunted-past>.

Kaye, Dalia Dassa, Alireza Nader & Parisa Roshan 2011. “Israel and Iran: A Dangerous Rivalry.” *RAND Corporation*: 9-18, accessed October 30, 2022, <https://www.jstor.org/stable/pdf/10.7249/mg1143osd.7.pdf?refreqid=excelsior%3A40ebe2>



[dde168f0574723811e666dbe2a&ab_segments=&origin=&acceptTC=1](https://d168f0574723811e666dbe2a&ab_segments=&origin=&acceptTC=1).

Kirkpatrick, David D. 2017. “Saudi Crown Prince’s Mass Purge Upends a Longstanding System”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5, accessed October 30, 2022, https://www.nytimes.com/2017/11/05/world/middleeast/saudi-crown-prince-purge.html?_ga=2.22665275.1633178408.1682291023-1929208489.1682291023.

Klieman, Aharon & Yoel Guzansky. 2016. “Reading Trump’s Middle East Policy~ Could Retrenchment Trigger a Realignment?”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 17, accessed October 30, 202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16-11-17/reading-trumps-middle-east-policy>.

Kruzman, Charles. 2013. “Death Tolls of the Iran-Iraq War.”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October 31, accessed October 30, 2022, <https://kurzman.unc.edu/death-tolls-of-the-iran-iraq-war/>.

Kuttab, Daoud. 1994. “The New Middle East by Shimon Peres.” *Palestine-Israel Journal of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1(2), accessed October 30, 2022, <https://pij.org/articles/755/the-new-middle-east-by-shimon-peres>.

Lim, Kevjn. 2020. “Iran’s Eurasian Wager.” *Policy Analysis,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April 27, accessed October 30, 2022,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irans-eurasian-wager>.

Lipner, Shalom. 2017. “U.S. abstention on Israeli settlements resolution: Neither sensible nor productive” *Brookings*, January 7, accessed October 30, 2022,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markaz/2017/01/03/u-s-abstention-on-israeli-settlements-resolution-neither-sensible-nor-productive/>.

Loft, Philip. 2022. “Iran’s influence in the Middle East.” *House of Commons Library*, August 25, 9504: 9, accessed October 29, 2022, <https://commonslibrary.parliament.uk/research-briefings/cbp-9504/>.



Mandour, Maged. 2018. "Egypt's Evolving Alliance with Israel."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arch 20, accessed October 30, 2022,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sada/75840>.

McGurk, Brett. 2020. "The Cost of an Incoherent Foreign Policy: Trump's Iran Imbroglio Undermines U.S. Priorities Everywhere Else."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22, accessed October 30, 202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iran/2020-01-22/cost-incoherent-foreign-polic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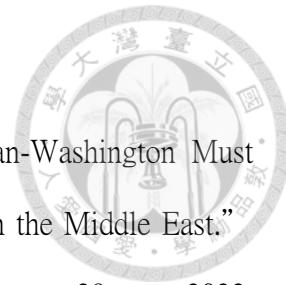
McKernan, Bethan. 2022. "Israel and Saudi Arabia 'in talks over joint defence against Iran'." *The Guardian*, June 27, accessed October 30, 2022,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2/jun/27/israel-and-saudi-arabia-in-talks-over-joint-defence-against-iran>.

McMaster H.R., David Adesnik & Behnam Ben Taleblu. 2019. "Bruning Bridge: The Iranian Land Corridor to the Mediterranean." *Foundation of Democracies, Washington D.C.*: June 18, accessed October 30, 2022, <https://www.fdd.org/wp-content/uploads/2019/06/fdd-report-burning-bridge.pdf>.

Miller, Roy. 2017. "Saudi Arabia's Security Alliances- Can Riyadh Dominate the Middle East?"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23, accessed October 30, 202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saudi-arabia/2017-10-23/saudi-arabias-security-alliances>.

Mitnick, Joshua. 2015. "Netanyahu Calls Iran Deal 'Historic Mistake' . "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14, accessed October 29, 2022, <https://www.wsj.com/articles/netanyahu-calls-iran-deal-historic-mistake-1436866617?tesla=y>.

Nasr, Vali. 2020. "The Only Way Out of the Middle East Is Through It~ Patient Engagement Will Finally Allow the United States to Withdraw." *Foreign Affairs*, August 26, accessed October 30, 202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middle-east/2020-08-26/only>.



[way-out-middle-east-through-it.](#)

Nasr, Vali. 2021. “Biden's Narrow Window of Opportunity on Iran-Washington Must Quickly Resurrect the Nuclear Deal- or Risk a Full-Blown Crisis in the Middle East.” *Foreign Affairs*, March 2, accessed October 29, 202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print/node/1127226>.

Nuruzzaman, Mohammed. 2018. “Saudi Arabia's ‘Vision 2030’ : Will It Save or Sink the Middle East?” *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uly 10, accessed October 31, 2022,
<https://www.e-ir.info/2018/07/10/saudi-arabias-vision-2030-will-it-save-or-sink-the-middle-east/>.

Oron, Israela. 2018. “The Palestinian Refugees: Facts, Figures, and Significance.” *INSS Insight No.1018*, February 18, accessed October 30, 2022,
<https://www.inss.org.il/publication/palestinian-refugees-facts-figures-significance/>.

Perper, Rosie. 2018. “Saudi Arabia's Crown Prince reportedly said Palestinians should accept peace or 'shut up and stop complaining'.” *Business Insider*, April 30, 2018, accessed October 31, 2022,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saudi-crown-prince-told-palestinians-to-shut-up-and-stop-complaining-2018-4>.

Rabinovich, Itamar. 2019. “How Iran's regional ambitions have developed since 1979.” *Brookings*, January 24, accessed October 30, 2022,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9/01/24/%20how-irans-regional-ambitions-have-developed-since-1979/>.

Ramos, Natalia Torregrosa. 2023. “Vision 2030 in Saudi Arabia.” *Instituto Español de Estudios Estratégicos*, March 29, accessed April 5, 2023,
https://ieee.es/en/Galerias/fichero/docs_analisis/2023/DIEEEA24_2023_NATTOR_Arabia_ENG.pdf.

Riedel, Bruce. 2016a. “Mr. Obama goes to Riyadh: Why the United States and Saudi Arabia



still need each other.” *Brookings*, April 14, accessed October 29, 2022,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markaz/2016/04/14/mr-obama-goes-to-riyadh-why-the-united-states-and-saudi-arabia-still-need-each-other/>.

Riedel, Bruce. 2016b. “What the Iran deal has meant for Saudi Arabia and regional tensions.” *Brookings*, July 13, accessed October 31, 2022,
www.brookings.edu/blog/markaz/2016/07/13/what-the-iran-deal-has-meant-for-Saudi-Arabia-and-regional-tensions/amp.

Riedel, Bruce. 2022. “How to understand Israel and Saudi Arabia’s secretive relationship?” *Foreign Policy, Center for Middle East Policy Strobe Talbott Center for Security, Strategy and Technology*, *Brookings*, July 11, accessed October 31, 2022,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22/07/11/how-to-understand-israel-and-saudi-arabias-secrective-relationship/amp/>.

Robinson, Kali. 2022. “What Is U.S. Policy on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July 20, accessed October 29, 2022,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what-us-policy-israeli-palestinian-conflict>.

Rumley, Grant & Mor Yahalom. 2016. “Palestine's Democratic Deficit~ Why Fatah Won't Hold Elections.”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12, accessed October 29, 202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palestinian-authority/2016-10-12/palestines-democratic-deficit>.

Sachs, Natan & Tamara C. Wittes. 2020. “Saudi-Israeli relations: The curious case of a NEOM meeting denied.”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November 25, accessed on October 29, 2022,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20/11/25/saudi-israeli-relations-the-curious-case-of-a-neom-meeting-denied/>.

Schifrin, Nick. 2022. “Top Saudi diplomat discusses U.S. relations, human rights, oil production, Iran and Israel.” *PBS News Weekend*, July 15, accessed October 29, 2022,



<https://www.pbs.org/newshour/amp/show/top-saudi-diplomat-discusses-u-s-relations-human-rights-oil-production-iran-and-israel>.

Schueftan, Dan. 2017. “Israel’s Regional Alliances: Strategic Relations with Saudi Arabia and the Gulf Stat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on National Security, Begin-Sadat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accessed October 29, 2022, <https://www.jstor.org/stable/pdf/resrep04754.16.pdf>.

Sharnoff, Michael. 2021. “Nasser and the Palestinians.” *Middle East Quarterly*, Summer, 1-13, accessed October 31, 2022, <https://www.meforum.org/62399/nasser-and-the-palestinians>.

Sharp, Jeremy M. 2023. “U.S. Foreign Aid to Israel.”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March 1, accessed June 6, 2023, <https://sgp.fas.org/crs/mideast/RL33222.pdf>.

Shikaki, Kalil. 2020. “Do Palestinians Still Support the Two-State Solution? ~ Why Israeli Settlements Are the Greatest Obstacle to Peace.”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12, accessed October 29, 202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middle-east/2018-09-12/do-palestinians-still-support-two-state-solution>.

Shine, Sima. 2021. “Iran towards 2021-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e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accessed October 29, 2022, https://www.inss.org.il/wp-content/uploads/2021/02/IranMonograph_e-11-16.pdf.

Sisci, Grancesco & Lorenzo Prezzi. 2020. “A new Role for Israel in the Middle East?” *Settimana News*, November 19, accessed October 30, 2022, <https://www.settimananews.it/informazione-internazionale/a-new-role-for-israel-in-the-middle-east/>.

Staff, Toi. 2018. “Palestinians must make peace or shut up, Saudi crown prince said to tell US Jews.” *The Times of Israel*, April 29, accessed October 29, 2022,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palestinians-must-make-peace-or-shut-up-saudi-crown->



[prince-said-to-tell-us-jews/](#)

Tabrizi, Aniseh Bassiri. 2016. “The ‘Oil War’ between Iran and Saudi Arabia.” *RUSI*, February 16, accessed October 30, 2022, <https://www.rusi.org/explore-our-research/publications/commentary/oil/war-between-iran-and-saudi-arabia>.

Tomé, Rosario S. 2020. “Saudi Arabia and the dilemma of normalising relations with Israel.” *Atalayar*, December 26, accessed October 30, 2022, <https://atalayar.com/en/content/saudi-arabia-and-dilemma-normalising-relations-israel>.

Toosi, Nahal. 2015. “Camp David: No breakthroughs.” *Politico*, May 14, accessed March 18, 2023, <https://www.politico.com/story/2015/05/camp-david-arab-leaders-no-security-agreement-117980>.

Wehling, Fred. 1999. “Russian Nuclear and Missile Exports to Iran.” *The nonproliferation Review*, Winter, accessed June 6, 2023, <https://www.nonproliferation.org/wp-content/uploads/npr/wehl62.pdf>.

Wintour, Patrick. 2023. “Iran and Saudi Arabia agree to restore ties after China-brokered talks.” *The Guardian*, March 10, accessed April 9, 2023, <https://amp.theguardian.com/world/2023/mar/10/iran-saudi-arabia-agree-restore-ties-china-talks>.

Yaalon, Mosha. 2016. “How to Build Middle East Peace- Why Bottom-Up Is Better Than Top-Down” *Foreign Affairs*, December 12, accessed October 29, 202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israel/2016-12-12/how-build-middle-east-peace>.

Yadlin, Amos & Assaf Orion. 2022. “Israel’s New Strategy~ Why a Post American Middle East Means a Greater Role in Regional Security.” *Foreign Affairs*, February 18, accessed March 18, 2023,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middle-east/2022-02-18/israels-new-strategy>.

Youssef, Hesham 2022. “The Israel-Palestinian Conflict: The Danger of 'No Solution'



Messaging- The Six 'No's' That Are Cementing a One-State Outcome and Perpetual Conflict.”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February 17, accessed October 29, 2022, <https://www.usip.org/publications/2022/02/israel-palestinian-conflict-danger-no-solution-messaging>.

Zanotti, Jim. 2022. “Israel: Background and U.S. Relation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1-52, updated July 1, accessed October 30, 2022,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L/RL33476>.

Zilber, Neri. 2019. “Gulf Cyber Cooperation with Israel: Balancing Threats and Rights.”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January 17, accessed October 31, 2022,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gulf-cyber-cooperation-israel-balancing-threats-and-rights>.

Zunes, Stephen. 2018. “Trump’s Middle East Policy: The Ironies of Hawkishness.” *Al Jazeera Center for Studies*: 2-10, March 8, accessed October 29, 2022, <https://studies.aljazeera.net/ar/node/1572>.

肆、網路資源 (Websites, Blogs, Social Networks, and

Discussion Groups)

Al Jazeera. “Mike Pompeo speech: What are the 12 demands given to Iran?” *Al Jazeera*, May 21, 2018, accessed October 29, 2022,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8/5/21/mike-pompeo-speech-what-are-the-12-demands-given-to-iran>.

Al Jazeera. “Netanyahu met MBS, Pompeo in Saudi Arabia: Israeli media.” *Al Jazeera*, November 23, 2020, accessed October 29, 2022,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0/11/23/netanyahu-met-with-mbs-pompeo-in-saudi>.



[arabia-israeli-sources.](#)

Al Jazeera. “Timeline: Iran and Saudi Arabia, from rivalry to rapprochement.” *Al Jazeera*, March 10, 2023, acceded April 8, 2023,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3/3/10/iran-and-saudi-from-rivalry-to-mending-ties-a-timeline>.

Center for Israel Education. “President Lyndon Johnson Outlines Five Principles for Peace in Middle East.” *Center for Israel Education*, June 19, 1967, accessed October 29, 2022, <https://israeled.org/lyndon-johnson-five-principles/>.

CNBC. “Saudi Arabia to open airspace to all airlines, including from Israel.” *CNBC*, July 15, 2022, accessed October 29, 2022, <https://www.cnbc.com/2022/07/15/saudi-arabia-to-open-airspace-to-all-airlines-including-from-israel.html>.

CNN. “George Mitchell named special envoy for the Middle East.” *CNN*, January 22, 2009, accessed October 29, 2022, <https://edition.cnn.com/2009/POLITICS/01/22/obama.mitchell/>.

Columbia University World Leaders Forum. “Abdullah II bin al-Hussein.” *Columbia University World Leaders Forum*, September 23, 2011, accessed October 30, 2022, <https://worldleaders.columbia.edu/directory/abdullah-ii-bin-al-hussein>.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Iran and Nuclear Weapons Production.”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updated July 25, 2022, accessed October 29, 2022,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IF/IF12106>.

DW. “Russia, Israel to expand anti-terror cooperation.” *DW*, July 6, 2016, accessed October 30, 2022, <https://www.dw.com/en/russia-and-israel-to-expand-anti-terror-cooperation-after-talks-in-moscow/a-19312919>.

Fanzck. “Iran and Saudi Arabia: The Rivalry Explained.” *Fanzck*, November 8, 2017, accessed October 30, 2022, <https://fanack.com/politics-en/iran-and-saudi-arabia-the-rivalry-explained=30905/>.



Human Right Watch. “Saudi Arabia: Proposed Reforms Neglect Basic Rights.” *Human Right Watch*, February 25, 2021, accessed October 29, 2022, <https://www.hrw.org/news/2021/02/25/saudi-arabia-proposed-reforms-neglect-basic-rights>.

Iran Watch. “A History of Iran’s Nuclear Program.” *Iran Watch*, August 9, 2016, accessed October 30, 2022, <https://wwwiranwatch.org/our-publications/weapon-program-background-report/history-irans-nuclear-program>.

Jewish News Syndicate. “US temporarily halts arms sales to UAE, Saudi Arabia.” *Jewish News Syndicate*, January 27, 2021, accessed June 6, 2022, https://www.jns.org/us-temporarily-halts-arms-sales-to-uae-saudi-arabia/?gclid=CjwKCAjwyqWkBhBMEiwAp2yUFi8FpXOMeQu73RoBqgogfyAXmLpq3Ys0MaTKxMlCBbxqTtRQjkCWcBoCzIwQAvD_BwE.

Middle East Monotor. “Israel delegation to visit Saudi Arabia in 2020.” *Middle East Monitor*, May 4, 2019, accessed October 29, 2022, <https://www.middleeastmonitor.com/20190504-israel-delegation-to-visit-saudi-arabia-in-2020/amp/>.

Spectrum News. “Saudi sever ties with Iran over embassy, mission attacks.” *Spectrum News*, January 4, 2016, accessed October 29, 2022, https://www.baynews9.com/fl/tampa/news/2016/1/4/Saudi_sever_ties_with_Iran_over_embassy_mission_attacks.

The Embassy of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Washington DC News. “Kingdom of Saudi Arabia's Statement on the United States Withdrawal from the JCPOA.” *The Embassy of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Washington DC News*, May 8, 2018, accessed October 31, 2022, <https://www.saudiembassy.net/news/kingdom-saudi-arabias-statement-united-states-withdrawal-jcpoa>.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White*

House: 7-14, December, 2017, accessed October 30, 2022,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